

炎黃春秋

1993年/10(總第10期)



中南海直接 干預的案牘



釘在耻辱柱上的將軍

謝富治



中國潛艇部隊大寫真

中國最後一位公主



勢所必然的悲劇

禹作敏

大邱莊「莊主」





祝福 馮麗華攝



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

一件“偷窃”案，牵涉到许多大人物，以至竟然惊动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毛泽东主席，他亲自下令处理此案，于是，诸多谜团纷纷解开……

“大邱庄主”——势所必然的悲剧

1993年4月，当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时，人们无不为之震惊：是命运之神一时拿错了法码？还是他突然之间走火入魔？禹作敏被判刑20年，人们纷纷陷入沉思……

汪伪政权十大汉奸下场

石头城里，弹冠相庆，到头来，不过是南柯一梦，一个个落得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江青挨打”真相

“文化大革命”中的江青，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然而，竟有人“打”了这位“伟大旗手”，此事引发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谢富治：钉在耻辱柱上的将军

一个经过长征立过战功的红军老干部，为捞取政治稻草，死心踏地地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中国最后一位公主

帝王之家，生活穷奢极欲，玉盘珍馐，钟鸣鼎食，享尽荣华富贵，然而，却很少有人想到，这些“龙子龙孙”有时也要吃虫蛀鼠咬过的“老米”，更有难以言喻的种种苦衷……

从零开始的中国潜艇部队

一队中国军人，在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旅顺基地，一次次的服从，一次次的委屈求全，“洋罪”受够，“旱鸭子”终于成了“海底蛟龙”……

女兵楼的故事

北京有一座“女兵楼”，里面住的全是花朵一般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们被一身绿军装束缚住，总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应，于是……

扉

FIE

页

YE

导

DAO

读

DU

炎黄春秋

1993/10(总第19期)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景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锲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副总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总经理:徐 孔

理事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贝尔汉 李广尧

理 事: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徐 孔

(美术设计:大力 小力)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印刷:河北省张家口市印刷厂

邮编:100802



以史为镜 防止腐败/薄一波 18

中南海干预的纪凯夫案件/李之琰 4

英杰谱

毛泽东为何在重庆与美国大兵合影/张彦 20

春秋笔

谢富治：钉在耻辱柱上的将军/古阳木 24

戏台女皇梦：样板戏秘闻实录/晓高 33

汪伪政权十大汉奸的下场/雪舟子 46

时代风

从零开始的中国潜艇部队/王健娃 72

求实篇

张思德是怎样死的/刘树林 康仙舟 17

“江青挨打”真相/沈默 54

神州光

红火的炎帝节 欢腾的古陈仓/卢弘 57

人海浪

从公主到平民/洗济华 58

丁素兰和她的“一贴灵”/孙洪涛 70

地为男性追回青春/吉文 71

女兵楼的故事/舒云 67

法纪苑

势所必然的悲剧——禹作敏受审前前后后/

罗先明 80

古镜台

宋仁宗和他的台谏官们/朱秀海 92

梁武帝离朝当和尚等四则/翟惠军 石林

编读窗

致《炎黄春秋》编者/顾寿义 崔景元 张彦 孙宅巍

本刊

重要

启事

本刊自创办以来,已出版 19 期,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发行量逐月上升。但由于发行渠道不够畅通,仍有许多读者来信反映难以按期购阅本刊。为此,本刊从 1994 年开始已交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向全国邮发,每月 20 日在北京出版。目前,各地邮电局(所)正在办理本刊的订阅手续,欢迎您速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82—507。如您在邮局漏订,亦可向本刊办理邮购。(每册 3.20 元,另加收邮费 0.3 元)款寄:北京市文津街 7 号《炎黄春秋》杂志社邮购部郭小姐收。邮编(100802)。

新的一年中,本刊在保持刊物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开拓进取,革新版面,推出一系列重大选题,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以不辜负您的厚爱。

中南海直接干预的
纪凯夫案件

李之莲



邓子恢

解放初期，武汉市一个医院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被诬告“偷窃”了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旧币）。这么一个并不算大的案子，竟然惊动了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主席，他下令给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平反，并处分了这个市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后来，这个在当时已经基本正确处理了的案件，经反反复复，两次翻案，十多年后才终于最后定案，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有名的“纪凯夫案件”。

现在，党中央正大张旗鼓地狠抓反腐败的斗争。这个案件从开始处理到两次翻案，到最后定案，经历了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很发人深思，从中可以吸取不少有益的教训。我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兼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副部长兼副书记），直接参与了在这个案件的处理，我有责任比较详细地报道这个案件的全过程。这对目前正在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一定能起到借鉴作用。案件的事实和经过是这样的：

武汉市二医院发生盗款案，报案人纪凯夫反被拘留

1952年4月15日上午10时，我正在宿舍同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侯政同志谈话，这时，钱瑛——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南局纪委副书记领着市二医院团支部书记兼保卫委员孙麦龄走过来，很有气地说：

“你听听武汉市二医院发生的一件怪事，看看怎样处理？”

孙麦龄介绍了案情，在4月12日下午6时下班后，医院职工有的回家，有的到食堂去吃饭。这时医院发现总务科的存款被盗。保险柜被打开，将现款1200多万元人民币（旧币）取出，有些钱遗落在走廊上和院长、监委办公室的地上，在医院



钱瑛

工作人员发现地上散落的钞票后，追寻到办公室外面的阳台，看到旁边的电线磁头上挂着一个花布包，并发现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在阳台上站着。工作人员纪凯夫、杨世民等向王清报告此事并取下花布包打开一看，里面包的也是钞票。经检查包内及地上的钞票同保险柜的存款数目相符。王清即吩咐纪凯夫等把地上的钱拣起，把花布包拿到室内，纪凯夫还打电话报告公安四分局来人查案。四分局来人后作了多方询问和了解。到底谁偷的钱？看法很不一致，因钱未丢失，未即作处

理。14日深夜，公安四分局把纪凯夫（医院文书、青年团员）拘留。孙麦龄认为在盗案发生时，纪凯夫并不在现场，是盗案发生后才从食堂上楼来，才积极追查盗款，并报告公安分局的。因此他认为拘留纪凯夫是无道理的。特向中南局纪委反映此事。他说钱瑛大姐听了感到奇怪，就叫他详细向我来汇报，看怎么办？

市公安局侯政副局长听完孙麦龄的情况介绍后，表示此案还没反映到市局来。他说回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并表示基层办案有时简单、生硬些，但完全以假乱真的案子则很少见。这样表示后他先退走了。我对孙麦龄继续询问一些情况。我问：

“纪凯夫既不在现场，拘留他到底有什么根据？”

“认为他历史上有政治问题，还说他本人在盗案发生后，追查盗款人表现特别积极并敢于怀疑监委王清偷钱。”

“这有什么事实根据？”我问。

“他的哥哥叫纪愚，听说曾是国民党特务，他本人发现盗案后，到总务科检查了保险柜，并积极打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叫人监视王清的行动，有人认为他这些行为都是别有用心



钱瑛

的‘贼喊捉贼’的惯技。”

“拘留纪凯夫是公安局的决定还是什么人的意见？”

“怀疑纪凯夫是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同王清商量的，我当时在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也不考虑。公安四分局很怀疑王清，但宋瑛表示她担保无问题。”

“纪凯夫平时工作表现怎样？”我问。

“一直表现不错。名义上他是文书，但什么都干，很积极，是青年团员，在解放前同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他在重庆时曾在顾执中为校长的民治新闻学校夜校读书，教育长是陈翰伯；发行过中国学生导报，这是地下党杜子才等办的。王清本来对纪凯夫很信任，亲自指定他睡在院长、监委办公室，负责医院的保卫工作。盗案发生时，他在食堂吃饭，盗案发生后，纪是第八个来到现场的人。因为是下班以后，他看到现场的混乱情况无人负责，就打电话报告公安四分局，还东查西看，同医生史灵慧等发现在办公室外的阳台旁挂着一个花布包，并看到王清在那里站着而且满头大汗。他们向王清报告丢了钱，把花布包拿到室内打开，包的也是钞票。王清吩咐人们把花布包的钞票和地上散落的钱赶快收起来。而这个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没有钥匙的人是进不来的。钱包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挂到阳台上来的？这是个关键问题。”

从孙麦龄的介绍看来，我认为，纪凯夫作为一个青年团员，发现公款被盗，无人主持追查破案，主动报告公安机关和积极组织本院人员追查和做善后工作，这种态度是正常的。同时他发现监委王清在这个紧张的时刻的不正常表现，而对他产生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以此作为纪凯夫盗款的根据。

再从时间上说，下班以后，监委王清既不是在室内办公，又不回家

吃饭，而在阳台上站着，在他身旁挂着一个花布包，别人在室内一看就可以发现，他站在跟前却看不到，这是不好解释的，是不正常的。而这个钱包如果是在下班以前有人挂在这里的，办公室的其他人员都会看到这个挂包的人；如果是下班以后有人挂在这里，那么王清应该看到是谁挂的。同时，在下班以后办公室门是锁着的，没有钥匙的进不来；而王清站在阳台上，办公室的门却锁着。纪凯夫等打开门，看到阳台上有人，过去看时原来是王清；而这时在室外走廊上已是人声嘈杂，议论纷纷，唯独王清一人安然站在阳台上听不到一点动静而无动于衷？况且，时在4月中旬，下午6点以后，天气还不太热，而王清见人来满头大汗，如果不是有意外的刺激，又何必至于这样紧张？

从这种种矛盾情况看来，纪凯夫对王清产生怀疑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他告诉别人注意王清的行动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只是根据他对追查盗案很积极和家庭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不能作为他有盗款嫌疑的根据。

“王清到底是怎样个人？”我问孙麦龄。

“是部队转业干部。从市检察院调来，时间还不长。有人说曾在部队担任过团政委。来院后，使人感到他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较高。例如他家中想要套沙发，全院都没有，不好解决，他很不愉快。有次他到妓女院去逛，被公安局查到，经医院证明后才放回来。这些，在我看来，同大多数解放区来的老干部不相同”。

“在盗案发生后第二天，即4月13日早晨，医院职工在医院大门前的三角花园练习打腰鼓时，发现了一把开保险柜的钥匙。地点恰恰是在盗款发生的当时王清独自站立的阳台的下面不远的地方。而这把钥匙经查对正是盗款者伪造的那一

把。因此，人们怀疑是否盗款人怕被发现，遂将盗款用的钥匙顺手丢到医院外的花草地上，以消灭物证。这样，人们更怀疑王清。盗款用的花布包皮，经洗衣工认证，记得是王清家的衣物，曾送医院洗衣房洗过。”

孙麦龄还介绍说，盗款发生的过程很短，约在下午6时以后到6时30分之时，这时人们还在楼下食堂吃饭，二楼活动的人很少。院长、监委办公室和总务科（会计室）都在二楼，只隔一段走廊。人们分析，从会计室把款偷出来，怕被人发现，拿到院长、监委办公室隐蔽一下是很容易的。从现场发现的钞票遗落的方向也正是这一条线。而院长、监委办公室下班后无人时，门都锁着，不是办公室的人没有钥匙是进不去的。

“因此，在办公室阳台上发现王清和钱包，有人说‘这是人、赃俱获’。所以人们认为王清的嫌疑是很大的。”孙麦龄又补充说。

听到这里，我更觉奇怪。既然王清有这样重大的嫌疑，又为什么拘留纪凯夫？我又提出这问题。

“那是宋瑛的主意。我已经说过了。是她和王清商量的，我也在场，我不同意她的看法，宋瑛还对我很不满。”

“她对纪凯夫为这什么这样肯定？”我问。

“在去年10月，有人揭发宋瑛在任第一医院院长时的问题，信是寄给中央的，中央批回来查处。宋瑛把二院的纪凯夫、王守正、马骏三人找到卫生局。追查是否他们所寄，并对证笔迹。纪凯夫等很反感，觉得人权受到侵犯。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所写，因而纪凯夫就控告宋瑛侵犯人权，所以宋瑛对纪凯夫是早有成见的。”

“大家对此案的看法又有什么反映呢？”我继续问孙麦龄。

“一般人虽对王清怀疑，但公开

不敢讲。因为他是党政领导。私下有很多议论。比如说偷钱用的包袱皮是王清家的，就是洗衣工友提出来的。还有的医生在盗案发生之前几分钟就看到王清在他的门口探望；发现走廊上有散落的钞票时，又有人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影进了院长、监委办公室，有人也猜测就是王清。”

“对纪凯夫人们并没有什么怀疑。因为在盗款案发生时，他在食堂带着一个职工的小孩吃饭。他抱着小孩上楼发现走廊上的钞票已是第八个人了。发现院长、监委办公室地上有钞票和王清站立在阳台上 and 身旁挂着的钱包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孙麦龄举了几个人的名字，还画了现场的详细平面图并标出距离。他在说明现场情况时，还介绍了公安四分局带警犬来侦察，从钱包中发现的一个皮带圈由警犬嗅过后，又走到王清身边时狂叫不走。而公安局的同志将现场5个人的皮带解下来检查，恰恰王清的皮带上缺一小圈，并从皮带圈的颜色、宽度和皮质等方面相比较，都和王清的皮带相符。但由于王清是医院的领导人，公安四分局没有当场宣布侦察结果。

而纪凯夫对王清的怀疑则报告了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兼保卫委员孙麦龄并提请他们注意王清的行动。

孙麦龄说，从现场来看，怀疑纪凯夫的人不多，他的被捕出人意料。因为是在“镇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了。他认为，从盗款的现场看，王清的嫌疑最大，而纪凯夫则和盗案现场无关。如果是他指使别人盗款，那么被指使者又是谁？逮捕纪凯夫无事实根据，也无道理。

我听了孙麦龄这些反映和分析，感到他讲的有道理。但还需要从多方面去验证和作进一步的调查才能肯定下来。饭后我同四区委书记

苏苇在电话上联系后，即同孙麦龄一起去中共武汉市四区委。

区委于晚7时召开了会议。由书记苏苇主持，武汉市纪委的纪律检查处长王世勋、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公安四分局负责人和区委有关同志都参加了。苏苇讲了开会的目的，即请孙麦龄介绍二医院盗案发生及处理经过。他仔细讲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对纪凯夫、王清两人嫌疑的分析以及他自己的看法。公安四分局的同志汇报了对此案调查的情况同孙麦龄所讲是一致的，并认为不需要拘留纪凯夫。区委领导人多次启发与会者发表意见。人们都表示，从孙麦龄所介绍的情况看来，拘留纪凯夫的确根据不足，所说家庭问题、本人历史问题等等都是虚的，它同现场的盗窃活动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王清的疑点和王清的行为则都是现场的表现。因此只拘留纪凯夫而对王清不加审查则不应该。要把问题进一步弄清楚，还需大量的工作，把所有疑点进一步查实，才能定性。

会议最后决定，由孙麦龄将纪凯夫保释。

是王清盗窃案，还是纪凯夫阴谋陷害案，认识对立，分歧严重

宋瑛不同意四区委和四分局释放纪凯夫。但又不在区委会上表示不同意见。会后她向副市长周季方去报告。周季方是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同志，是市政府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宋瑛对处理此案有意见找主管的领导人去反映，当然是合理的。但有意见，为什么在区委会上征求意见时不肯讲？而区委的处置并没有否定纪凯夫的可疑点，只是认为作为拘留的根据还不充分，而且同对王清的处置相比较就显得太不公了。保释纪凯夫并不是就此结案，而是继续侦察，求得根据更确实

后再作处理，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宋瑛向周季方的报告，完全不介绍区委会讨论的全面情况，也不分析王清的疑点和纪凯夫的疑点在同现场的关系上有什么不同。她只肯定地向周季方报告说：“……很显然是纪凯夫陷害王清的。纪一贯在医院表现不好，有政治问题并同院里两个坏分子勾结在一起，总务科被公安局捉走的一个人同纪关系甚密。……第四区委相信有政治问题的纪凯夫，不相信老党员王清，说是王清偷的钱，硬要四分局把纪放了，他已一天不到医院，家里也不见人，晚12点以后还未回家，恐怕逃走出事。……公安四分局怀疑纪凯夫盗款，将其扣押，后由中南局组织部秘书长李之琏责令孙麦龄一同去四分局，保释纪凯夫。公安四分局不同意放，但后来还是放了。……纪凯夫的社会关系很复杂，其哥哥纪慈政治上严重问题。他们两人住在医院外，又不易监视，怕他跑了”等等。

周季方听了宋瑛的这种报告，不分析、不研究，轻信其真，立即找公安局长朱涤新。因朱不在，即直接找了社会处长田光来，下令把纪凯夫再次关押。

4月17日，纪凯夫第二次被捕。当天晚7时，四区委原定召开各有关方面的会议讨论此案的下一步工作。大家到会后，知道纪凯夫又被拘留，而且是副市长直接下令，并宣布此事区委不要再管，由市里直接处理。区委就不好再做什么了。

中共武汉市府文化教育党组第二天开会时，批准了副市长周季方的这种作法。党组书记、市长吴德峰同志也积极支持副市长。他当时毫不怀疑王清，只怀疑纪凯夫。当然这和宋瑛的反映有关。中共武汉市委对这种作法也无条件地同意，并于4月30日，在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主持下召开会议，肯定市府的处置是正确的。张平化说：

“……照目前情况看，盗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主要便是钥匙问题，王清配钥匙的可能是很小的……说是盗窃，为什么不从总务科处下楼，经过走廊易可（被）发现。因此，由公安局处理此案，一切材料交公安局。”

他这意思是说，这不是个盗案，说王清偷钱是不可能的。这是个政治陷害案。他们认为，查处此案主要是从政治上追究反革命线索，现场情况并不重要。

由于意见分歧，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些不同意见，又经过直接和间接的各种渠道很快传到王清本人耳中。于是就更形成了此案的复杂性。

纪凯夫在公安局被关押，就一直从政治上被追究，昼夜逼，失去了被告人正常的提出证人、证物和申诉的权利。

王清从此更看到有机可乘，在市卫生局一些人的鼓动和帮助下就向中央、中南局和市委写信，控告我和市纪委的王世勋“包庇特务（纪凯夫），陷害老干部（他本人）”要求组织上查处我们对此案的错误态度和责任。

在这期间，已查明让铜匠配制保险柜钥匙的时间是3月22日中午，但识别配制者的像貌还没有结果。因此，中南局纪委于10月6日给武汉市委纪委又作了批复：“……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应该调查在这一时间过程中（3月22日中午）掌握钥匙的人。从你们送来的报告看，尚不能说明纪凯夫是该案的主要嫌疑犯。因此，采取继续扣押的办法是错误的，应立即释放（纪凯夫）。”

5天以后，10月12日，武汉市委给中南局和中央又写了报告，对中南局纪委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报告说：“……6个铜匠工人的识别和经过事实的证明，均肯定了经手请铜匠配钥匙者是医院出纳王守正

……我们认为这个案件不是一般的偷窃案，而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阴谋布置的陷害案。这个案件的酿成可能不只一人所为，其是否有政治阴谋尚待证实。我们对该案处理意见：由公安机关拘留王守正（不同于一般犯人扣留）。纪凯夫过去虽有嫌疑，但材料不足，过早拘留他是不明智的，但案情发展显示在窃取钥匙问题上和纪有关，现不宜释放。”

中南局纪委对武汉市纪委的不同意见可以批驳，但对武汉市委的不同意见，就只能向上级反映请示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向中南局报告，请求指示。经中南局纪委研究，认为武汉市委的报告同实际情况不符。无理扣押铜匠几个月，让铜匠识别配制保险柜钥匙的人并未得到符合主观要求的结果。突然在市委限期于10月10日破案时，又肯定是同盗案现场毫无关系的王守正让铜匠制作的钥匙并要立即扣留他，这是不适当的。而在这之前，已经查清配制钥匙的时间是3月22日中午，而在这个时间正是王清掌握着经常使用的保险柜的钥匙。在中南局纪委10月6日给武汉市纪委的批复中已经指出，“目前应该调查在这一时间过程中掌握钥匙的人”，市委对此却毫无反映。这表明武汉市委对此案的处理是有偏见的，应该纠正。经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同意后，中南局纪委于10月20日给中南局写了报告并提出具体建议：

“……1. 我们认为有必要由中南一级有关部门联合协助市委检查处理这一案件。2. 根据市委的前后报告看来，此案还不能肯定是一个政治阴谋案件，还必须采取认真地发动群众，让群众敢于说话，提供材料以求得破案。3. 据该院党员孙麦龄报告，王清在该院的领导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为便于发动该院群众，使群众敢于说话，须将王清

暂时调开医院到市委组织部休息，案件弄清与其无关后再回医院。”

由于市卫生局、市政府和市委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王清不但未受到任何处置，而且仍在进行各种活动，打击对他怀疑的人，使问题难以揭穿。

武汉市公安局在扣留铜匠识别配制钥匙者的问题上，虽有违反政策、不符合实际地主观臆造的错误，但找到了配制钥匙的铜匠和查清了配制钥匙的准确时间是3月22日上午11时到下午1时之间。这对最后破案有关键性的作用。而在这个时间内恰恰是王清掌握着常用的一把钥匙。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别人不可能从他手中把钥匙偷出去找铜匠照样配制。但是武汉市委却有意回避或不承认这一点。

市委书记张平化认为，“盗案的可能性很小，政治陷害的可能性大”，这自然就排除了王清的各种嫌疑，而集中力量追究纪凯夫。

市长、市委副书记吴德峰声称：“王清盗款的证据越多，恰恰就是反证越多”。显然也是毫不怀疑王清，自然也认为纪凯夫是“阴谋陷害案”的策划者。

而钱瑛同志对以“老干部不会偷钱”这种观点来否定王清的嫌疑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据此向当时武汉市委一些领导人作说服工作，希望他们放弃这种观点。对市委只有追究纪凯夫的“阴谋”而不触动有重大嫌疑的王清提出批评，希望市委改变这种观点和作法。

由于两种观点的绝然对立，在作法上的不一致就越来越公开。为着达到破案的目的，武汉市有关方面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择手段地进行各种活动。

市卫生局在宋瑛的主持下鼓动几个党员、秘书、科长、支部书记为王清奔走，帮助他抄写诬告信向中央和上级领导部门控告我和王世勋

等打击他；支持王清在医院内部批判孙麦龄。

市公安局对此案的侦破工作则专门对纪凯夫下功夫，追究他的政治问题、家庭和社会关系、亲属朋友的政治身份，一切社会活动的细节，追究不出问题就刑讯逼供，带镣、带铐、动手脚、连续60多个小时的审讯不准休息，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送衣物，用一切办法强迫他招认审讯人员所要求的犯罪事实。对这种情况，中南局纪委虽曾及时指出、纠正，但没有效果。

一封香港来信“掺乱”，纪凯夫再次被拘留

正在武汉市委限期于10月10日破案期满不久，忽然接到从香港直接寄给纪凯夫的信。

信是十月二十二日写的。邮票邮戳都是香港的标志。

信的原文是这样：

“凯夫同志：

久未得消息，近来工作开展如何？盼照党方指示，迅速推进，并随时作报告，以作党方之依据及参考。

彼方干部，刚愎自用，并凭藉微功，盛气凌人，上次同志联络数人，略予惩处，当或稍敛锋芒，同志所为，党方所依持，盼善自处理一切事物，是所至盼，此颂

公祺！

同志 依律

10月22日

对这个香港来信，产生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武汉市方面认为，这是特务机关来信无疑。因而纪凯夫当然是特务。中南局纪委方面则认为，这不能作为纪凯夫是特务的证据，信虽是香港来的，也可能是特务机关写的，也可能并非来自特务机关，而是来自有心制造混乱的人。即使来自特务机关，也可能目的在于制造混乱。无论来自何处，都不能以

此证明纪凯夫是特务。对此，中南局纪委作过认真的研究分析：

纪凯夫于4月17日第二次被拘留后，到10月22日香港发信之时，已有半年之久。这半年来，纪凯夫同外界没有联系，如他是特务，失踪半年之后，特务机关还以原地址公开给他写信，批示他继续作破坏活动，任何特务机关都不致于这样愚蠢。那样作，对自己的属下就起了告密的作用，把他暴露在破坏对象的网罗之中。这样看来，此信不可能是特务机关写的。这是第一。

信的形式自相矛盾。信封上称先生，信内称“同志”，写信人署名也特别标明“同志”字，以强调自己的政治身份。而信的内容则是直接指示自己的地下工作者进行破坏活动。布置任务称为“党方指示”，对打击对象称为“彼方干部”，秘密活动称为“工作进展”等等，这样直接、公开指示自己的潜伏人员作破坏活动的信，不可能出自特务机关之手。这样就会使人一看便知是要干什么。特务机关是十分重视如何保护自己的。他们的书信来往惯用密码和信号代替普通的言词。不会用政治色彩很浓的文字和术语，以免被发觉。从此看来，又不像特务机关所写。这是第二。

特务机关利用此事进行破坏活动、制造混乱，扩大事态，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也是可能的，但这必须有先决条件。就是说，如果特务机关已经很清楚武汉市公安局把纪凯夫作为特务嫌疑抓起来，又知道追查半年仍无证据可获，为着对我制造事端，扩大假象，加重纪凯夫的嫌疑，写这样一个“指示”，增加他是特务的证据，给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提供一个假情况，造成假案以达到破坏的目的。这样看来，此信也有可能不是特务机关写的，但不能以此证明纪凯夫就是特务。这是第三。

在盗案发生之前几个月，纪凯

夫控告宋瑛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之事已见诸报端，纪凯夫之名已为国内外各方知晓，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或别有用心，一贯反共的人，为了制造混乱，达到破坏的目的，写此信以加重事态的严重性，也是一种可能。这是第四。

或有居心不正的人，对纪凯夫本有宿怨，对他的被捕早已幸灾乐祸，拍手称快。但关了半年仍无结果，这样不了了之，实在便宜了他，因此，写此信到香港寄发，自可加重纪凯夫的特务嫌疑，达到自己报复的目的。这样看来，此信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无关，完全是携嫌报复者的蓄意制造。这是第五。

还有一种可能是，武汉市已决定限10月10日破案。但到时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纪凯夫是特务。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立功心切，写此信借特务机关之名，提供纪凯夫的“证据”，达到破案的目的。这种可能性对党组织来说是不可想像的，但对某些个人来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第六……

联合调查的正确结论不被重视，毛泽东主席出面干预，纪凯夫案轰动全国

对武汉市所采取的各种作法，在书面指示和口头建议都不能改变时，中南局纪委就在上级的支持指示下，组成了联合检查组帮助武汉市委推动并检查对此案的处理。

检查组由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查署中南分署、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中共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武汉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武汉市委组织部、中共武汉市第四区委、武汉市公安局等十一个单位组

成。检查组的组长由中南局纪委的纪律检查处处长樊德智担任，副组长由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处长罗启林担任。

对检查此案的方针，只能是实事求是，根据确凿的事实认定案件的性质，不带任何偏见或成见。要作到这一点，就需要认真研究盗案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各种有关人员的活动情况；其次是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广泛调查研究；防止偏听偏信，根据少数人的意见定性。

中南局纪委的这个方针和作法联合检查组都一致同意，并于11月21日共20余人进入市第二医院检查此案。

医院的领导和群众除监委王清外，院长、科长、科主任、医生等广大员工见到检查组的到来，都表示了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并自动组成了由院长杨光第亲自参加的群众性的“盗款案检查委员会”配合、协助检查组工作。

检查组首先研究盗款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当时目睹者亲眼所见，摆了现场的原貌，找了所有的人进行调查，摆事实，提意见，对当

时发现的现场各种实物进行分析，追查来源、可靠性；对各种疑点进行查证核实，认定其性质。对现场的各个有关人员都进行了历史的和现行表现及现场活动的分析。凡是同群众有关的事，都提交群众讨论，提供事实，说明看法。集中群众智慧，协助查案办案；彻底改变了武汉市那种神秘的由少数公安人员个别秘密进行侦察和首长认定的办法。

经过3个星期的反复调查，得到大量的人证物证，肯定盗款人是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而纪凯夫则完全是无辜者。

王清本人，在检查组到达之日却表现了不安，并诬蔑检查组长樊德智是“受李之珪的委托”来作他的结论的，并一直采取了对抗态度。

经过公安机关8个多月对纪凯夫的严格审查和审讯，着重点是他的政治问题和同孙麦龄等的关系。但没有发现他在政治上和道德品质上的任何问题。而且工作表现一贯是积极的。检查证实他同盗款现场毫无关系。盗款发生时他正在食堂吃饭。盗案发生后，他是第8个来到现场的人。那种认为是纪凯夫摆布

的现场来陷害王清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经过检查组的全面调查，证明孙麦龄所反映的情况都属实。

纪凯夫在被关押期间，受到严重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但保持了实事求是的立场，没有按照审讯人员诱供、指供的要求，胡编乱造虚假的情况以换得审讯人员的好感，解脱自己。

检查结果还认定：王清是盗款人并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

检查组于12月中旬结束了调查工作，撤离医院，起草了对此案的检查报告。

正在这时，中央有关部门有派赴武汉工作的干部，他们听说此案的核查结果后，回京即向有关领导同志个别作了口头报告。因为这样的事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事件，自然就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这时正是中央决定要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此事即



作为一个典型事例反映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听后，立即要中南局迅速处理。

先是让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同志打电话给中南局主持工作的书记邓子恢，要中南局立即开除周季方的党籍。邓老当时对此案的检查结果还没有听全面的汇报，对情况还不完全清楚，即向安表示：需要那样的严肃处理吗？请安再向主席反映。安向主席反映后，主席很坚持，让安再给邓打电话，并要邓子恢亲自去看望纪凯夫，向他表示慰问。安将此意告邓后，邓老即表示照办不误，再没讲不同意见。但主席仍不放心，又打电报正式指示中南局。电报是1952年元旦休假期间收到的。原文是：

中南局：

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

毛泽东

随后中央派中组部部长赵汉和江卓同志到中南局协助处理，坐催处理结果。

中南局接到指示后，邓子恢同志主持召开中南局和有关人员开会，正式听取对此案的检查结果。因为检查组的书面报告只写出草稿，还没有作为正式文件提交中南局。因此全案情况还需要听口头汇报。而中央的指示很紧迫、不能再有丝毫等待。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南局讨论决定将处理结果很快在报纸上公布。

这时钱瑛已任中南局组织部部长兼中南局纪委副书记，我已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副书记。在参加中南局对此案的讨论时，对周季方的处理，我们感到逮捕法办是否过重？因为在检查过程中，重点是对盗案的定性。对周季方在盗案处理上的责任主要是偏听偏信，也作为违法犯罪处理是否合适。但当时中

南局会议的气氛认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下令“逮捕法办”周季方的，不好提出不同意见。

中南局常委会认真听取了联合检查组的报告，然后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1952年1月28日，中南局以“关于武汉市第二医院盗款案的处理决定”为题的文件公布了讨论的结果，对几个主要人员的处分是：

“……(四)中南局决定：王清堕落蜕化，盗窃国家财产，反而嫁祸于人，陷害无辜，开除其党籍。宋瑛继其压制民主侵犯人权之后，与王清合谋，藉端报复陷害无辜者，开除其党籍。周季方继支持宋瑛压制民主侵犯人权之后，又从宗派成见出发，抵抗组织，并实质上支持了宋瑛的藉端报复和蜕化分子王清的嫁祸于人，且其在武汉市工作期间，曾前后逮捕过不应和不须逮捕的六个人之多，开除其党籍。”

在中南局讨论此案的处理时，认为王清偷钱是事实，但钱没有偷走，国家没有受到损失，如果他能及时交代认错，给予必要的处分，调动一下工作可以了。但现在他不仅嫁祸于人，还诬告怀疑他有盗款嫌疑的同志是“包庇特务、陷害老干部”，这就不能不依法判处了。因此，决定开除党籍后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根据武汉市委对盗款案的处理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和各个负责同志的检讨，中南局于2月15日作出了“关于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错误地处理武汉市立第二医院盗款案给武汉市委及市府党组和主要负责人员的处分决定”。

“决定给武汉市委和市府党组以指责的处分并实行改组。对于直接处理此案有关的几个负责同志则分别给以如下处分：

“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对此案的错误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已作了比较认真的检讨，故从轻给予当面

警告的处分并降为副书记。

“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文化教育党组书记吴德峰同志，对自己直接领导下的犯法行为，不仅未能及时教育制止，且对压制民主一贯予以支持，早在1949年就曾同意周季方下令停止市人民法院的民主检查，后又支持周季方非法逮捕法院的3个党员干部，对武汉市化工厂的抵制报纸的批评也曾予以庇护，当宋瑛的压制民主追查揭发人笔迹的错误发生后，更一直采取庇护的态度，医院盗款案发生后不仅对王清的堕落蜕化未予审查，亦未检讨自己用人不当。且当宋瑛、周季方侵犯人权非法逮捕纪凯夫后，不仅未对此种违法行为即时纠正反而不加考虑即予支持，并在处理此案的整个过程中，完全采取支持这种错误的态度；并在研究此案的会议上声称：根据自己长期作保卫工作经验看来，王清偷盗的证据越多，恰恰是反证越多(指阴谋陷害)。这样就使得偷盗犯王清和报复分子宋瑛敢于大胆实行其陷害，助长在卫生局系统中某些党员的反党活动和党组若干成员反抗组织的情绪，这些都对此案的错误处理起了助长的积极作用，且直到最近亦未深刻检讨自己的责任，决定给以撤销工作的处分。

“市委第二副书记兼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市委组织部长谢邦治同志，也直接参加对此案的侦察审讯，在中南局组织部及纪律检查委员会多次指示其释放纪凯夫时，表示愿最后总的承认错误不愿早放纪凯夫。直到全案公布后对其错误才有所了解，但仍检讨不深。决定给以撤销工作的处分。

“市委委员、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同志，对逮捕纪凯夫并无责任(周季方下令逮捕纪凯夫时直接找来处长面令的)，在审讯过程中也非直接指导，但对在审讯纪凯夫过程中所发生的逼供和变相肉刑及对铜匠李德



玉拘留等错误,均负有教育干部不力和检查不严之责。现已有深刻的检讨,故只给予批评。

对其他有关人员查清后再作处理。”

同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对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德峰、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谢邦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公安总局局长朱涤新相应的予以行政处分。

中南局在1月28日“关于处理武汉市第二医院盗款案的决定”中,“对始终坚持正确原则的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处长王世勋同志,四区委书记苏韦同志,医院医务科长、党支部委员孙麦龄同志予以表扬。对青年团员纪凯夫取消其嫌疑,恢复其名誉,对其一贯积极工作予以鼓励,对其所受委屈予以安慰”。

1952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刑事审判庭公布了对此案主要人员的判决。

判决主文是:

“王清偷盗公款,隐瞒罪责,捏词诬告陷害他人,处有期徒刑6年。

宋瑛压制民主,蓄意诬陷,藉端报复,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2年。

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9个月。

彭其光制造伪证,违反政策,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1年。”

当时,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于2月19日发表了题为“维护人权、保障民主、严肃纪律”的社论。

《人民日报》于2月26日发表了题为“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的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抵制和清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克服我们党的若干部分的组织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成份上的不团结现象,使党更加健全和巩固起来”。

对这个案件作了认真严肃的处理后,在全国引起了震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许多党员和群众纷纷给报纸编辑部和有关部门来信,表示拥护,赞扬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以维护群众利益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不论有多高的职位和多老的资格的党员,只要是违犯了党的纪律,决不迁就姑息,决不官官相护。这是当时来自群众的呼声,它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看法和信任,也反映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30年内几次翻案,究竟孰是孰非

此案处理后,在若干年内没有人提出异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宋瑛、王清等在“纪案”中受处分的人,看到有机可乘,起来造反,声称

“纪案”是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炮制的;他们教唆子女同当地造反派相串连,组成“纪凯夫事件调查组”,在武汉、北京等地展开了对有关人的访问和“调查”。到上海批斗孙麦龄(孙于1956年调上海,在肿瘤研究所工作)并从上海中医学院(孙当时的工作单位)造反派那里拿走他保存的有关“纪案”的原始材料;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散布造反派对此案的观点;在武汉查抄有关的档案并强迫过去提供过真实情况的人修改证词,按照他们的要求作假证。……

这一批造反者的翻案活动,很快反映到周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派人对他们进行了劝阻,指出“纪凯夫事件”的处理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的,劝他们停止串连各回原地,等待处理,他们才偃旗息鼓。

1978年2月,我从新疆回北京,向中央要求复查1958年我在中宣部由于在处理丁玲、孙企霞“反党集团”问题上,同当时的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因而被错误处理的问题。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的批示下,中组部和中宣部复查组成了联合复查组,由秦先任同志任组长,进行了全面的复查。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在结论上签上字,同意。结论的内容是:“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恢复级别,恢复名誉。”并向中央报批。

正在这时，中组部派赴湖北了解干部情况的同志回来反映说，湖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位常务书记托他们向中组部反映：李之珪在中宣部的问题解决了，也不能重用，因他在“纪凯夫事件”的处理中有问题。控告说，李之珪在处理“纪案”时修改了王清的供词。

于是，中组部从档案中将王清被拘讯后的供词找出来，共有两件，一是1952年2月3日审讯的记录，是问答式的口供。二是2月8日王清写给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钱益民的信，是系统地交代他作案的经过，这是他自己的笔供。在记录口供原件的边沿上，有我写的几个字“这是王清的口供”。笔供是抄件，原件没有我写的一个字。这种情况证明，说我修改了王清的供词完全是捏造。中组部就此事结束了对此事的审查，否定了湖北省纪委杨青对此的反映并向中央作了报告。这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会后胡耀邦部长即找王鹤寿和我一起谈谈话，提议我作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秘书长，会后任中央纪委秘书长，立即进行第一次全会的准备和机关的组建工作。我以为事情就从此了结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的冤假错案的要求。在纪凯夫事件中受到处分的人，也提出了申诉。

1979年11月，我先看到湖北省委纪委“关于周季方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和“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

这个“复查报告”只讲了表面的情况，实质问题和重要情况则一字未提，如周季方令逮捕纪凯夫是在中南局纪委、武汉市纪委检查处、武汉市第四区委共同研究认为纪凯夫盗款的嫌疑很小，王清的嫌疑很大，同意纪凯夫保释之后又把他抓起来，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作的。明知有

不同意见，不加考虑，不同有关方面打招呼，征求意见，就武断地再次抓人，并不正常。同时复查报告还颠倒是非，正是武汉市委认为是政治案件，不是刑事案件，才形成市委同中南局和区委的不一致。“复查报告”说“这是刑事案件”完全同当时武汉市委的实际情况不符。这种复查的态度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即向当时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赵毅敏和常务副书记王鹤寿同志提出了建议。

我在建议中说：

在纪凯夫案件中，对周季方同志的处理，当时钱瑛同志和我都感到过重，但由于是毛主席亲自定性、直接指示中南局处理的，中南局不能不照办。现在作必要的改变，撤销原处分，解决周的党籍，我认为可以的。对过去处理过的案件，采取“有错必纠，不错不纠，错多少纠多少”的原则，维护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但不能“一风吹”，更不能颠倒是非。

1979年4月，王鹤寿同志对湖北省委书记兼纪委书记顾大椿同志曾有批示，提出复查“纪凯夫事件”的三条意见。这三条意见是：“此案由你们负责进行复查；周季方有病可提前作个结论；对原有关人员李之珪的问题你们不要有顾虑。”

1980年10月11日，湖北省委纪委报来了“关于‘纪凯夫事件’的复查报告”，并将中共湖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凯夫事件’复查组9月间写的“关于‘纪凯夫事件’复查情况的报告”报来。

报告说：

“复查中，查阅了有关‘纪凯夫事件’的案卷，向主要人员作了调查，对原中南局《决定》中有关定性问题进行了核实。复查结果表明，认定王清盗款没有实据；认定周季方支持宋瑛藉端报复陷害纪凯夫不能成立；认定武汉市委包庇王清，‘助

长’、‘放纵’、‘纵容’周季方和宋瑛的‘报复陷害’是错误的。所谓‘纪凯夫事件’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处理不是适当的，应该改正过来”。于是决定撤销所有受处分者周季方、宋瑛、王清、武汉市委、市府党组、张平化、吴德峰、谢邦治、朱涤新以及卫生局的张洁、姜冰、苗洁沛、王一南、王西云、刘春星等的所有党的、行政的和刑事处分。并说这是10月10日省委纪委会常委会讨论通过的。

在省纪委复查组的“复查情况的报告”中回避了实质性的问题和重要的证据，专就被处分人员的要求找些不能证明的人，在28年后出来作证明，并以此作为翻案的根据。

更应引起重视的是与复查报告同时，湖北省委纪委还报送中纪委一个有关材料，题目是：“在复查‘纪凯夫事件’中接触到有关此案形成的一些问题。”这个材料一开头就说明，“复查中发现，形成此案与原中南局纪委书记李之珪有一定关系。根据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交待，现将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汇报。”

这个材料比“复查情况的报告”篇幅还长，共13页，前者只有12页。集中反映的是：“李之珪同志不按组织原则办事，仅凭该院医务科长孙麦龄反映的情况，越过市委，插手干预”。

对湖北的复查报告，经过中央纪委审理室研究，认为复查结论否定王清盗款，只是根据一方提供的情况得出的，不足为据。还需要向另一方，即中南局参加处理这一问题的有关同志作调查后，根据各方面掌握的材料和意见加以分析，才能全面和稳妥。因此对湖北省纪委的报告不受理，把原件退回了湖北，请他们再作调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湖北省委纪委来信称：中南局参与处理“纪凯夫事件”的同志都在北京，请中央纪委就近调查了解，他们不再来京调

查了。

黄克诚建议中纪委组织力量复查，五部委审理组究根问底，实事求是提出处理意见

1981年9月28日，在中纪委第八次常委会上，在处理“纪凯夫案件”中针对有人对我的指责，我当即声明：在参加处理“纪凯夫事件”中我没有错误，中央组织部已经审查过。接着，就此事发言的常委有孔祥楨、帅孟奇、周仲美和副书记兼秘书长赵毅敏。孔、赵都是原在中南局讨论处理“纪凯夫事件”的亲身参加者，情况都清楚。他们在发言中都指出，“纪凯夫案件”的处理，是中南局多次讨论决定的，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批的，李之珪在处理“纪凯夫案件”中没有问题。

中纪委副秘书长王又新同志在会上正式传达了黄克诚同志对“纪案”的三点意见，即：“纪凯夫事件是中南局处理的，不错；即便有某些缺点也不能由李之珪负责；对个别人处理不妥的可以具体对待，并建议会后组织力量复查此案。”

中纪委第八次常委会最后确定组织力量复查此案，这表明我的请求引起了重视，因此我感到十分高兴，并暗处感叹这个结果真是来之不易！

1981年10月27日，中纪委书记、专职常委办公会议决定，会同中组部长并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派人参加，组成审理组，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湖北复查“纪案”的结果进行全面的认真审理。审理工作是根据湖北省委于9月19日报来的《关于“纪凯夫事件”的复查报告》进行的。这个“复查报告”同上年湖北省纪委送来的“复查情况的报告”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换用了湖北省委的名义。同上次报告相比，这次报

告的附件中撤掉了专门搜集、捏造的所谓李之珪的问题的材料。

中央五部委审理组由十二人组成。在中纪委副书记王从吾领导下进行工作。工作结束后，于1982年7月3日，由他主持向五部委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并进行了讨论。8月17日写出了“关于‘纪凯夫事件’的审理报告”。报告说：

“经过对大量材料的反复研究、鉴别、核实，我们认为，中南局对‘纪案’认定的主要事实根据是充分的，定性是准确的。在全国解放初期，为了防止和克服有些党员干部滥用职权、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行为，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纪案’这样性质严重的问题，严肃处理是对的。处理的效果也是好的。问题是处理面宽了一些，有的人处分偏重。现在，根据中央复查历史案件的精神，对某些有关人员处理上的一些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是必要的。但是，湖北省纪委复查认为这是一个错案，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错误的。”

“原定王清堕落蜕化，偷盗公款，隐瞒罪责，嫁祸于人，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王服刑期间，认罪服罪，表现较好，提前一年释放，现任武汉市红旗服装厂副厂长）。原结论和党纪处分不予改变。王清1978年提出申诉，编造谎言，否定犯罪事实，继续嫁祸于人，应严肃处理。”

“原定宋瑛压制民主，侵犯人权，藉端报复，陷害无辜，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2年（提前1年释放，1962年重新入党。‘文化大革命’前任铁路总医院副院长）。原结论和党纪处分不予改变。宋瑛在申诉中，使用她儿子提供的、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编造的材料（所谓1958年中央宣传部向中央的报告文件），继续诬陷别人应严肃处理。”

“原定彭其光制造伪证，违犯政

策，侵犯人权，被开除党籍（1955年1月武汉市委将原开除党籍处分改为留党察看1年。现任武汉八二四工厂党委书记），处有期徒刑1年。原党纪处分（留党察看一年）不予改变。彭其光现仍然歪曲事实，诬告别人，应严肃处理。”

“原定周季方（现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继支持宋瑛压制民主，侵犯人权之后，又目无法纪滥用职权，实质上支持了宋瑛的极端报复，被开除党籍，判刑9个月。周季方同志在思想上工作上犯有严重错误，当时给他一定的党纪、政纪处分是必要的。但是原处分偏重。可将开除党籍改为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或恢复党籍不再保留处分。”

“关于以上四人所受的刑事处分，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认为：原判决认定玉清、宋瑛、彭其光的犯罪属实，判处的刑罚适当，应予维持；周季方主要是偏听偏信宋瑛的假汇报，滥用职权，错捕纪凯夫，属于工作中的错误不以犯罪论处为宜，可予改判，宣告无罪。”

“原决定给予武汉市委和市政府党组以指责处分，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当面警告处分，市长吴德峰同志，市委副书记谢邦治同志撤销工作处分，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同志行政记过处分。我们意见，武汉市处理‘纪案’问题上的错误，张平化同志负主要责任，原处分不予改变。市委、市政府党组，以及吴德峰、谢邦治、朱涤新三同志，原处分偏重，可予撤销。”

“原武汉市卫生局，公安局因此案牵连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的同志，可由武汉市委复查处理。”

“关于纪凯夫、王守正的问题。纪凯夫历史清楚，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发生盗案时他是青年团员。解放前他在私人药房当职员，与我地下党组织有联系，做过进步报刊的财务、发行工作。纪凯夫、王守正在二

医院盗款案中都没有问题。《复查报告》至今仍怀疑纪凯夫有政治问题，有盗款嫌疑；怀疑王守正仿制保险柜钥匙，盗窃公款。我们认为这种怀疑毫无根据。应在适当范围内消除影响。

“关于杨青同志及复查组指控李之琏同志的问题，我们另有专题调查报告。调查结果证明，李之琏同志在任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期间，参与‘纪凯夫事件’的处理，是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没有‘出于个人恩怨’，制造错案的问题。对李之琏同志的种种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是无端诬陷，应全部推倒。鉴于李之琏同志为此案长期被诬陷并受过迫害，应在适当范围内，为他恢复名誉。”

“纪案”审理工作结束后，按照通常的作法，8次常委会提出的这一问题，9次常委会应把“纪凯夫事件”审理报告的审议列为议题之一。但是，1982年8月8日召开的中纪委第九次常委会并未讨论这一议题。我为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过问纪凯夫案件审理一事，薄一波对此也十分关注

胡耀邦同志接到我的信后，立即批给宋任穷和王鹤寿，并指出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请考虑处理。”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了新的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再次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并在第一次全会上选为常委。

可是，五部委的复查报告仍迟迟不予讨论，湖北的翻案报告自然也得不到中央纪委的批复。王清、宋瑛等人的翻案活动在继续。1986年6月中纪委又重新组织了六人复查小组，对纪案重新复查。

我趁参加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整党座谈会之机，向薄一波同志汇报了中央纪委对“纪

案”处理的情况。一波同志听后表示：在他的议事本上还记载着这一问题尚待解决。我要求他有机会过问此事，我所以要向他反映，一方面因为此案迟迟不处理，实属有关党风不正的问题，是整党工作应该解决的。另一方面听说“纪凯夫事件”最早向毛主席反映的是薄一波同志。那时他是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主管“三反”运动。此案是“三反”运动开始时检查清楚的。一波对中央纪委的工作也讲了一些他的看法。我主要是想请他督促对“纪案”抓紧处理。

这以后，我又到成都去开信访工作座谈会。回来后才知道以庞然（中纪委委员、原审理室主任、后办公厅主任）为组长的6人复查小组已经建立起来。

耀邦同志就张平化的一次发言批示后，鹤寿即批：“送韩光同志，按耀邦同志的批示办。查清事实经过和是非。”

时至12月底，我从庞然同志那里得知“纪案”审查已经结束，案子不错，有的人处分重了点，处理面宽了点，同五个部委审理组的意见差不多。

正在此时，1987年3月，武汉市党史办的李彬又来京，要求中央纪委对“纪案”的复查结果有明确的批复，以便作为编史的依据，并反映了一些对此案的看法。

3月初，中央纪委常委党的生活会连续召开。“纪案”还没有解决当然仍成为问题之一。常委们对此纷纷提出意见。

3月15日，我到王从吾家去看他。我将党的生活会上议论“纪案”处理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他说：“我主持讨论的五部委审理报告，我很希望中央纪委常委讨论通过后报中央，此案就结束了。”

在6月27日，薄一波、宋平主持召开了纪念建党六十六周年座谈

会，征求各方对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有30多位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和中央各部门领导同志参加。乔石、胡启立、伍修权、刘澜涛、萧克、王平、段君毅等都出席。蹇先任同志在这个会上发言讲到党风时举了处理“纪凯夫事件”的例子。她说：“此案的处理是当时对党风很有影响的一个大案，现在有人要翻案这是错误的。但已查清五年还不予处理……应引起重视……。”

薄一波同志由于对“纪案”的处理已有所了解，他也亲自做过一些调查。7月5日，他将向李先念和杜润生调查的结果送我看，并对未能抽时间同我面谈表示歉意。因为，在5月26日我曾写信给他，请对“纪案”的处理有所指示。他将信转给李先念，并附信说：

“先念同志：

纪凯夫事件是怎么回事，我不甚了解。张平化、李之琏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我想你可能清楚些。请告一个解决办法。”（6月1日）

先念回信说：

“解放初期武汉市和湖北省是平行的，属中南局领导。我管湖北省的工作，对武汉市发生的‘纪凯夫事件’也不了解。后来我兼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时也未过问此事。不过这一案件的处理，因为牵涉很多人，所以在中南局和武汉市中议论很多，有些人认为处理过重。如果你要了解具体情况。可找当时任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同志，他可能了解一些情况（6月7日）”

6月10日，薄老将李先念信转杜润生批：“润生同志：请告一个解决办法。”

杜润生6月29日复信给一波同志说：“关于纪凯夫事件”批示收到，谨陈述建议如下：

“（一）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出面直接干预，要开除吴德峰同志党籍（当时中央正抓典型，纠正压制民主

打击报复的错误作风),中南局讨论认为这样处分重了。反映上去后,毛主席让安子文同志转告邓子恢同志,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几经磋商后,作出最后处理决定,已经减轻了,但还显重。建议区别情况对张、吴、周几位同志处分予以纠正。

“(二)案情本身就我接触的材料看,中南局当时的判断确有事实根据,事隔20多年,湖北省提出否定原结论的请求报告,中纪委中组部会同公、检、法于1982年组成联合复查组赴武汉调查。他们的报告我未看过,详情不了解。只听说是主张维持原案。这是对复查的复查,又系中纪委委托五单位联合进行的。此时如批准湖北省的请求报告,必须取得更充分的理由与证据,才能否定五单位复查组的报告。否则事情仍难了结”。

薄老在杜信上批示:“李之琏同志阅,阅后退我。我没有抽出时间跟你谈谈。在此表示歉意!(7月5日)。”

我对薄一波同志身担重任,万事缠身,在百忙中能抽出时间和精力对此事进行调查,有无限感慨,认为如果中央纪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对此事这样热心,事情也可能老早就解决了。我看后立即复一信表示感谢!

“一波同志:

“你批示转来先念和杜润生同志的信,已收阅。您在百忙中对‘纪凯夫事件’的处理亲自多方了解,征求意见,这种精神,风范感人,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我很感激并受到教育。”

“此案情况是完全清楚的。……在1982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对此案进行了复审复议。认定湖北复查认为是错案是没有根据的。中南局1952年的定性处理是正确的。从今年3月27日到6月30日,中纪委常委会又专门讨论了六次。参加

常委会的九位常委中,有八人意见一致,同意五部委审理的结果。……中纪委,中组部,中央公检法五个部委审理组对此案的‘审理报告’中,对全案的定性处理不仅有全面的肯定意见,对每个受处分者,根据事实、情节也作了平衡;谁应减轻,谁应撤销,谁应维持原处分,也都有具体的建议(包括杜润生同志指的对张平化,吴德峰,周季方几人的处分)。……

“此案是个历史老案。但它关系几级党组织和一批领导干部的是非问题,更重要的,也反映了现在几级党组织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处理过去是非的问题。我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继续关注对此案的处理,责成中央纪委根据已查清的事实,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抓紧处理,早日结束。”

顺祝健康!

“纪凯夫事件”终于有了最后结论,中纪委发出《关于‘纪凯夫事件’一案的批复稿》

薄老和诸老同志的过问,众多坚持真理的人们不懈努力,在党组织和有关机关反复调查作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纪委”终于有了一个最后的结局。

1988年6月10日新起草的批复稿和向中央《关于“纪凯夫事件”一案审理情况的备案报告》经中纪委常委会讨论通过。这个新的批复稿是这样写的:

“《关于‘纪凯夫事件’一案的批复稿》

湖北省委、省纪委:

“1981年9月19日,湖北省委将湖北省纪委《关于‘纪凯夫事件’的复查报告》报送中央纪委审批。中央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审理此案,并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派人参加,进行了认真

的复核审理。1986年,中央纪委又对此案进行了一次复审。

“中央纪委常委经多次讨论认为,原中南局1952年对此案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确凿,认定的性质是正确的,全案不能翻。原处理正确的不予改变。原给予吴德峰、谢邦治、朱涤新同志的处分偏重,予以撤销。原给予周季方的处分,湖北省委已于1979年10月批准撤销,可不再变动。纪凯夫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他和王守正在盗款案中也没有问题。”

“李之琏同志在任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期间,参与此案的处理,是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原湖北省纪委‘纪凯夫事件’复查组对他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8年6月10日

批复件发出了,“纪凯夫事件”最后得到了处理。此案从发生到最后处理,共用了三十七年多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此案经历了五次反复。前四次反复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得到了解决,而最后一次反复竟长达十年之久才得到处理。为什么一个事实清楚,过去曾经正确处理过的案件,竟会反复这么多次呢?我认为其中有社会的因素,有党内风气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

在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所牵动的各级党组织层次之高和人员之多,是以前少有的。从党的主席、总书记、中央纪委的书记、常委、大区的书记、常委到省、市委、中央司法、公安、检察以及党的建设等部门的负责人都曾参与或过问此案的处理。在此案结束后,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些什么有益的经验教训和得到一些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在党中央号召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今天,从纪凯夫事件中找出答案是十分必要的。

张 思 德

刘树林口述
康仙舟整理

是怎样死的？

我和张思德，当年都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大生产运动时，一同上山伐木烧炭。我们小组共三人，张思德、白仓和我。

烧炭的地点在距延安 60 里的安塞县石峡峪，那一带沟壑纵横、峰峦叠翠，正是烧炭的好地方。

1942 年 9 月 7 日上午，我们又挖了一个窑洞，只需稍修理，便可启用。洞小，转不开，只能两人干活，大约 10 点钟，张思德还没有休息多会儿，就又进窑内换我。我不肯，他一手推我，另一只手将旱烟袋递给我。我走出洞来，拍了一下身上的泥土，坐在火堆旁点上烟，正准备往嘴边放。突然，“扑通”一声闷响，声不大、够惨人的。霎时，尘土弥漫、烟雾四起。我一看，不好，窑塌了。白仓的头正露在土外、两眼一眨一眨地转动着，张思德还在里面呢。一时我惊慌失措。心想，这么一大堆土，手中又没工具，可怎么办？人命关天出了事如何向组织交代。我呵斥白仓：“千万不要松劲，双臂撑紧，要是叫土压住心口不得了。我下山叫人。”说罢，我飞跑下山。

我一个劲地跑啊，跑啊。藤葛荆棘全然不顾、沟壑崖洞也不知怎么跳越，三四里路似乎一下子就到了住地。

见到同志们，我已累得躺在地上，大张口说不出话来，气喘吁吁，只是用手比划。一个老同志领会了我的意思，大声说道：“不好。山上八成出事了。”大伙儿一齐奔向山上。

白仓给扒出来了。性命保住了，可是双腿被砸坏，再死劲往里扒，大家拿着家伙无从下手。快吧，怕伤了张思德；慢吧，时间就是生命。早一会儿，可能从死神那里把张思德拉回来，晚一会儿呢？可能就永别了。

大约挖了两个来钟头，等把张思德从厚土中扒出来时，他已是七窍出血、停止了呼吸。

将他俩抬下山来，安放在大路旁。一方面尽力设法护理抢救；一方面派人送信。在这荒山野岭，既无急救设备。又无医疗人员，拿什么去减轻一点白仓的疼痛和挽救张思德的性命呢？大家束手无策，虽然没有落泪，可是

比那昊天呼号还难受。

太阳偏西，路的远方有了一个黑点。待看清楚后原来是辆小汽车，大家激动了。那小黑点仿佛可以解除白仓的痛苦，挽回张思德的性命。说小汽车，不过是辆小卡车而已。还是南洋华侨捐赠给毛主席的。

我们把他俩轻轻抬上车，由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抬着。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张思德是不行了，但还是抱着侥幸，万一要是能活过来，该有多好啊！

车，在坎坷的山路上颠簸。扬起了阵阵尘土，我们赶紧脱下衣服，将他们盖住。60 来里，汽车翻山越壑、奔驰如飞。

张思德的遗体就放在枣园礼堂，我把事情的始末经过，一一详尽地向毛主席的随从副官贺清华作了汇报，再由他转告毛主席。

白布扎的灵堂，挽联也是用白布写的，整个会场像下了一场大雪。那时，延安这么困难，中央办公厅拿出这么多的白布真是不容易。

这是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一个正式追悼会，为了一名普通战士。

毛泽东、任弼时以及好多中央首长都来了。那是 9 月 8 日下午 3 点多。

毛泽东问：“所有东西都放进棺材里去了？”

古远兴答：“是，还给他穿上了 1942 年才领到的新衣服。”张思德很节省，平时穿得破烂，军帽上都是补丁，一双棉鞋更补成了鸡窝。但他很讲友爱，经常打草鞋给战友。

毛泽东又问：“他打篮球才穿一穿的胶鞋放进去了吗？”毛泽东知道张思德最宝贝的就是那双胶鞋了。

“放进去了。”古远兴回答。

毛泽东又深情地望了一眼张思德的棺木，然后走到讲台前，没拿稿子，致起悼词来。

于是，毛泽东选集里就有了一篇专门悼念战士的话，后来，定名为《为人民服务》。

以史为鉴防止腐败

薄一波

从汇报中听到，湖南的一些领导干部正在重温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很有感触。李自成“不暇自哀”；而郭沫若“哀之”。我们共产党人既要“哀之”，更要“鉴之”。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提高反腐败的自觉性。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民群众对当前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是很不满意的。腐败，对执政党来说，确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威胁。我想起几位故人讲的话，念出来，提请同志们参考。

唐朝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最后一段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他讲的是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全国后，骄奢淫逸，欲壑难填，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很快被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而后人历朝历代大多只知“哀之”，却未从中吸取教训，以致代代相因，累蹈覆辙。杜牧这些话，哲理很深，耐人寻味。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李世民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能广罗人才，纳谏如流，同他的父亲李渊一起，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他深知隋炀帝生活奢靡，挥霍无度，政事懈怠，使得隋朝仅三十八年就衰亡了。因而，他时刻以亡隋为镜，居安思危，戒奢戒堕，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使唐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

黄炎培一九四五年对毛主席说：过去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总是从兴盛又很快走向衰败，循环往复。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黄炎培的话，语重心长，寓理至深。

傅作义将军在我们进北平时，也曾感叹地说过：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二十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过三十年、四十年是不是也会腐化？

上面这些话，确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家不妨置之案头，经常加以思索。

毛主席对党内可能发生腐败问题这件事，是十分警觉的。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期间，他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号召全党学习，提醒同志们不要重犯李自成胜利时骄傲自满、腐化变质，以致功败垂成的错误。那次学习，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胜利后继续保持清醒头脑，打败国民党，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尖锐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不幸被毛主席所言中，党内果然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3】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建国之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现象，毛主席在“三反”【4】、“五反”【5】运动中，抓住刘、张这两个典型，严加惩处。当时，也有人出来为之说情，但毛主席不为所动。这一断然措施，震动了全党，震动了整个新中国，使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廉政勤政之风，并且举国上下形成了一股清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至今仍令人神往。

我谈这些，无非是想说明三点：

第一点，头脑要清醒。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现在，人们常谈到腐败的问题。我认为，腐败现象历来都有，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但也要看到，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借鉴资本主义某些好的管

理经验的同时,确也带来了一些糟粕,确有少数党员、干部和群众经不起“糖弹”的攻击,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权钱交易、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腐败现象在滋长蔓延。对这些东西,决不能熟视无睹。腐败的“垃圾”清扫得越彻底,越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韩非子说:天下“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6】。唐代诗人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7】党的干部要经常记住这些历史教训,要充分看到腐败行为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切不可丧失警惕性。我们要面对现实,学会防腐败的本领,“拒腐蚀,永不沾”。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都要抓紧抓好,都不能软。

第二点,要有紧迫感。东欧和苏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地倒了。于是,国内外一些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坚持下去?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但能坚持下去,而且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站稳了,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有希望。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九十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各种有利条件,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同时,一定要在廉政建设上常抓不懈。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难,关键是要党内不出问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发展经济和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努力搞好廉政建设和党的建设,进一步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风波,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第三点,加强民主监督。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说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要防止腐败,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国家法律和其他制度的制约,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公民,也没有特殊的党员。要形成每个公民、每个党员都要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党员还要受到党规党纪的监督和制约的局面。我们加

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民主和法制教育工作,就是要达到形成和巩固这种局面的目的。我认为,党内监督,特别是各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相互批评和监督,尤为重要。必须建立和完善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权力的监督体系。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同时,要适当扩大各级党和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职能和权利,还要健全和完善干部的考察、选拔、培训、任免、升降、奖惩制度,以及舆论监督、群众举报等措施。只有法制健全了,民主监督制度化、经常化了,才能有效地抵制和消除各种腐败现象,有利于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1)见《贞观政要·任贤》。

(2)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3)刘青山,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他们任职期间,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治河款,克扣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贷款。将挪用的公款以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获取暴利,从中贪污、行贿,任意挥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报请中央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逮捕。十二月刘、张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二年二月被判判处死刑。

(4)“三反”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5)“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6)见《韩非子·十过》。

(7)见李商隐《咏史》。

(本文是薄一波在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汇报干部工作时的插话,原载《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本刊转发,已征得作者同意。)



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和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有一张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三个美国兵的合影。自右至左分别是：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中士爱德华·贝尔，一等兵霍华德·海曼和杰克·爱德尔曼。参加合影的中国同志中，站在毛主席左侧的是当时担任翻译的龚澎和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乔冠华。

那时候，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人民正渴望过上和平的日子。而美国政府却蓄意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甚至有美国飞机和军舰为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加紧部署。正是为了挽救和平作最后的努力，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从延安飞来这座山城，进行那著名的“重庆谈判”。那么，他为什么要在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来接见三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士兵？他们怎么能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同志？后来又怎么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共进晚餐？随后，在中美对抗的三十年中，这些美国大兵怎么样了？如今，他们又在哪里？……这里面，蕴藏着一个中美两国人民之间鲜为人知的友谊轶闻。

书店巧遇

1941至1945年，我正在昆明“西南联大”就读。当时，中美正并肩抗日，以陈纳德将军为司令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就驻扎在这个四季如春的高原城市，包括照片里的那三位在内的大量美国军人正在这个著名的“飞虎队”里服役。

1944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同时又是中共联大支部书记的马识途，正在昆明市区逛书店，这在当时是穷学生的一种免费享受。这时进来了两个美国大兵，东翻西看，似有所求，但无所获，不免流露出一丝失望的情绪。突然，他们发现马识途正捧着一本英文版的《苏联文学》杂志在看，喜出望外地走了过来，用英文自我介绍：一个叫理查德·帕斯特，一个叫莫里斯·华尔德，都是“飞虎队”的士兵。态度诚恳友好，显然在寻求帮助。

马识途用英语问他们：“想找什么书吗？”

回答不免使他大吃一惊：“我们想找一些介绍共产党华北抗日根据地情况的书。”而且，嗓音洪亮，毫无顾忌。马识途有点紧张，左顾右盼怕被国民党特务听见。马识途连忙低声告诉他们，这样的书，这里是没的，即使有也

毛泽东为何

在重庆与美国大兵合影

张彦

只是中文的。不过，马说：“你们想了解什么，也许我可以帮助你们。”两个美国兵高兴极了，立即邀马上咖啡馆去详谈。为了避免撞上巡逻的美国宪兵，马带他们走进了一家熙熙攘攘的中国茶馆。经过彼此敞开心扉的交流，富有洞察经验的马识途发现，眼前的这两个美国大兵不仅不是别有用心，还与他颇有相通之处。他们确实真心实意想了解中国，但不得其门而入。何况，他们又不懂中文。于是，马感到义不容辞应该给以帮助，满口答应介绍一些能说英语的中国大学生和他们交朋友。对此意外的收获，这两个美国兵高兴极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此以前不久，在昆明圣公会主教举行的一次社交活动中，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干事李储文也结识了两个风华正茂的美国大兵。一个名叫爱德华·贝尔，另一个叫霍华德·海曼，虽然年轻，但求知心甚切。他们也是主动找上门来，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言谈中，可以嗅得出来，他们具有进步思想，很可能在国内即已从事进步社会活动。从他们口里，李还获悉，在美军军营里有此愿望者大有人在。

当时的云南省，是地方军阀龙云的天下，与蒋介石的中央统治之间一向存在着十分尖锐而微妙的矛盾。为了促进抗日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云南地方党组织，积极贯彻执行的是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包括上层的和国内的。由马李两个渠道反映出来的这种特殊的需要，很自然地受到高度的重视。一个以马李为核心的开展国际友谊工作的无形小组形成了，前前后后参加活动的大约有十个西南联大同学，都是些英文较好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我是贯彻始终者之一。美方先后来参加者也将近十人，经常来的除上述四个人以外，还有另两个美国士兵杰克·爱德尔曼和耶尔·佛曼。

相见恨晚

从此以后，每逢星期日或节日，我们就相聚一次，人多人少不等。或在李储文主持的青年会学生服务处，或在大观楼公园的绿茵草地，或架起小舟荡漾在五百里滇池上。包饺子，吃中国家常菜，开美国罐头野餐。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最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心内容，自然是高谈阔论。我们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们介绍美国的情况，彼此都觉得新鲜，相互都感到很受启发。

这些美国青年都很热情、开朗、坦率，憧憬着一个公正、理想的社会，一个和平友好的世界。从谈吐中，听得出来，他们显然来自美国社会的基层，对于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很不满意。没有想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他们看见的却是：一面到处都是疾病，满街衣不蔽体的乞丐，一面是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利用美援物资大发国难财。他们自然十分沮丧，总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当他们听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就迫不及待地渴望了解那边的情况。

很快，口头上的“高谈阔论”演变成了行动上的“相互支援”。为了帮助这些年轻好学的美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为他们口头或者书面翻译了一篇又一篇《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的文章。他们除了自己享用，还以各种方式寄回国去传播或发表。时间紧迫的时候，我们就采取大兵团连续作战的办法进行突击。记得，毛主席的重要报告《论联合政府》刚出来时，联大党支部也只有一份油印本。为了能让它尽快传播出去，我们特邀这些美国友人来到学生服务处，为他们组织了“接力长跑”式的全书口头翻译。我们翻译了一整天，他们也就记录了一整天。



●三个美国大兵与中国友人合影

1944年10月，“史迪威事件”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刊杂志都纷纷揭露此中内幕，特别是大量报道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腐败黑暗。我们从美国友人那里得到这些材料以后，马上组织力量，突击翻译编辑成书出版，命名为《攻错集》，在社会上秘密发行后引起强烈反响。

我们和这些美国士兵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他们把中国大学生请进美国军营里去讲演，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高峰。那是一个夏季的夜晚，贝尔和海曼开了一辆大轿车，把我和另两个同学载往昆明东郊的第十四航空队军营。俱乐部里一间不算太大的会议室，灯火辉煌，竹椅子上已经坐满了几十位美国军官和士兵，正期待着陌生的中国大学生的光临，因为这还是有史以来头一回。我们一进门，立刻受到热烈掌声的欢迎。贝尔在开场白里，热情地介绍了我们之间不寻常的友谊，还宣布我将为他们介绍“中国的解放区”，又是一阵掌声。

这一晚的会虽然开得非常成功，但却为我们友谊活动带来了麻烦。不久以后，联大校园里就传开了，美军已经会同国民党派人来向学校当局追查，定要查明那天去军营演讲的学生是谁。幸好，我们用的都是英文化名，无从查考，最后也就只好不了了之。我们的美国朋友贝尔和海曼等人，却倒霉了，都上了“黑名单”。没几天，他们在部队邮局工作的朋友就悄悄告诉他们：“命令已经下来了，你们所有的信件都必须经三重检查！”但是，这并没有吓倒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相反，他们为之愤怒，更加下定决心去寻求真理。

1944年冬，日本侵略者作最后的挣扎，仍朝着中国西南方向发动疯狂进攻，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将像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那样，到云南农村去打游击战。他们听了，大为兴奋，竟然表示：如果真是那样，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也许还能在技术上发挥作用呢。

历史一笔

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了。这时候，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中国的国情已经相当清楚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预感到，中国上空正积聚着内战的阴霾。

这时候，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和对中国前途的忧虑，纷纷复员回国。在回国之前，贝尔、海曼和爱德尔曼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向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当面陈述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很长的接触。于是，通过我们

秘密关系的介绍，他们三人在回国路过重庆时联袂来到中共重庆办事处。完全出乎他们意料，出面接见他们竟是久已闻名世界的周恩来，而且是那样的热情和亲切，使他们感到毫无拘束，可以侃侃而谈他们的由衷之言。早就听说毛泽东嗜好抽烟，他们于是留下了几条他们从军营里领来的香烟，请周恩来代表转赠，以表达他们对这个伟大人物的一点敬意。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几天以后，突然来了一个通知：毛泽东主席邀请他们去共进晚餐。这三个美国大兵听了之后，无不欣喜若狂。他们久久地琢磨，这个邀请包涵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贝尔在四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期待着那一顿晚餐。他是在中国历史上如此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整天忙于世界历史上重大事件的人物，而他却愿意抽出时间来会见三个极其普通的美国兵。那是因为，在他心目中，中美人民的友谊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那天下午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贝尔继续写道，“海曼、爱德尔曼和我，快步穿过狭窄的通道，走向一座灰色房子，登上台阶。我们等候在楼下的一间屋里，门上挂着竹子编的帘子。过不一会，帘子掀起来了，毛出现在我们面前，穿的是军装，满脸笑容地向我们表示欢迎。

“当大家围着大圆餐桌坐下来以后，毛对我们每一个都很感兴趣，仔细地听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问起我们家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对战后生活有什么打算。他不会说英语，但他在听中文翻译的时候总是两眼看着我们。通过翻译，我们谈到战争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还有中美人民友谊……为此，他曾在席间多次举杯祝酒。他要求我们，回去以后，把自己在这

里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美国人。”

祸不单行

在这以后，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急剧地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的蒋介石政权，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推翻，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诞生了。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敌对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风雨交加的三十年里，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发生过的政治灾难，我们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都未能幸免。

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笼罩美国，进步势力普遍受到打击，我们的朋友们，几乎无例外地都遭了殃，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受到密切注视，连找工作也发生困难。当年与毛泽东的合影，自然成了严重的“罪证”。贝尔等人不得不把这些照片埋在地下隐蔽起来，以致相纸上至今还留下阴湿的黄色水迹。尽管如此，打击迫害没有丝毫动摇他们对新中国的向往，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加入了活跃于当时美国的进步组织“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对亚洲实行的侵略政策。到了七十年代，他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成为人民团体“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为争取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奔走呼吁。

寻根求源

美国友人的再次“寻根”之举，是在1976年的夏天，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然而斗争却更加激烈。以贝尔、海曼以及他们的家属为主要成员的“美国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访华代表团”，兴致勃勃地重新来到了阔别三十年的中国。贝尔和海曼手捧着贴满当时照片的相册，像上麦加朝圣似的重访了昆明、重庆……，走到哪问到哪，寻找他们念念不忘的中国老朋友。可是，愿望一个个都落空了。直到访华的最后一站，才算在上海找到了当年唯一使用中文名字的李储文的下落。但是，他还没有“解放”，又怎么能接见外宾呢？幸而，当时管旅游工作的领导干部岳岱衡同志思想解放，大胆批准这一特殊的会见，由李储文与夫人章润媛出面在和平饭店设宴招待。

这本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会见，可当时从思维到行动都统治着每个中国人的“政治气氛”，却把一切都扭曲了。会见时，李储文夫妇虽然内心无比激动，却不能不强压住自己的感情，只作了些一般性的交际谈话。海曼夫妇把已经二十出头的儿子带到他们跟前，十分激动地对她说：“就是这些中国朋友，改变了你爸爸一生的道路！”深受感动的李储文夫妇，这时多么想把早已在脑海里汹涌激荡的千言万语一鼓脑都倒出来啊！但是，他们没有，

只是以微笑和紧紧的握手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以至，贝尔和海曼最后不能不带着一个偌大的问号离开上海回国。

在这次整个访华过程中，他们最大的快慰是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意外发现：墙上挂的竟是他们三十一年前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对于当时的惊喜和兴奋，贝尔在四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是七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突然看见了墙壁上的那张放大照片，因时间悠久已经变黄了，然而笑容与意义依然如故。我连忙跑出去，喊我们同来的二次大战美国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赶快来。我问讲解员，是什么时候开始挂这张照片的？讲解员说，这里是毛主席与许多重要领导人曾经共同规划过革命大业的地方，自1958年起作为一个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那不正是冷战时期吗！这实在难以让许多美国人想象，即使在那时候，中国人依然如此重视与我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接触。”

在向同伴们满腔热忱地叙述了当年与毛泽东共进晚餐的每个细节以后，贝尔接着说：

“毛讲话时，对我们的未来，对所有青年的未来，充满了感情与乐观。因为他相信，青年在塑造世界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在这时候，毛提醒我们，太阳很快下山了，如果我们想照相的话，就趁光线还好的时候到花园里去。我们于是这样做了，把这个最令人鼓舞的历史时刻记录下来。我一直把这照片视为十分珍贵的纪念品，但是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人也同样如此珍视它！当然，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年夏天，我们会在重庆纪念馆的墙上发现那张三个美国兵与毛主席的合影。”

“直到今天，”贝尔继续写道，“我还能感觉得出来，在那次旅行中，成百只伸过来与我紧握的手是那样的温暖和有力。因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人们一听说我们1945年与毛的历史性聚会，立刻伸出他们热情的手与我们的手紧紧相握。在工厂里，在教室里，在饭店里，在托儿所里，我们不知有多少次被要求对他们复述我们那永远难忘的故事。”



● 作者与贝尔(中)、海曼在一起



謝富治

釘在耻辱柱上的將軍

謝富治

釘在耻辱柱上的將軍

古阳木

一九七二年的暮冬，阴沉而又寒冷。

经过六年动荡冲击的人们，心情也像这冬天一样，压抑而又沉重。几个月前的“九一三”事件，在各个层次的人心底里，都划上了一连串的问道；林彪事件以后，中国政局将向何处去？哪些要人将被无情地扫进新的历史垃圾堆，而不能再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成员？

一月至三月，八宝山革命公墓两次响起了隆重的哀乐旋律。共和国先后宣布了两位副总理的去世消息。一月六日，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因病去世。三月二十六日，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因病去世。

不算死得无声无息的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上公开宣布死讯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两人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何其相似。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和各掌一方的部长，一个对外，一个对内；都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人的患病经历也几乎相同，都是在一九七〇年，诊断患有癌症。陈毅是肠癌，谢富治是胃癌。但是，两人临终前的政治地位却完全不同。前者被斥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右派”，后者被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人们仔细比较着两人的吊唁规格和悼词，区别也是明显的。

区别之一：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一月十日，他改变了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规格，突然决定前往陈毅追悼会，使之成为十年中唯一有此殊荣的丧仪。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追悼会举行，毛泽东没有出席。

然而，谢富治在其它方面捞到了实惠。

区别之二：谢富治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下半旗志哀。而对陈毅——这位共和国

的开国元勋，却没有。有人解释说：陈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当然不成为理由。

区别之三：悼词评价高低不同。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审定，同样由周恩来宣读的悼词，对陈毅之死，称“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而对谢富治之死，则称“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在评价陈毅的一生时说：“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仅此而已。这种人为压低的政治评价简直可以用在任何一个普通党员身上。而对谢富治，却说：“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忘我工作，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光明正大，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

一褒一贬，泾渭分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盖棺定论，谢富治这个上将的荣誉，将大大超过陈毅元帅。

刘少奇在身受迫害时曾说过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因此，盖棺并不能定论。

八年过去了。人民做出了真正的定论。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中共中央指出：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人的《悼词》，并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

十一月二日，在公安部礼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庄严地宣读着“特检字第一号”起诉书：“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谢富治的名字，时隔八年，又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这次，他不仅不能再与陈毅元帅相提并论，而且是成为千万人唾骂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

一个经过长征立过战功的红军老干部，怎样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让我们从一九六六年的那场风暴说起。

一、带头造反、三气周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全会，七月二十四日才发出通知。这次会议原定议程是：一、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三、通过公报；四、通过中央政治局五月会议对“彭、罗、陆、杨”四人隔离审查的党内手续。

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会议变成了重新组合中央核心领导的一场公开斗争。八月一日，毛泽东写出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对“造反”予以热烈支持。八月四日，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中央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错误，是镇压，是恐怖。当刘少奇惴惴不安地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八月五日，毛泽东又写出了雷霆万钧的《炮打司令

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刘少奇等人斥责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

突如其来的风暴，使许多领导人目瞪口呆。连林彪也没有想到，这次全会将要将他拍到实际接班人的地位，否则，他就不会在会议进行六天之时，还在大连请假安心养病。

谢富治急促而又全面地判断着会议的风向，长期从事政治和公安工作的他，迅速作出了决定：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央一线领导即将崩溃，中央日常权力机构将出现一个真空，必须抓住机会。他选择了邓小平作为炮打的目标，因为江青、康生、张春桥已对刘少奇鼓噪而攻，还没有人提到邓小平。

他的第一炮是有分寸的，只说邓小平在全国解放以后变了，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了。但已是全会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因而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说谢富治批得好，又对陶铸没有把谢富治的发言印入会议简报，而只另印小范围发下，表示不满，说陶铸把这么重要的发言都不编上简报，不让大家看看。

谢富治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八月十二日，全会的最后一天，他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次步入了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初战告捷，他庆幸自己押中了这一宝。两个月后，又连篇累牍地向刘少奇、邓小平射出了新的大量炮弹。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清算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他精心地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他说：刘、邓昨天的检讨很不深刻，无论事实和思想都很不够，没有触及灵魂深处，连在生活会上已揭发出来的问题，也有许多没有讲。他

说：刘少奇的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最严重的是他对主席的态度，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妄图取而代之，这是最令人不能容忍的。

他特别提到了自己攻击的专利对象——邓小平，再次将邓小平作为重点靶子。他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

谢富治最后激动地提出：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

人们知道，自从十月初林彪批准那个“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紧急指示”之后，所谓县团级党委已经全面瘫痪。谢富治提出要起码在县团级批判刘、邓，实际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运动推向全社会。果然，不到两个月，张春桥就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打倒刘、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涌向街头。始作俑者，谢富治可以算一个。

一九六七年，眼见刘少奇、邓小平已成“死老虎”，谢富治又开始寻找“立新功”的机会。

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在激烈地进行。

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人拍案而起，大义凛然地斥责与会的蒯大富、张春桥、王力、关锋等文革小组成员。也许是慑于气势，也许是为了“引蛇出洞”，“文革”秀才们除了关锋有几句争辩外，其他的人都唯唯喏喏，噤若寒蝉。

谭震林愤怒地吼道：“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

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谢富治也许觉得以自己副总理的身份，可以讲几句维护“文革”的话，此刻便插嘴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却不买帐，瞪着谢富治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当余秋里拍着桌子发言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谢富治又不断地插话，捏造说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李先念立即指着谢富治：“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最后气愤地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又别有用心地旁敲侧击：“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谭震林怒不可遏，对他喊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把会议记录有枝添叶拔高地整理出来，由江青引见，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于是，老帅们和除了谢富治之外的其他副总理，统统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谢富治却博得了文革小组的青睐。

张春桥向江青汇报，谢富治是唯一发言为他们辩护的人。江青大加赞赏：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

批判“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终于被迫停止了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江青立即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成员。毛泽东也许认为公安部长参加“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有些不伦不类，回答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于是谢富治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正式和江青集团联手，

沉湎一气。

说起这个碰头会，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它在当时不可一世的势炎。它是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凌驾于党政军一切权力机构之上的畸形怪物。成员除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外，再加上几经淘汰后留下的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方是林彪集团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即军委办事组；连同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公安部长谢富治，共十二人。周恩来为了不使大权被他们独揽，主动提出参加了这个会议。不难看出，这个组合除周恩来外，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林彪、江青集团的全部主犯。周恩来周旋其间，孤力撑持的困难可想而知。他不仅要应付那些文人、军人的夹攻，还时常要防备另一个，也是除他之外唯一的一个国务院成员——谢富治从背后打来的几下冷拳。

“文革”期间谢富治演出了令周恩来寒心，使江青叫绝的“三气周公”好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在接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组织时，公然鼓动他们去占领劳动部、总工会。谢富治立即效尤，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与周恩来接见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主动建议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

周恩来先是气得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堂堂公安部长竟然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自毁长城。继而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谢富治这时还对周恩来有几分畏惧，讪讪地附和了几句。但是半个月之后，他又秘密召见“政法公社”的头头，布置说：“你们先派点力量去，骨干进去，每个处、局都去了

解情况。然后再派人去。”也许是自觉公安部长勾引人冲公安机关有些“内奸”相，他一再叮嘱说：“我们在这里商量，可不能往外说。我在这里指挥还行啊？！”“接管市公安局的消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当清华井冈山造反派冲进关押要犯的秦城监狱时，谢富治一面打电话给造反派头目说：“你们的事总理都知道了，要你们撤出。”一面又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支持你们。”

待到周恩来知道谢富治仍在捣鬼时，全国夺权风潮已经浊浪排空而来，他只好忍下了对这个两面派部长的第一口气。

批判“二月逆流”以后，谢富治不再躲躲闪闪，也不再满足于为中央文革敲边鼓，他充当了赤膊上阵的主将。

一九六七年三月，在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公安部除了效忠林彪、江青的副部长李震、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都被夺了权。周恩来忧心如焚，他在接见山西代表时气愤地说：“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剃头战术。”公安部的一些单位传达了讲话。谢富治立即把李震等人找去，批评不该传达这类“小道消息”。有人说这是正式记录。他仍强硬地说，那也不能传达，并亲自召见处以上干部，宣布“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其后，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来抓工作，他都不理不睬。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谢富治已死，公安部才在周恩来催促下，解放了刘复之、于桑等副部长和一批干部，撤销了军管。周恩来积郁难平地感慨道：公安部“现在组织没有了，制度没有了，办法也没有了。”这是“二气”。

最厉害的“一气”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外事系统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策动下召开批判陈毅的预备会。会前，外交系统一派在外交部门前举行静坐绝食，要求揪出陈毅，称之为“安营扎寨”。周恩来几次要谢富治去劝说学生们离开，以国家外交大局为重。谢富治来到现场，却火上浇油地说：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致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在这次预备会上，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造反派不要打倒陈毅，要允许他改正错误。谢富治却操纵会议，公开挑动群众把陈毅搞臭。周恩来气愤地当场质问谢富治：“把陈毅同志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谢富治来当？！”谢富治却根本不予理睬。气得周恩来悲愤地说：“我把这口气吞下了。”

批判陈毅的那天，周恩来因外事活动离开，谢富治坐在陈毅旁边。造反派不断地煽风点火，批判的口号越喊越响。一个穿红背心的家伙，跳上台，正要抓陈毅的衬衣，举手要打……谢富治无动于衷。刚回国不久，坐在台下的一位驻外大使霍地站起身来，眼中喷出怒火，指着谢富治厉声喝道：“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谢富治仍是装聋作哑。那个要动手者却愣住了。警卫人员急忙过来，把陈毅挽到了后台。大使缓过神来，伤心地喃喃道：“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谢富治太不像话了！”

其实，谢富治岂止是不管，他简直就差亲自动手打人了。

八月十九日，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谭震林大会。周恩来临时离开会场，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他



●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7月22日谢富治从武汉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前排右三为谢富治。右二：康生，右四：吴法宪，右五：关锋，左二：蒯大富，左三：邱会作。

走后，谢富治的老婆、卫生部后来的部长刘湘屏竟然跳上台去，左右开弓劈面打了谭震林两个耳光。随后，三个大汉一跃上台，拳打脚踢，把谭震林打倒在地，然后在背上踏上两只脚。

如此公安部长，如此公安部长夫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焉能不搞得天下大乱！？

二、推理铸案， 无奇不有

“文革”千古奇冤，首推刘少奇冤案。谢富治身为公安部长和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负责人，为林彪、江青集团诬陷刘少奇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举行碰头会，对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决定设立专案进行审查。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十二月十八日，谢富治拟就了一份名单：组长谢富治，组员有江青、萧华、叶群，顾问陈伯达。后来江青把她的名字换成汪东兴，陈伯达任顾问是林彪提议的，萧华不久则被打倒。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七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以上干部会议人员后，议论了有人提到的“刘少奇叛党嫌疑问题”，决定交由王光美专案组调查，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正式铺开。

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一直秉承江青的意旨办事。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的向江青

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开口一个江青，闭口一个江青。一付奴才像，真不敢相信专案组谢富治是组长，江青只是组员。

如果说康生、江青是惯于陷害人的刀笔杀手，那么担任共和国公安部长、副总理职务多年的谢富治，难道丝毫不顾忌法律的尊严？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在专案组中的推理手段，已到了小说家的地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谢富治对专案组说：“逮捕的，不算多。一百多个人，没有一个劳动人民，就是案子不成立，也冤枉不了他们。所以，这个没事。”

九月十四日，他竟然说：“这是关键，抓得对。他们有个反动的社会基础，你闭着眼睛都可以抓一堆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他对陆定一专案组说：“陆定一七八成是个叛徒。”

十月二十三日，他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

“七八成”、“八九成”，“闭着眼睛抓一堆”……这就是堂堂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案逻辑。

谢富治办案的另一特色，是他幻想的手段，也到了小说家的地步。

再举一个荒唐绝顶的例证。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北京发生了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据目睹传单者回忆，传单指出：自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

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传单点了中央文革和林彪的名说：陈伯达是个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枪杆子，助纣为虐。传单唯一称赞的是周恩来，说现在局势所以还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只是因为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

十一月二十日，此案在天津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公安部门的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陈伯达、谢富治却认定必有后台，授意专案人员要把它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月，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陈伯达说：“你们所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没摸到，就是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谢富治更具体布置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万里……”

几天之后，身为副军长的赵登程拿出了个《在京的作战方案》，抓住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要她交待后台。周慈敖在刑讯逼供之下，胡诌出朱德等几十个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专案组还追逼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周慈敖不知道如何回答。审讯者又有意见说：“你们这批反革命分子是钻到党里面来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是党里面的反党小集团”。于是周慈敖便借梯子上楼，胡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十二月，谢富治看到这份天方夜谭式的材料，如获至宝地指示：“你们报告周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

经过上下一致的“创作”，周慈敖在近乎精神失常的情况下，于五月三十日写出了一份旷古未闻、可入《今古奇观》的《关于伪党中央产生过程的补充交代材料》。为了让读者了解那个荒唐岁月的奇闻，照录几段：

“伪党秘密代表大会是在六七年七月十五左右在原中直机关九号小礼堂秘密召开的，事先只有代表们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大会是在上午九点半钟开始，会场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前来参加大会的反革命集团大后台有：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宁一、董必武、聂荣臻等人，另外还有杨成武、余立金、萧华、傅崇碧、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赵毅敏，刘晓、刘长胜等人也都坐在主席台上。从北京伪党委方面，反革命分子周景芳还有徐凯也前来参加并坐主席台上。从大会代表成员来说，包括有各条系统各部门选来的代表二百多人，秘密代表大会由朱德主持召开，他致开幕词。”

“陈毅曾经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伪党任务的报告。伪党总后台朱德曾经作总结，黑会结束之前。”

“就在这次秘密黑会拼凑完伪党中央后，曾收到苏修、越修、朝鲜、蒙古、南越等国头目及修共党中央的来电来信等表示祝贺。贺电贺信中都包含对这次秘密黑会‘胜利’召开祝贺的内容。”

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谢富治接到这个编造的材料如获至宝，但因牵扯到的要人太多，他不敢把这个纯属梦呓的材料上报毛泽东。但他却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两个月后，他又指示“伪党”专案人员：“要对它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

须知，这是中共九大刚刚结束四个月，朱德、叶剑英、陈毅、李先念等一大批领导人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时刻。

这就是中央专案组负责人谢富治的专案内容，这就是公安部长任期十年后的政绩。

三、不管“公安”，只管“私安”

如果说谢富治在诬陷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方面不遗余力的话，那么他在维护江青等人的利益方面也效尽了犬马之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由谢富治起草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专政工作的指示》（“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攻击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凡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百法俱废的年月，唯有这个“公安六条”被忠实地执行了，成为镇压群众的一把屠刀。多少人因为反对林彪、江青集团而被投入了监狱，惨遭迫害，甚至

被杀；多少人只是对林彪、江青稍有不满，便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横遭批斗。

公众的安全，在谢富治眼中已不存在。他只顾维护林彪、江青集团，也就是他私家的安全和利益。他多次指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他眼中的林彪、江青一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个寒风刺骨而社会上又狂热无度的冬天。一天晚上，谢富治通过秘书要公安部一个干部把一批绝密材料全部送到他那里，并说：这些材料“好人坏人都有，好人坏人不分，是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样的材料放着也不安全，如被搞到社会上影响不好，材料准备全部烧掉。”然后，他把这些神秘的材料放进小皮箱里，亲自驱车送往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叶群立即和谢富治进会客室密谈。不久，不可一世的江青也来到了这里。一会儿，出现一副奇怪的场景：

谢富治蹲在地上，从皮箱里当着江青的面往外一份份地拿材料，嘴里还不住地说：“全烧掉，全烧掉！”江青、叶群这两个当世最骄横的女人站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素来怕风怕光、禁忌颇多的林彪也不畏风寒，坐在沙发上观着。

随后，叶群在前导引，江青、谢富治亲自手捧材料，走到楼下一间屋子里，把材料一份份塞进炉子。火苗窜出了炉膛，映照着江青、叶群、谢富治表情异样的面庞。大家仍是一言不发。终于，一大包材料化成了灰烬，谢富治还不放心，用铁钩又捅了几下。

临别，江青带着满意的神情，与谢富治低声耳语了几句，然后，匆匆离去。

这是一批什么军国机密，竟使

得林彪、江青、叶群、谢富治这些中国跋扈绝顶的大人物如此紧张，非要亲自动手烧毁后方得心安？

这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烧毁的是一些有关暴露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秘密毁掉它，是为了保护江青过关。

不仅对江青，对江青集团的每一个成员，谢富治都唯命是从，忠心耿耿地卫护。

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在提审中，案犯详细谈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所盖章时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认为他们是炮打姚文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便向青海公安厅报告，将两个调查人禁闭起来。

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事前同意调查的副部长李震叫来狠骂一顿说：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其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两个外调者被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同时，将姚蓬子的材料用一专柜封存，运四川档案库，规定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谢富治对江青集团的保护，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他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完全绑在了江青等美驱赶的战车上。因此，只管私安，不管公安，是他这个部长的唯一职责。

四、煽风点火，挑动群斗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是鼓动群众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特点，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有人曾在《人民日报》上拟过一副对联：当权派当权当权派当权，群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特色。其中，也有谢富治的一份不可埋没的“功劳”。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由大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犯有严重的错误，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作为执法机关首脑的谢富治，表现又是如何呢？

八月，他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

于是，在“破四旧”的队伍中，出现了这样的阵容：街道干部，派出所干警带路，红卫兵冲进去打人、抄家，警察在外袖手旁观，以防被打者反抗。在谢富治的煽动和怂恿下，北京打死人的情况极为严重。从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为主的半个月，共打死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其中西城、崇文、海淀、东城区分别以三百三十三人、一百三十九人、一百二十四人、一百一十六人高踞前四名。同一期间，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达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八人，被抄家的

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

随着运动的发展，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他们组成了“联动”，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谢富治却摇身一变，由保护红卫兵转向了镇压的刽子手。“联动”愤怒地喊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月六次冲进了公安部。

谢富治露出了狰狞的面孔，秉承中央文革的意旨，他下令先后抓起了四百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一九六七年七月，以武汉“七二〇”事件为标志，全国各地掀起了武斗高潮，中华大地一片血雨腥风。“七二〇”事件，是谢富治直接炮制的一桩杰作。

七月，毛泽东出发南巡。他的目的，是通过亲自解决南方几个省的内战混乱问题，为“文革”由“乱”向“治”找出一条途径来。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先期飞往云、贵、川，处理当地的严重局势。

七月十三日，谢富治接到电话，是周恩来打的，要他立即前往武汉，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因为驻守武汉的部队原是谢富治的部下，湖北又是他的家乡。

十四日，谢富治、王力一起飞到武汉。当晚，毛泽东抵达，他说：“陈再道要保，对百万雄师，还要当群众组织看待。”当时，武汉乃至湖北，分裂为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是“百万雄师”，支持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人数较多；另一派以“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华农”、“新潮大”为主，反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人数较少。前者被中央文革视为“保守派”，后者则封为“造反派”。

毛泽东当面指示谢富治、王力，对群众组织不要发表倾向性的表

志,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把工作做到那些要打倒陈再道、钟汉华的人,不仅不再打倒他们,而且还要拥护他们。

当晚,谢富治和王力跑到湖北大学、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公开露了面。街上贴出了欢迎谢、王的大标语。

七月十八日晚,周恩来返回北京,谢富治、王力前去机场送行。在机场上,谢富治灵机一动,提出要到造反派的据点水利学院去。王力有些犹豫,说主席要我们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谢富治说,百万雄师总部我们去过了,只有这个“最坚定的造反派”水院还没有去过。于是,两人驱车前往。

凌晨三时,在“红水院”体育馆,谢富治、王力发表了明显支持造反派的讲话。谢富治说:“你们造反派风格要高,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放心……”前一天,他曾对造反派“三钢”代表说:“听说百万雄师就要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你们马上采取紧急措施,要积极主动。”“我们到武汉四天时间来你们这儿两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罗!我们是为你门好嘛。”王力也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七月十九日下午三时,在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力训斥军区的高级干部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谢富治则更加怒目指责:“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你们打击造反派,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你们与百万雄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也硬要穿一条裤子。”“‘三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是对的。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么能揪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呢?”说

到这里,他大发脾气,眼睛一瞪:“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七月二十日,谢富治、王力支持造反派,打击百万雄师的讲话传出,武汉沸腾了!愤怒的军民出动卡车上街游行,炮打王力,继而冲进东湖宾馆,揪走并殴打了王力。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在林彪等人捏造的“武汉兵变”的谣言威胁下,毛泽东被迫迅速转移到上海。

谢富治没有受到冲击。因为他是武汉部队的老上级,武汉人民的家乡父母官,还给他留了情面。但他却捞到了极大的“荣誉”。七月二十二日,谢富治与被营救出来的王力一起乘专机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了除毛泽东、林彪之外的全部要人的热烈欢迎。七月二十三日,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胜利喜讯”。七月二十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除毛泽东之外,包括林彪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号称百万人大会。

谢富治手挥小红书,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成为风暴的中心,声望达到了“文革”中的顶点。“七二〇事件”后,他没有手软,继续鼓吹揪武汉地区的军队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百万雄师”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百匪”;武汉军区独立师被定为“叛军”予以解散。湖北掀起了大规模的揭查批斗。据统计,被打死打伤者超过万人。

这就是谢富治给家乡人民带来的“德政”。

谢富治给自己部属带来的另一项“德政”就是以公安部长的身份,公开鼓吹“砸烂公检法”。

无独有偶,谢富治与王力,这两个共同制造了“七二〇”事件的乱世英雄,又在八月七日各发表了一次著名的造反讲话。

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鼓吹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

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他说: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很有意思。在去年,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风暴以前,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

“那么多的公安机关为什么老是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这个根源,要归到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特别是彭、罗。”“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

他还特地嘱咐:“今天讲话用什么小报,非正式的报纸,给下边送一些去。”

讲话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了阵阵恶浪。公安、检察、司法机关被强占,监狱遭到冲击,甚至有人提出“打开监狱找左派”,广大公安干警遭到揪斗、迫害。在谢富治授意下,制造出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案”。一百五十五名处长、分局长以上的干部中,有七十二人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十名正副局长全部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公安部,七名副部长、四十三名正副局长、六十三名正副处长被定为“阶级敌人”。据“文化大革命”后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除西藏外,公安人员中有三万四千余人遭到打击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一千二百余人,打伤致残三千六百余人,拘

隋文帝一夫一妻

翟墨军

皇帝，都是妻妾众多、嫔妃成群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中国远古时期的舜帝，被后世称为圣人，他有两个著名的妻子，伊娥皇和伊英女。周朝皇帝为妻妾们排定等级：一级皇后一个，二级夫人三人，三级嫔九人，四级世妇二十七人，五级女御八十一人。再往后的朝代，皇帝妻妾过多，周制五级容纳不下，从五级扩大到十六级，级内又分若干等次，多达千人。而隋文帝的一生，基本上保持一夫一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隋文帝杨坚和妻子独孤氏，都是北周五朝的将门后代。杨坚不仅是北周公认的美男子，而且还长有一副贵相，一位星相术士在他们大婚之日，偷偷对独孤氏说：“你要看住他，他能当上皇帝，会妻妾成群。”独孤氏在当晚的洞房中，向杨坚提出永远不准娶小老婆的要求。

贵人之言不足为据，杨坚这个新贵人却信守诺言，没有娶小老婆。转瞬间，杨坚从将军当到宰相，在相位一脚踢开九岁北周静帝，自己当了皇帝，四处征剿，平定天下，创建了统一全国的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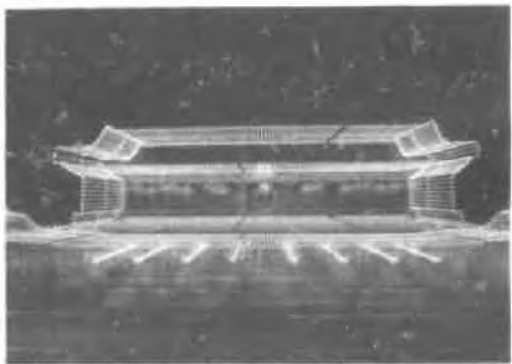
杨坚称帝之后，仍然信守不纳妾的誓言，尽管身边美女如云，上朝时总是把人老珠黄的老妻抱上御车，同车过市。当时的大小官员人等，都摇头咋舌，自叹弗如。也有人怀疑其生殖器官有毛病，其实非然。杨坚与独孤

氏生有五个儿子，文的能吟诗作赋，武的能一拳打死恶熊。而且杨坚也的确有一次不忠于妻子的行为，被独孤氏当众揭穿，杨坚未敢再造次。

那是一天中午，杨坚想与独孤氏作欢，而独孤氏有午睡的习惯。杨坚睡不着，起身到书斋去。迎面来了一位宫女，长得美貌绝伦，引得杨坚欲望升腾。杨坚主动搭讪：“哎，你姓啥？”那宫女马上跪伏在地，说：“奴姓尉迟，祖父被砍头不关小女事，望陛下开恩。”原来独孤氏使用的宫女都是杀属，杨坚忘记这一点。他觉得无趣，正想走开，看到四处无人，便对宫女说：“你跟我来，我会待你好。”杨坚在书斋与尉迟宫女作欢之后，对宫女说：“明天这个时候，你再到这里来。”

第二天中午，杨坚乘老妻午睡之机在书斋等尉迟宫女。等来的是尉迟宫女血污的人头，紧跟着独孤氏又腰闾进来，指着杨坚鼻子大骂。杨坚无地自容，从此不敢再乱来。

独孤氏五十岁病死，杨坚也年近花甲，不再立后，只立两位美女为夫人。由于心情不好，一病不起，六十二岁随亡妻而去。



捕判刑一千三百余人。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谢富治对待下属，竟是比禽兽还不如。

“王八七讲话”被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判定为“大大大毒草”。八月三十日，王力被隔离审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谢富治的“谢八七讲话”却依然流传，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直到死，谢富治都安然无恙，平步青云，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谢富治自己为他人编织了诬陷、迫害的大

网，他也终究逃不脱人民的法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陈云等老同志提出了康生、谢富治的严重问题。其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谢富治的罪行进行了调查。最终，他被清除出党，骨灰匣也被请出了神圣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殿堂，揭下了覆盖的庄严党旗。

悼词，只有镌刻在人民心中，才是不朽的。一切伪饰的巧文，终成过眼烟云。

一九六六年以前的谢富治，并

不是一个坏人。他出身贫苦，做过木匠，投身革命后，无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屡建战功；建国后也为党和国家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谦恭诚实的，为什么竟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滑进了反革命集团的泥潭？是“文化大革命”暴露了一批坏人，还是“文化大革命”使一些原本不错的人走向了反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

戏台女皇梦

——样板戏秘闻实录

过五关，斩六将。皇冠正向她闪烁着勾魂夺魄的光芒。
她迫不及待。赤裸裸地抱起文艺的武器，冲向权力的终极点。
文艺舞台的幕后，刀光剑影，演出着一场接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戏。



(一)“无标题音乐”风波

实录之一：

1972年8月，中央广播电台为罗马尼亚国庆日可否播送一些该国民间音乐请示中共中央，总理周恩来亲自作了批示：

“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果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

江青针对周恩来的批示，狠狠地注上一笔：

“千万不要因为外交关系，把靡靡之音在我们的电台广播。文化组的同志们应提高警惕，慎重对待。”

实录之二：

同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谢尔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总理特意指示中央乐团团长、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请中央乐团为这两国外宾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为谢尔的演出，被于会泳以“排练时间紧张、质量不能保证”为由，下令停排。

轮到为基辛格演出时，江青又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宣传“宿命

论”为由，强令中央乐团改演“贝多芬第六交响曲”。

其后，报刊上出现了公开批判“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文章。

实录之三：

1973年9月，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出。准备上演的三套节目，本是经过双方多次商谈确定的。

该团抵达北京的前两天，江青突然私自点了另一些曲目，强要该团改变节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

“不要强加于人，节目不能改。”

外交——文艺——政治——阴谋。周恩来与江青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硝烟、听不到枪声，却弥漫着十足火药味的战场。

1973年8月13日，周恩来就当时的历史环境，为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对国家文艺事业的摧残，保存文艺队伍，批示将江青意欲砍掉的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合并为中国歌舞团，下设东方歌舞队；并对组建中国话剧团、中国歌剧团也做了指示。

江青的亲信们一直拖延不予执行。

上述几个团体虽然在各种压力下，相继成立，却长期没有戏演。

早在1970年，周恩来委托外交部请中国舞剧团演出一场舞剧《红色娘子军》招待国宾。

当时，《红色娘子军》正在拍电影，但舞剧团的领导表示：“国家的任务，我们可以担负。”

于是，外交部向中央正式报告安排文艺晚会，请中国舞剧团演出《红色娘子军》。

江青看到文件后立刻叫人打电话给外交部，说中国舞剧团很忙，不能安排演出。可外交部告诉她，此事已和舞剧团谈妥了。

江青大发起脾气。她叫来张春桥，姚文元，一同找文化组成员开

会，追查责任。

“样板团我都管不了啦？你们到底听谁的？”

张春桥不阴不阳地火上加油：

“你们中国舞剧团难道是属于外交部领导的吗？剧团应该明确地属于文化组管辖范围嘛，是应该由江青同志领导啊！怎么可以跟着外交部那条线的指挥棒转呢？”

“回去检查，写检讨！”一般来说，这就算江青“宽容”了。

两天以后，周恩来、吴德、江青陪同国宾观看《红色娘子军》，再次发生了令江青大动肝火的事。

因为是国宾，一切要以外交规格礼宾，剧团向外交部礼宾司请示，在演出结束后应该演奏什么曲子。这个时候外宾和陪同观看的首长都要登台与演员握手合影。

通常情况下，这种场合使用的曲子只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可这曲子在外交场合演奏很不合适，颇有强加于人之嫌。

剧团介绍说，没有其它曲子了，如果《大海航行靠舵手》不合适的话，就什么都不奏，让大家鼓掌吧。

礼宾官想了想，说“等我请示以后再说。”

中场休息的时候，礼宾官趁总理同外宾谈话的空档儿，请示了剧终曲问题。然后，他转告剧团，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

演出一结束，江青气急败坏地走进休息室，象一颗炸弹，对着文化组组长吴德爆炸了——“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李劫夫是谁，难道你们不知道？林彪的死党啊！想给他翻案？”

临走，她甩下一句话：“这事没完，马上把真实情况给我报上来。”

第二天，江青即在钓鱼台召集了一个会。

她身边坐着张春桥、姚文元，对面是等着挨批作检查的文化组成员：吴德、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

江青坐在沙发里，翘着二郎腿。脸上不阴不阳，话中带刺地说：

“今天把你们找来，做什么你们知道。当着你们组长的面，给你们整整风。”

吴德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不知该怎么表态。

“要好好教训你们，否则还象话吗？”

前一天晚上并不在场的于会泳和浩亮，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没头没脑地挨了一顿批。

江青接着说：“我把春桥、文元也请来了，一起来整整你们。于会泳、浩亮，你们别以为没你们的事。有我出席的文艺晚会，你们也不去照顾一下？这是责任心问题，态度问题，你们也要好好检查。”

“刘庆棠！”江青用手指敲打着沙发的扶手，声调变得严厉起来。

刘庆棠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昨晚，是他在剧场值班，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他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他紧张而恭敬地听江青教训。

“规定好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什么不唱？非要去奏什么《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李劫夫的曲子，你不知道？李劫夫还给林彪作过曲子呢！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刘庆棠张了张嘴，照着礼宾官的话说了一遍。江青立刻打断他：

“我还在这场呢，为什么不请示？”

刘庆棠十分认真地解释说：“那礼宾官请示了总理，是总理指示让……”

“住口！”江青怒火万丈地打断了刘庆棠。

“你好大的胆子！你说这话的意思是分裂中央！你是想挑拨我和总理的关系吗？”

刘庆棠一惊，当场吓哭了。这位芭蕾舞台上高大完美的“党代表”，在江青面前哭成了泪人儿，他一边哭，一边检讨。可怜兮兮的样子，把身边的于会泳和浩亮搞得心里很不

是滋味。

张春桥总善于在最关键的时刻讲最关键的话：

“江青同志批评你们，是对你们关心的一种表现。对你们要求严格是对的。这样才能使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小心从事。”

小心从事！

张春桥的这句实在话，成了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凡事都能小心到江青的每一个眼神。

1974年3月5日，江青借审查节目之机，教训李德伦：

“谁要你练那些外国交响乐的？”

“……”李德伦不答。

浩亮语含煽动地抢先告状：“是总理！”

江青皱起眉头，嘴角挂着一丝奸笑，两眼望着窗外，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李德伦：

“余年不多了，带着洋框框去见马克思，好意思？！恐怕要去见上帝，马克思不要你！”

谁都知道，她是在咒骂总理。

江青要寻找机会给周恩来点厉害，爪牙们在等待时机奉迎主子。

波及全国的“无标题音乐”风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无标题音乐”，实在是个小题目，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突然被江青抓住机会，“大作”起文章来。这一点，连江青的亲信们自己也颇感惊讶。

1973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问题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同时附上有关曲目的说明和作者简介。

此报告由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多人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委员圈阅，均未提出异议。

江青却在己之名下拉出一个箭头，批注：

“文元同志和我有批注在后



面。”

报告附件之一，是“曲目说明及作者简介”，其中写了如下的文字：

“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属于欧洲器乐演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曲目’。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和标题。仅仅表现作者某种情绪的变化和对比，音乐一般来讲还比较健康明朗。”

姚文元在此页批注：

“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表现某种情绪变换对比而无社会内容，这个理论问题还可以研究一下。”

在此，姚文元将原文“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篡改改为“无社会内容”，把报告中对土耳其音乐家演出的几首具体作品的简要分析，借题发挥，无限上纲为对整个“无标题音乐”的“理论分析”，加以“研究”

江青在此报告上批注：

“同意文元同志的意见，不能脱离阶级立场空谈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有标题音乐他们也可以完全脱离标题乱奏一场。李德伦同志应当为中央提供正确的材料参考，不要使我们上当。”

张春桥跟着也作了以下的批注：

“同意江青、文元同志批注。中央乐团不但应向中央作正确的介绍，而且应当考虑如何向观众作正确的介绍。”

中央乐团方面感到事态严重，对“有标题”、“无标题”音乐问题作了检查，并急于作表态：

“那些标榜音乐不表达任何思想内容的资产阶级作曲家的作品，也是十分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反动的世界观。”

……

土耳其音乐家的来访被耽误

1973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对外友协”的补充请示报告上批示:

“原土耳其两音乐家似趁他们五十年国庆来华访问演出,现在国庆节已赶不上,11月是否愿意来,需与土耳其方商谈再定。”

“对外友协”在与土耳其方面确定了来访演出日期后,第三次打了报告。

周恩来于1973年11月26日批注:

“有关演出日期、简介,李德伦同志已分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请予审阅。……”

没料到江青在周恩来已经同意的报告上又制造事端。她于11月18日在第三次报告上批道:

“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

张春桥、姚文元都划圈表示同意江青意见。

周恩来阅后,针锋相对地批示道:

“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

江青恼羞成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故意挑起矛盾,把内部文件涉及的问题抛撒到社会上。在全国音乐界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无标题音乐的讨论”。

同年12月,文化组在民族宫剧场召开首都文艺界群众大会,传达江青对“无标题音乐”的批示。

于会泳明知江青挑起事端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却偏在这次大会上公开指责请“无标题音乐”家来华演出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问题。”他还阴险地引用了一句台词:

“繁枝密叶参天长,
总有树根土内藏。”

以此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总理。

江青还嫌不够,她要將事态进一步扩大。

1973年12月25日,经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精心策划,文化组在天津召开了一个全国各省、市文化局负责人及音乐界知名人士共11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

于会泳在会上作了十分恶毒的攻击与宣传,他说:“有人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公开跳出来,非常嚣张。这股风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成果,替文艺黑线翻案。”

他还指名地指责,“某些人崇洋思想抬头,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渗透丧失警惕。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种现象。”

浩亮说得更直截了当:

“在国际交往中,就有人把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和意识形态问题混为一谈,这是要历史开倒车!”

于会泳还不打自招地说过:“‘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与批判,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因而必须要‘大作’。首长的批示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抓大事的榜样。”

江记舆论宣传工具“初澜”、“江天”,也在报纸上相继接应,摇旗呐喊,把批判的声势规模和范围越搞越大。

对“无标题音乐”别有用心的批判,一直从1973年12月,持续到1974年4月。

(二)《三上桃峰》为谁翻案

1974年1月,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几个代表队,各自带着自己的“拿手好戏”兴奋地到达北京。

节目共20台。这是继“样板戏”占领文艺舞之后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文艺调演,各地很重视,带来的戏都经过各省领导一审再,郑重其事

地送到首都的。

可是,戏还没演,山西省代表团的领队——文化局副局长贾克,就骂了“祖宗”。

他们带来4台戏,晋剧《三上桃峰》为其首。按照调演的有关规定,各剧目先要介绍剧本及剧目情况,这一关,《三上桃峰》就没过去。

“据调查,这个戏的背景有严重问题。它是根据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一匹马》的通讯编写的。这篇通讯歌颂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此戏在内容上,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的倾向也很明显。我们认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是当前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这是于会泳关于《三上桃峰》一戏写给江青的亲笔信。

最忌写真人真事,又与王光美不共戴天的江青,借此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三上桃峰》事件”。

晋剧《三上桃峰》的故事十分简单:

杏岭大队将一匹病马当好马卖给桃峰大队以后,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青兰三上桃峰认错,赎回病马,支授好马,以小见大表现人民公社化后,农民的新思想,“歌颂共产主义风格。”

在山西省委的肯定下,该剧在山西广为流传。省文化局直接抓了晋剧院和京剧团这两个最大的戏曲艺术演出团体,同时排演此剧。全省还有几十个地、县剧团也争相排演,并到陕西、内蒙、河南、甘肃、宁夏等地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与“样板戏”相比,《三上桃峰》显然很受群众欢迎。有的省还移植了这个戏。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打算将它拍成电影。

这一次,山西是把《三上桃峰》



当做“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目”推荐来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

谁知，刚到北京就当头挨了一闷棍。

《三上桃峰》被指责为“为刘少奇翻案、为王光美歌功颂德并有不可告人的政治背景。”其根据有三：

第一，剧本取材于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骑马记》。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在1965年7月25日的《人民日报》和1965年10月5日《中国青年》。两篇文章讲的是同一件事，都是在王光美“蹲点”的抚宁县发生的，是“桃园经验”的结果。

第二，王光美曾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三上桃峰》剧中的女主人公青兰，也给桃峰大队送去一匹大红马。这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歌功颂德”。

第三，“桑园”改为“桃园”，“桃园”变成“桃峰”，“是念念不忘‘桃’字，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招魂。”

为一棍子打死《三上桃峰》，在创作手法上，它也被定性为“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

为引导批判方向，“导批”文章中，出现了这样荒唐的指责：

“戏里渲染这匹患有‘脑迷症’的病马，说它‘不能猛骑快跑’，终于

病死。在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跃进年代里，剧本却编造了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其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是与刘少奇、彭德怀之流，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的黑话相呼应的。”

另一条枪毙《三上桃峰》的理由，是因为它违背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没有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中间人物活跃，反面人物嚣张，正不压邪。

批判说：“支部书记不抓纲、不问线，只是围着病马转，只抓‘马情’，不抓‘敌情’，是刘少奇黑修养式的接班人，是一个放弃斗争的政治庸人。”

……

起初，对《三上桃峰》的指责与批评，受到了山西省代表团的坚决抵制。省革委会文教部副部长也专程来京，给剧组鼓劲儿。他说：“我看《三上桃峰》政治上是革命的，艺术上是健康的，方向也是对头的。”

文化局副局长贾克也十分坚定地表态：

“这不是毒草，我们还要演！”

但是，大规模的批判会，劈头盖脸地压下来。

根据国务院文化组关于《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二月初，在京的四个样板团和会演代表团部分成员100多人，由文化组牵头召开了一个批判大会。山西省代表团遭到威胁：

“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三上桃峰》的戏呢？……山西省各级领导同志要考虑一下……这么大的事能完吗？没有这么简单，完不了的。”

与《三上桃峰》有关联的人，都被进行了“政治思想情况调查”。

文化组仍不肯罢休，又接连两天召开了有样板团、中央直属文艺单位和会演代表团共2600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会上，于会泳定案说，《三上桃峰》不是一般的文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是与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相呼应的。”

山西省委鉴此情况，决定撤回《三上桃峰》剧组，接受“批判”，却被文化组一伙人责为“妄图把人调走，捂住盖子”。

为在整个社会扩大事态和影响，1974年2月28日，“初澜”首发了围剿的发难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这篇文章由姚文元亲笔改动11次。他以惯用的“文痞”腔调写

道：

“‘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

江青和张春桥也都在文章上圈画定稿。

《评晋剧〈三上桃峰〉》成为又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号令，被全国32种报刊转载。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500余篇批判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28个省、自治区及大中城市

召开了大规模的批判会，大抓“四上”和“五上”。

王光美曾“蹲点”的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也以“万人大会”的形式，结合着《三上桃峰》，把无辜的刘少奇、王光美又大加批判一番。

通过《三上桃峰》的典型，全国文艺界再次掀起了一场揭批“毒草”戏的运动。

一时间，全国范围冤案迭出，谈

“马”色变，牛也遭殃。

湖南省花鼓戏《还牛》，也被打成“为刘少奇翻案的毒草”。

《还牛》一戏，是根据1966年1月2日《人民日报》上的通讯《两头风格牛》写成的。当时，报纸对这篇通讯所加的“编者按”说，“一匹马的精神在各地发展起来了，《两头风格牛》的事迹是在学习‘一匹马’精神之后产生的。”

所以，“牛”就与“马”被扯到了一起，遭到批判。

在淫威所及之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人们连“桃”字都怕。湖北省武昌县委和咸宁地委因为该地一儿童剧《桃山新苗》带一“桃”字，而郑重地重新审查了它的命名。

1972年11月，山西省文化局一个名叫赵云龙的年轻人，因对江青的所谓“三突出”创作理论持不同意见，拟写了一篇题为《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

些理解》的探讨性文章。

赵云龙认为，“把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说成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把文艺描写的内容和文艺的社会作用混为一谈，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这种提法乍看起来是特别强调了塑造英雄形象的重要性，但是它却很容易导致在创作过程中忽视英雄形象所概括的社会内容的深度、广度、准确度，它的思想政治内容以及它在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的实际作用……。”

直言不讳的赵云龙点出了整个社会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沉默了多年，但却只敢怒不敢言的问题。

——他说：“目前文艺作品中所有存在的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就是：吃了为写英雄而写英雄这一‘根本任务’的亏。”

文章并没有发表，确实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发表，因为它是“反动的”。但是，赵云龙却遭到围攻与迫害。

借《三上桃峰》事件，文化组在全国范围内就赵云龙的问题，公开点名：

“反对根本任务论，反对三突出创作原则，就是反对江青，赵云龙是反革命。”

赵云龙的文章被强行算作“大毒草”《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文化组指令山西省文化局，“彻底清算这一罪行”。

《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再次出现了“初澜”的批判文章。

面对这一系列强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赵云龙被逼无奈，于1974年5月2日含恨自缢。他留下了用血写成的控诉：

“莫将自己想象的东西强加于人！”

莫将自己心中的脏水硬往别人身上倒！

诬人太甚！辱人太甚！”



(三)《园丁之歌》是华国锋的戏

1973年3月的一天,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休息室里,当着文化组组长吴德的面,对文化组负责电影工作的狄福才说:

“去年湖南省文艺会演有一批优秀节目,其中有三个湖南地方戏《园丁之歌》、《两张图纸》、《送货路上》很受欢迎。毛主席很喜欢湖南花鼓戏,有几年没看了,能不能拍个电影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看?”

吴德很高兴,对狄福才说:“老狄,你安排一下,拍吧。”

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组成的摄制组立即前往湖南,拍摄电影《园丁之歌》等三出小戏。湖南省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配合。仅用了3个月,《园丁之歌》摄制完成。

7月底,外面的天气闷热。江青闲得没事,约来张春桥,姚文元,躲到现代化设施齐全的钓鱼台17楼,江青自己的一间小放映室审看影片。

这些影片,都经过文化组审查后,没有问题了,才送给江青过目。湘剧《园丁之歌》正巧在这一天被文化组送来,请“中央首长”最后把关。文化组几个与之有关的负责人也被江青叫来一起陪看。

“剧名就不合适!”片子刚映出,江青就大叫起来,“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能是教员?”

从影片开演到结束,江青一直没停过骂口。看片一结束,她就下令开会。

“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

江青重复着影片里女教师教育学生的台词,“没有文化就不能干革命?——放屁!!这简直是反攻倒算!”

她的眼睛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去,“谁叫你们拍这个片子?!开展批判!”

狄福才站起来承担:“是我,江青同志。”

江青见是一个小卒,一时不知是该发通大火还是该克制一些。

也许她脑子里闪过一丝“首长”该有的尊严与风度?她多少压低了声调,问:

“谁叫你拍这些片子?”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下下级”的狄福才既不能讲出华国锋,也不能“出卖”吴德,他委曲求全地承担了全部责任。

江青接下去质问这个来自于军队的汉子:

“你怎么把的关?这么多的问题看不出来?”

“我没有看出问题,我有责任。我不懂文艺。”

“好啊!你还敢顶撞我?”江青终于奈不住假斯文,爆发起来。

“什么懂不懂艺术的,我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政治!你是不懂政治,所以没看出来。”

狄福才正欲再进一步“检讨错误”,被江青一挥手打断:

“好!你不要说了,回去给我写检查。”

.....

还没等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这几位“懂艺术”的人喘口气,江青刺耳的尖叫声又在会议室里回响:

“艺术?这部片子艺术上也都是些老套子嘛!那男教员象个‘二流子’,女的简直是青衣花旦又来了,化妆也象个少奶奶,哪有点革命的气息?”

张春桥帮腔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的摆布嘛,师道尊严!”

姚文元瞪着大而呆滞的鱼泡眼,敲边鼓应和道:“火车司机的儿子玩火车不读书,我看比规规矩矩

读书的那个学生好。”

江青最后一挥手,下命令说:

“好啦!你们文化组的几个人,人人有份,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对《园丁之歌》的事儿,作出深刻的检查。”

四天以后,在江青痛责之下还没搞清方位和事实所在的文化组,就开始召集下属,对《园丁之歌》进行围剿,攻击了。

“《园丁之歌》牵涉到教育革命问题,谁是园丁?——是教员,还是中国共产党?影片里那两个教员是什么成份?根本看不出来。”

他们批判性地质问作者:

“培养青少年一代靠共产党还是靠教员?你们想把青少年培养成什么样子?让他们规规矩矩听教员的话?谁说没有文化就不能挑革命的重担!?这完全是和党中央唱反调!”

狄福才又受到文化组的批评,说他不该自作主张把《园丁之歌》上报给“首长”看。其实,上报江青审看《园丁之歌》,是文化组几个领导一致同意的。倒霉的狄福才再次委曲求全地背了一个黑锅。

但是,喊归喊,叫归叫,人人心里都有一杆天平秤——共产党的教育和教师的教育怎么可能是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呢?江青命令大家学习《矛盾论》,不学还好,越学越糊涂。

再说,没有文化确是难于工作,难道共产党国家就只需要文盲?

文化组组长吴德认为,在全国开展批判《园丁之歌》不合适。于是,他托辞回避,没有介入。江青抓住于会泳,非要他组织文章发难《园丁之歌》。

最善解江青之意的于会泳,这一次动用了许多脑筋,也没想出好办法。他依然感觉没有充分的理论可以批判冥思苦想,拖了数月,竟不见有人来催,以为江青忘了,正在

暗自庆幸，江青又找上门来。

“文章怎么还没写好？”

为补救拖拉数月之过，于会泳立即组织人马，硬着头皮糊弄交差，尽写满纸连自己都感觉说不过去的话。然后，以“初澜”署名，上报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文章标题为《为哪条路线唱赞歌》。

张春桥在文稿上批示：“可以先发两篇，看看反映再发别的文章。”

姚文元批示说：

“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江青批道：

“《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映，上映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地批判《三上桃峰》，为集中火力，对《园丁之歌》的批判限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和湖南省。

江青专门点名湖南，别有用心地让湖南省先写第一篇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

1974年7月，国务院文化组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说：

“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文章：《为哪个阶级唱赞歌》。

1974年底，全国四届人大召开，文化组改组为文化部，江青为于会泳争下了文化部长的职位，而狄福才则被排挤出文化部。

1974年11月，毛泽东回湖南休养，亲自点看了湘剧影片《园丁之歌》。大家心里很紧张，一直十分注意观察毛泽东的神情举止。

毛泽东一脸兴奋的样子，既投

入了剧情，又陶醉地欣赏着家乡戏的老腔儿。看完，他带头鼓掌，他身边的服务员马上对他说：

“主席，这是个受批判的影片呀！”

毛泽东一愣：“批判？为什么？”服务员不敢吭气，毛泽东反而生气了：

“你们讲讲有什么问题，我看出好戏。”

……

只此一句话，足够湖南欢腾了。

小道消息传到文化部，立刻引起一阵慌乱。几个头头焦躁不安，没了主意。

江青也一直没有表态。从此，他们一直回避《园丁之歌》问题。

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就影片《创业》问题作了指示，批评了对文艺作品求全责备的作法。全国为之振奋。

湖南省委、省文化局也重新提出了《园丁之歌》问题。决定借此东风，碰一碰江青指使下的文化部这块“硬石头”。

8月29日，文化部接到了湖南省文化局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拟写的《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园丁之歌》是出好戏，应继续上演；同时，应放映这个戏的电影，出版、发行这个戏的剧本。

“批判过了的戏，还要翻案？”

文化部感到事关重大，问题棘手，不敢作主。于是，将此事上报给江青和张春桥。

张春桥竟佯装不知，以便推脱。他让文化组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个材料，连同报刊上的评论文章，一并送他。他“再作考虑”。

文化组只好又如此这般地一五一十报告上去，但却永远没等到回音。

江青悄悄告诉文化部：

“以后就别提《园丁之歌》的事

了。”

1975年底，邓小平再度遭贬之后，江青跳出来，大反“右倾翻案风”，又借《园丁之歌》，作了一番文章。

她对众人公开撒谎说：

“主席在湖南时，他们硬要主席看《园丁之歌》。看完后，他们特意让服务员去向主席这部戏怎么样，主席不在意地随口答了一句：‘好啊！’他们就当根据了。”

湖南省要求平反《园丁之歌》的报告，被当做“右倾翻案风”的典型。《园丁之歌》电影本身，也在1976年再遭批判。

（四）邓颖超也“插手”文艺？

1973年元旦，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电影工作者的时候，批评故事影片生产跟不上形势。他列举了一些群众迫切要求看到新故事影片来信，诚恳地说：

“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总结7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

周恩来告诉从事电影工作的各路专家，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文化组提出来，中央批准后，党和国家就帮助解决。

江青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听着周恩来对“7年”来，电影“跟不上形势”的批评，她坐不住了。不等周恩来把话讲完，她就迫不及待地用尖刺的高音打断：

“不是7年，是解放以来！20多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的经验很少，很糟糕！”

当着近百人，江青与周恩来公开唱对台戏，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骕，摄影师钱江，根据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央精神，积极筹备拍摄故事影片《海霞》时，江青就挑衅性地质问：

“你们是不是对拍样板戏不感兴趣了？”

戏台女霸王梦

样板戏秘闻实录

宾介绍，影片应当立即收回。

江青得到了密报，她当即拍案而起：

“是谁把片子往邓颖超那儿送？她又不管文艺，伸这个手干什么！”

于会泳委曲地向主子诉苦：

“北影拍了《海霞》后，我们看了没通过，提了些意见，叫他们回去修改。现在听说总理、朱德、邓颖超都看了，都说好。这样，我们也不好再提意见了。”

江青警觉地问道：

“他们看后都说什么了？”

“只听说好，别的意见不知道。”

江青转转眼珠子，叹了口气：“你们应该有个制度，没完成的影片不出厂嘛！”

1975年6月，文化部派人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查封了《海霞》的全部底片的样片，并派专人把守，以阻止影片外借。

同时，一个以“蹲点”为由的“工人调查组”进驻北京电影制片厂，接连找《海霞》摄制组工作人员和制片人员谈话，并收集整理中央各领导人调看《海霞》情况的材料。

《海霞》经“调查组”调查，被扣上两顶帽子：

第一，影片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

第二，摄制组是“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北京电影制片厂被强令展开一个批判《海霞》，坚决“打掉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的运动。

病中的导演谢铁骊，被指责为“党内外修正主义势力的代表”，进了专门为他举办的“学习班。”

正在广东休养、治病的钱江，也不得安宁，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曾利用去广州的机会，亲自对广东省委有关部门要求撵走钱江：“钱江有问题，他和谢铁骊一起反江青。”

迫于压力，《海霞》一片经过修改，于同年6月再次送审。尽管摄制

谢铁骊和钱江，是江青点名要来的，拍过几部“样板戏”影片的老搭档。但是，他们为“样板戏”，没少挨江青的骂。

现在，他们要去合作搞周恩来要求的故事片了，江青心里很不舒服。

《海霞》一片，是根据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摄制的。创作人员为了表现好影片的主题，在艺术构思和艺术风格上，作了大量严肃的探索，试图拍出一些特点来。

1975年初，影片问世。

1月25日，《海霞》送文化部审查。连“审”两天，文化部都未予通过。不通过的理由多达数十条。但根本罪名是：该片“背离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

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拿出“三突出”标准，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对照。责令北京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要从方向路线高度加以认识”，对影片重新修改。

按当时的习惯，由于新文艺作品少，出来一两部，都要留在“元旦”、“春节”或是“十一”、“五一”一类的节日放映。《海霞》本来是赶“春节”这个中国人最热闹的日子，给看腻了“样板戏”的老百姓换换口味，乐呵乐呵的。

可是，于会泳“枪毙”了它，不许春节上映。

春节期间，邓颖超调看了这部本来“未予出厂”的影片，对影片的情节和艺术手法十分赞赏，她推荐给周恩来，周恩来带病审看了《海霞》，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以后，委员长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也陆续调看了这部影片，都觉得不错。邓颖超还把它推荐给中央联络部，准备招待共产党国家的外国来宾观看。

有江青做后台老板的于会泳，从来不买别人的账，他一口回绝，说《海霞》一片有很大问题，不宜向外

组已经根据文化部第一次审查所提的修改意见改动了100多个镜头，但依旧未获通过。

未被通过的理由是，两场“必须改动”的戏，没有改动。这两场戏“诬蔑了解放军的形象”。

导演谢铁骊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两场戏，坚决不改！一切由我负责！”

于会泳气极败坏，借口谢铁骊、钱江对他修改影片的意见不满，气哼哼地说：

“不给帮助改了，一个镜头也不

改！恢复原方案上映，开展评论，写文章批判！”

在大批《海霞》，大整创作人员的1975年6月，江青、张春桥等人甚至还根本没有看过《海霞》影片。

《海霞》得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赞扬与支持，小小的文化部怎么能顶得过去？江青出来收场。

她狡诈地表明态度：

“北影的事我不清楚。建议上映，但要保留评论权。”

张春桥立即表示“同意”，还特别注明：“这是一个积极的办法”。

这让一步、进二步的办法，意味着他们要变被动为主动——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又要开始了。

6月30日，于会泳写信给张春桥，要求影片《海霞》按未经修改的第一稿上映，还特别说明“按第一稿，就是按他们送中南海审看的样子上映。”

张春桥立即在信上批注：

“照文化部意见办。”

很明显，批判《海霞》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邓颖超、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与此同时，《海霞》导演谢铁骕、摄影师钱江等人已意识到“围剿”的严重性。为从邪恶势力包围圈中，寻找一个突破口，挽救《海霞》，挽救自己，他们写信给“文革”开始后刚刚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以申张正义。

邓小平收到申诉信后当机立断，马上派人到文化部联系，并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取走了所有被封存的《海霞》电影胶片，同时，将《海霞》的有关情况及谢铁骕的信，转给毛泽东。

1975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于是，邓小平于1975年7月30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在京成员，审看了《海霞》的两个版本。中央

政治局充分肯定了这部电影，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经过修改的片子。

政治局审查《海霞》，事先没有通知文化部。于会泳是在当天才听说的，他十分紧张，立即给江青打电话报告情况。

电话里传来的是江青冷冷的声音：

“我知道，但今天我不看。”

……

审查的时候，邓小平派人把谢铁骕、钱江也叫到放映室，文化部长于会泳也在场陪看。

可是，邓小平只把谢铁骕与钱江叫到他的背后，边看边谈，而对于于会泳却十分冷淡，把他晾在一边，气得于会泳有话说说不出，在一边干瞪眼。

中央政治局通过《海霞》上映的消息传到北影厂，全厂欢呼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文化部打了败仗，谢铁骕胜利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审查通过《海霞》上映的第二天，张春桥把文化部核心小组成员叫去开会。他突然换了一副面孔，严厉地批评于会泳说：

“你们老是批判‘导演中心论’，将来导演都批没有了，找谁工作？！”

于会泳当场大哭。委曲地说：“我没地方去说理啊！”

为安抚这位十分得力的干将，张春桥给他再打起气来：

“片子上映是上映，北影的问题是北影的问题，以后再说嘛！”

这是要“秋后算账”。于会泳眨眨眼，顺了这口气。

有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后台老板撑腰，文化部于会泳等人，表面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暗中却下令：《海霞》不许向农村发行，不许向国外发行，不在节日上映，还不许使用好胶片。

于会泳继续向江青“告状”，密

报《海霞》事件的详细过程，并暗中收集拟写了一份周恩来及其他领导同志调看《海霞》的材料，其中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邓颖超等人，统统列入密报名单。

《海霞》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后，江青和姚文元才调看这部影片。

看完以后，江青一副生气的样子，站起来边向外走边对姚文元说：“谢铁骕搞出个片子，就往邓颖超那个线上送，她又不管文艺。”

第二天，刘庆棠把江青的话转告给于会泳。于会泳也眉开眼笑，他一再追问刘庆棠：

“你听清楚啦？是说‘线’这个字啦？”

刘庆棠肯定地点着头：“是提到‘线’啦！姚文元也很高兴呢。”

于会泳大大舒出一口气：“啊！提到线上啦，这就很不一样啦！”

不久，江青在另一场合，攻击中央政治局通过《海霞》公映，是“不负责任”。

“我要是在场，我就大闹政治局，决不会让他们通过。”

江青还阴阳怪气地对大家说：

“一部影片拿到政治局讨论，真是天大的笑话。”

是笑话吗？确实是笑话。这是中国在非常年代的“特产”。没有“文革”，没有江青等一伙，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笑话”。

当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为一部故事影片的生死存亡而郑重其事地坐下来开会之时，哪一个人的心境不是酸楚与沉重的呢？“笑”，也只能是苦笑，因为这成了当时对极左势力斗争的唯一合理、唯一有效的办法。

江青并没有放过《海霞》。

1975年9月，她在大赛招待所召开的关于电影问题的会议上，公开说《海霞》不是好影片，它把主要人物塑造成了个“城市大小姐”。

“《海霞》是什么玩意儿！让资产

阶级大小姐演我们的女民兵？”

“郭风莲！”江青叫着大寨的党支部副书记、女民兵连长的名字，“你说有这样的女民兵吗？”

郭风莲礼貌地笑笑，没吭声。

江青继续说：“那些演员我没有一个喜欢的。谢铁骊和钱江连资产阶级良心都没有啦！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有大后台啊！”

江青甩下话说，《海霞》这部影片，现在不批，将来也是一定要批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机会来了。

在“批邓”的声浪中，他们把《海霞》一片的账统统算在邓小平身上，追查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那封信的运转过程，追查信上的笔迹。把《海霞》当成邓小平和“革命样板戏”对立的标本。

江青在文化部的几个亲信们可高兴了：

“去年把《海霞》放一放，就是为了今天。”

又一批工作组被派驻北京电影制片厂，为的是追查“反革命”。谢铁骊被当成“重点的重点”，小会围攻，大会批判。工作组还软硬兼施地逼迫他们交出给毛泽东、邓小平所写信件的底稿，交代他们如何与邓小平“挂勾”的经过以及与邓小平的“黑关系”。

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右倾翻案风与影片〈海霞〉》一文，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是右倾翻案与《海霞》的“总后台”。

《海霞》再遭禁映，连同创作人员一起，直到江青一伙倒台，才重见天日。

(五)《创业》 反围剿

描写中国石油工人奋斗史的故事影片《创业》，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11月拍摄完成的。

该片公映前，文化部领导曾两次审查。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故事片，非常动人。所以，决定立即上映，并在国内外发行。

在没有正式向中央写报告之前，于会泳向江青江报过《创业》的情况，对她介绍说《创业》“相当不错”。

江青并没有兴趣，只是随便一问：

“有几本？”

“三个多小时，想分上、下集。”

“不要很长，不要分上、下集，叫他们缩短，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江青想都没想，就下了命令。

照江青的意思，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创业》缩短到两个小时。文化部看过以后，正式上报了中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同意该片上映，江青也划了圈。

《创业》在国内外发行上映后，立即得到了各方的广泛、热烈的反响与欢迎。

不久的一天，江青突然打电话把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叫到钓鱼台17楼她的住所。

一见面，江青就青黄着脸朝他们三人发脾气：

“《创业》片子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

几个人怎么也想不到江青会对《创业》生气，一时懵住了。

于会泳嗫嚅着说：“我们打过请示报告了，您也划圈了……”

江青蛮横地打断他：

“划圈不等于同意！这部片子是什么东西？！你们再这样不负责任下去，无产阶级的文艺就要垮台喽！”

三个人紧张起来，惶恐地听着江青训斥，谁也不敢抬头。

江青历数着《创业》的罪状：

“说这片子这好那好的，里边有那么多严重问题都看不出来？说什么党中央派专机给送毛主席著作

来，主席自己能送自己的书吗？这样笼统地说，不就是给刘少奇，薄一波他们涂脂抹粉吗？……这么大的严重政治问题，你们都看不出来？回去给我好好检查一下，为什么拍出这么个坏片子！”

不知谁不识事务地说了一句《创业》上映后工农兵还是很欢迎的。

刚刚感到舒了口气的江青又发作起来：

“什么工农兵？什么欢迎？我就不能代表工农兵？”

江青要求于会泳等立即回去讨论，并把她的意见整理出来，送她和姚文元审过再向下传达。

几经商量，文化部这几个核心人物决定，在《创业》修改之前，不再印制拷贝了。但已印出的100多个拷贝正在上映过程中，怕造成太大的影响，没敢宣布停映，也不敢向江青说。

江青的命令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文化部派专人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调查《创业》的创作背景，同时按照江青的意见，经姚文元修改，给《创业》列出十条“罪状”。

“十大罪状”的评判依据，几乎全是“样板戏”创作理论“三突出”标准，以及各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

3月底，派去东北调查的小组回到北京，带回了令文化部欣喜的调查结果——影片里的台词有很多确属余秋里的原话。这就肯定了《创业》有“歌颂活着的人”的罪状。江青最忌写真人真事，哪怕有点影子，她也要追查个没完。

文化部以对《创业》影片总结为名，通知吉林省委负责人，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和影片摄制组主要创作人员来京座谈，追查《创业》的创作背景和“送书”一段情节是如何加上去的，以及生活原型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以文化部名义,向与会者宣布了《创业》的“十大罪状”。

长影厂不敢反对,又无法根据“十大罪状”的意思修改影片,十分为难。刘庆棠代表文化部一面劝大家“放松”、“不要紧张”,要他们回去写检查和重拍方案的书面报告。

文化部要求长影厂自己提出一个重新搭班子,重新搞本子,重新拍摄的书面报告。刘庆棠说:“你们可以自己提出来重新拍摄一部新《创业》嘛,这才能够说明你们对错误认识的态度……”

这是在政治高压下,逼着制片厂做违心的事。长影的领导回长春以后,文化部曾多次催促,质问长影厂为什么迟迟不上交书面报告。领导们不得已,被迫以摄制组的名义给文化部写信,表示重拍《创业》和不向国外发行的意向。

收到这封信,于会泳、刘庆棠等人高兴极了,以此大作了一番宣传:“看,长影厂自己都认错了,是他们自己提出来重拍和不向国外发行的。”

其实,在此之前,《创业》影片的对发行,早按照江青的指示禁止了。

《创业》一片的剧作者——年轻的编剧张天民,面对着这股颠倒黑白、厚颜无耻的恶势力,忍无可忍。他决定背水一战。

1975年7月,张天民写信给毛泽东,申诉《创业》一片遭遇,信通过曲折的过程送给邓小平,再转到毛泽东手中。

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的信上作了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这就是著名的“7.25批示”。

对百花凋零、文艺枯竭,只有“样板戏”一花独放,文艺工作者敢怒不敢言的中国文坛来说,毛泽东的“7.25批示”肯定的不仅仅只是《创业》这一部影片,它是对整个文艺现状的一种批评。

在没有真理,没有是非的大动乱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真理。每一句,都是。这本身就成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了的中国亿万民众所认可、所坚信的一条“真理”。在人们眼中,毛泽东是神。神的威严、神的权力、神的意念——不可抗拒。

江青也是抗拒不了的。

两天以后,毛泽东的“7.25批示”下达到文化部。核心小组的几个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张维民等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怎么解决“7.25批示”的问题,成了文化部的一个大难题。谁能为他们撑腰,谁能为他们开脱,谁又最能置他们于死地——这是每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最先想到的敏感问题,因为这是解决问题、解救自己的关键所在。

权衡利弊之后,于会泳一句“不要牵涉到首长”,几个人心照不宣,达成了一致意见——委曲求全。

他们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检讨报告。报告中承认“十条罪状”是文化部提出的。而其根源只被轻带而过。

为江青打了掩护,于会泳心里安慰多了。他相信,有江青为他们说话,《创业》的风波很快就会过去。

有一天,江青真的又请他们去了。几个人坦然中略带几分得意——能为首长做点事,承担了这么关键的责任,该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了。也许江青会重赏?会表扬?起码能拍着他们的肩膀笑着说几句安慰话吧。

意外的是,他们发现首长今天并不高兴。

“张天民告我的假状,说我不让

《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身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的。要说有,只是其中一条里有我的一点内容。”

于会泳连忙表态:

“我们负完全责任。”

沉着心走出钓鱼台,核心组几个成员以无可奈何中略带几分责问的眼光望着于会泳。于会泳勉强给了他们一个假笑。象是自慰,象是开导地说:“首长记忆力不好吧。”

毛泽东的“7.25批示”批评了文坛不良现象的消息,不胫而走。文艺界把它当成了一件大快人心之事,以最快的速度在暗中传播。

于会泳请示了张春桥。张春桥拍板说:“只向文化部直属单位传达。”

传达大会上,文化部长于会泳竟没有露面,浩亮也没有参加。主席台上只有刘庆棠和核心小组另一名成员、副部长张维民两人。

会前,于会泳曾嘱咐说:“传达主席的批示,要注意群众的反映,防止有些人作文章。”

强大的压力与紧张,摧毁了于会泳的精神和情绪,拖垮了他的身体。他病倒了。病得不去上班,躺在家里,许久闭门不出,也拒不见人。

群众更高兴了,说他一定做了亏心的事,舆论对于会泳十分不利。整个文化部核心组,也处在一种极度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里。

有一个人着了急,感到必须要出面稳住阵脚,给于会泳撑腰打气。

“我给你们顶着!”江青终于喊出了这句话。

在1975年8月的一个月时间里,她先后三次或派人或亲自问候于会泳,使于会泳一种感恩戴德之情又由然而起。

第一次,江青对于会泳说:“你要注意休息,把别的工作都放下,先把病治好,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垮

下去。”

接着，她又派秘书给于会泳送去高蛋白营养药品，再次强调：“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垮下去……”

第三次，江青又亲自打电话给于会泳说：

“别的事都放下，你一定不能在这个时候垮下去。把病治好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她还以坚定的口气安抚于会泳：“你跟我十年来做的工作，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

8月初，江青送给于会泳一本《枯树赋》，并在封面写上：“莫要杞人忧天倾，天是塌不下来的。”

江青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根据：

“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信送给邓小平，让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并没有看过《创业》嘛。”

“对！”一向善于推敲文字的张春桥说，“主席用词向来很严格，你们要自己去理解，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

人们组织起来座谈，发泄积压了多年的郁闷。许多话，从1966年起，憋在肚子里整整9年。今天，终于有了公道，有了天理，人们比过年还高兴。人世间再没有精神上的强奸与压抑更令人痛苦的事了。

当全国上下万千民众为《创业》批示而欢欣鼓舞、彼此诉说心里话的时候，姚文元晃着光秃秃的脑袋说：

“每当党内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1957年、1958年都

是这种情况。”

他这句话含意极深，启发了江青。

江青马上接上去：

“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派前夕的情况。现在先叫他们放，将来再说！”

江青一直在寻找机会出出《创业》这口恶气。

1975年9月，江青带了一班人马共百十来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她还专门叫上了吉林省委书记和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以及《创业》作者张天民。

几乎在大寨所开的每一次会上和公共场合，江青都要提起《创业》和张天民。

她恶声恶气地对张天民说：

“娃娃！你在主席面前告了我一个刁状！”

因为张天民年轻，江青看他不起。于是摆出一副首长加家长的姿态，当着众人，随便地喊他为“娃娃”，在气势上先声夺人，抢占上风。

“你好大的胆！你告我的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你还是个娃娃，我今天就是‘三娘教子’！”

她对着张天民和吉林省委书记王维湘态度蛮横地说：“‘十条罪状’是群众的意见，有人想借此整文化部，是我给顶住了。主席说此片没大错，不是说没有错嘛！”

江青指着张天民：

“你说说，你那个电影就那么好？就没有缺点？”

在江青的逼迫下，张天民只好表态，自己谈了一些《创业》影片的不足之处。

“好！”江青立即抢过话头，“你

应该把你说的缺点，写信给毛主席，作自我批评。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假状！”

无论如何，当着这么多人，张天民也要给江青下这个台阶。他吱唔着推脱说什么都没有带来，没法写。

江青显得兴奋起来：

“这不要紧，我们这里有笔、有纸……但是，”江青把脸一沉，“不许你谎报军情。”

当着吉林省委书记王维湘和许多人的面，江青启发而又带有煽动性地责问张天民：

“娃娃，我看你是没有这个胆子给毛主席写信的，是不是你听到了什么？是谁指使你给毛主席写的信？”

张天民不语。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还年轻，今天我是拉你，你不要陷到他们一起去，你是沾了边儿的。现在你不懂，再过一个月，你就会明白啦。”

江青要吉林省委及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一起给张天民做工作，让他给毛主席再写封信，承认影片有缺点，并说明上次写的信不符合实际。

最后，江青还诡秘地要求这封信写好后，不要直接送给毛主席，“那样主席是不会批的，要通过政治局！”

江青还希望张天民自己提出要求重拍《创业》，以根本否定原来的《创业》影片。

张天民虽然年轻，但为了心灵之中那块神圣的艺术绿洲和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尊严，他拒绝了江青的威逼利诱。不畏强权，没有再给毛泽东写信。

汪伪政权

石头城里，弹冠相庆，到头来，不过是南柯一梦，一个个落得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十大汉奸的下场

●雪舟子



●汪精卫夫妇下跪塑像



如丧家之犬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疗无效毙命，结束了他的汉奸卖国生涯。汪精卫死后，在石头城里，举行了“迎棺”、“公祭”、“守灵”和大出丧等活动。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和汪精卫的死，给汪伪政权一班活人留下的是更多的恐惧和悲哀。就在汪精卫死后的第三天，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哀叹：“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日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他又写道：“致念大局，危险万状，撼天撼地之大风浪即将来临，吾辈断无法渡此惊涛骇浪，必为大浪沉于海底。”

1944年12月20日，就在汪精卫灵柩将在南京梅花山下葬的前一天，陈公博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在这个就职典礼上，伪政权从上到下的汉奸们，对这个政权究竟能维持多久，心中茫然，失去信心，感到“前途难以想象”，“都怀着一种深沉的恐怖感”。那天，陈公博走到汪精卫的棺材前，两眼红肿，“用哭哑了的嗓子”，向众人宣读了“就职词”，然后抬头向众人，正要往下说，但语音模糊，两行热泪簌簌往下滚。参加典礼仪式的一批人，本来就恍惚不安，被他这一“动情”，个个面如土色。虽然众人都穿着吉服，胸前戴着红花，站得整整齐齐，但在这



汪偽政權十大漢奸的下場

口木棺前面，气氛颇为阴惨。陈公博表面上哭死人，实际上是为自己的黯淡前途唱悲歌。就职典礼不久，他对亲信说：“现在汪先生死了，这局面是难以维持的。我已下定决心结束这个烂摊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大小汉奸如丧家之犬。

相继落网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汉奸政权的垮台，人民高兴，汉奸胆寒，然而，重庆国民党政府当时首先考虑的，却是怎样利用汉奸为它看住东南沦陷区这块地盘，以便为它“胜利返都南京”铺平道路。

1945年8月19日，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罗君强副之。与此同时，还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丁默 为浙江军事专员，等等，一时期，周佛海派系的汉奸，弹冠相庆。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作出了惩治汉奸的决定。

1945年9月底，军统在南京捕获了梅思平、李圣五、周学昌等人。华北地区的捕奸，很富有戏剧性。11月下旬，戴笠亲自到北平布置逮捕汉奸。12月5日，平津两地同时进

行。这天下午，北平诸汉奸突然接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署名的请赴晚宴的请柬。晚上8点，群奸毕至。正当“宾客”开怀畅饮时，戴笠当场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于是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汪时懋、殷汝耕、齐燮元等90余人相继落网。

广东是汪精卫多年经营的地方，汪精卫死后，由陈璧君亲自坐镇。戴笠知道陈璧君素性傲悍，如操之过急，可能发生动乱，于是他先伪造一封蒋介石的电报，由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送给伪广东省长褚民谊。电报说：“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议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印。”怕褚民谊生疑，还出示密电本，请他查阅。褚民谊信以为真，竭力劝说陈璧君去重庆。几天后，褚民谊、陈璧君随来人乘汽车前往机场。车行至珠江桥畔，才知上当，乃遭军统逮捕。陈璧君、褚民谊被捕后，广州地区的汉奸，一一俯首就擒。

1945年10月初的一天清晨，

阴雨绵绵，有架飞机从日本福冈起飞后，呼啸着向西而去。机舱里坐了一群忐忑不安的人，他们是汪伪政权的几个高级官员，此时正被押解回国，他们是8月25日逃亡日本的。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汪伪国民政府的“代理主席”陈公博。

从1945年9月至该年年底，军统共捕获有汉奸罪嫌者4692人，其中移送各地高等法院审理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理者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

陈公博的末日

陈公博被押解回国后，先是被关在南京夫子庙宪兵学校，以后又转到宁海路25号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但是，身陷囹圄的陈公博却整天伏案疾写不止。他要为汪精卫辩护，更要为自己辩护。

当时被羁押的汉奸，除陈公博一人独处一个房间外，伪部长级的二三个人住一间，次长与司长级的七八个人住一间房。

1946年初春，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同日由南京押解到苏州，被关进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渐渐地，陈公博从种种迹象中判断出这座天堂之城，或许会成为他的地狱。

原先,陈公博在绝望中把生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监狱中的陈公博并没有完全猜透当时蒋介石的心思,于是在狱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可是,到了苏州后,陈公博发现,在南京,监房的门是开着的,各人可以自由交谈,走动,而这里却是戒备森严,于是他中断了给蒋介石写信。凭着多年沉浮宦海的经验,他知道他已走到尽头了,明白了自己的结局,陈公博似乎倒镇静起来了。狱中每日放风三十分钟,每当这个时候,陈公博总是慢吞吞地在院子里踱着方步,碰上眼熟的还打个招呼。有时还旁若无人地吟诗作对。与垂头丧气的那些人相比,他还算神态自如。

但是,陈公博染有鸦片烟瘾,每当烟瘾发作,他便坐立不安,容颜黑瘦,精神萎靡,看守所只得请医师给药施戒。陈公博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的突变,已使我内心感到万分的痛楚,而连日的阴雨缠绵,更象是心头上压了一块大石,烦闷到几乎透不过气来。”

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定期审讯陈公博。检察官认定陈公博犯有十大罪状:(一)缔结密约,辱国丧权;(二)搜索物资,供给敌人;(三)发行伪币,扰乱金融;(四)认贼作父,宣言参战;(五)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六)公卖鸦片,毒化人民;(七)改编教材,实施奴化;(八)托词清乡,残害志士;(九)官吏贪污,政以贿成;(十)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在法庭上,陈公博一再为汪伪政权和他本人辩护,最后,他说:“虽然我非贤者,但承认许多事情应该由我负责,不仅华中,而华北种种恶劣罪行,也可由我负责。在南京被押时期,戴笠曾问我何不致函蒋委员长,然我并不肯哀求他人,以有罪终是有罪,无罪终是无罪也。……至于个人生死,非所计及,望当局早日判决。”

4月12日下午,审判长孙鸿霖起立宣读判决:“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6月3日上午8时半,陈公博正在狱中为典狱长写对联时,突然发现有几个法警站在旁边,他顿时明白:“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几位法警不置可否,写完对联后,他回囚房收拾一下东西,身上更换了干净的衣服。忽然又显得有些踌躇,挑些什么东西呢?终于取了一把小茶壶,双手捧着,面容严肃地向陈璧君的囚房走去。他对陈璧君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纪念吧!”当陈公博伸手向她握别时,陈璧君纵声痛哭!

陈公博的刑场就设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内,刑场周围布满手持驳壳枪的法警。陈公博行抵刑场前,对执行的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刚走到刑场一半,法警不让陈公博知道,就在背后开了一枪,陈公博立时俯倒在地,经过几分钟抽搐,气绝身亡。

这位1921年参加过中共一大代表大会的代表,光绪三十三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部长等职的陈公博,就这样结束了他不光彩的生命。终年五十五岁。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位当年参加中共成立大会的代表,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反共。

缪斌伏法

在汪伪政权中,缪斌并不显赫,他不过是南京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可是,他却是第一个伏法的汉奸。

汪精卫病死后,缪斌认为这是实现“全国和平统一”的好机会,主张取消汪伪政府,与重庆谈和,实行“宁渝合流”。1945年3月,缪斌自称接受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带着秘密条件到东京活动,与日本首相小矶国昭等进行谈判。他所带的秘密条件是:取消伪满洲国,收复华北华中的失地;允许日本在中国享有经济上的特殊利益;立即取消汪伪组织,另组“留守府”,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等。当时小矶国昭等主张双方让步以求和谈成功,但由于日本海陆两相坚决反对,谈判没有成功。

抗战胜利后,缪斌因为有那么一段特殊的经历,虽然也被捕,可是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待遇,缪斌也自信国民党政府一定会采取“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不料一天深夜,他突然被押往苏州。原来,美军在日本政府档案中查出缪斌携去的和平条件,而依照开罗会议的决定,任何一个盟国,都不得对日单独讲和,因此美军在获悉这些材料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质问。蒋介石为掩饰这一事件,只得将原准备宽大的缪斌送上死路了。

缪斌被解到苏州后,他的妻子在上海聘请章士钊等三位律师为他辩护,还收集了戴笠给缪斌嘉奖记功的文件等“有利”证据。缪斌在《我的对日工作》“自白书”中则说:他10年来不屈不挠,在各种困难境地下,仍坚持“策反”工作,而这种工作是抗战前与何应钦商定的,1943年8月他又加入了军统局……

可是,检察官这时早已接到军统局发来的电文:“查缪逆斌,背叛

祖国，劣迹昭然，虽为本局运用，略有贡献，而发动于日本已节节败退之时，不免投机取巧，仍请依《惩治汉奸条件》予以检举法办。”第一庭庭长石美瑜也接到蒋中正“手谕”：“按律办理。”

然而缪斌没有预料到，1946年4月8日，庭长当众宣读判决书：“缪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

5月21日，缪斌被押到审判室，检察官李曙东出示最高法院复判原文，对缪斌说：“今天要宣布执行枪决，你有无遗书要写？”缪斌闻言，面现恐惧之色，半晌沉默无语，旋即颤声答称：“那么，请拿一纸笔来。”他写了四句诗作为遗书：“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遗书写毕，即退庭。缪斌被绑，由四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押到监狱内的刑场，验明正身后，法警将子弹自后脑打入，一枪毙命。缪斌成了被捕汉奸中第一个伏法的人。

轮到汉奸褚民谊

关押在苏州的汉奸，在陈公博被执行死刑后，接着就轮到了褚民谊。

褚民谊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等职，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褚民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日本投降前夕，褚民谊任伪广东省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保安司令。

1945年10月14日，褚民谊等被移押到南京宁海路25号。46年2月18日，又被解送苏州狮子口监狱。在狱中，他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我参加和运的经过》。

1946年4月15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

被告席上，褚民谊满脸灰白胡

须，穿深灰棉布长袍，扎脚棉裤，戴黑色法兰西帽。他故作镇静，听着首席检察官韩焘说明起诉理由：“被告褚民谊与已故汪逆兆铭夫妇因有亲戚关系，感情甚笃，……28年汪逆在上海召开伪全国代表大会，以被告为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及秘书长等职，两次派遣被告与伪维新政府及伪临时政府在青岛、南京等处会商合并组织伪国民政府条件。次年3月，伪国民政府成立，……被告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年11月与日本订立《中日基本条约》，并发表《中日满共同宣言》，未几奉派为驻日大使，联络各国承认伪政权，嗣得德意等九国承认……”

褚民谊在法庭上进行答辩，对汪精卫大加吹捧。当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褚民谊死刑。褚民谊听了判决主文后，脸色苍白，审判长接着宣读判决理由，然后问他有

什么话要说。褚民谊回答说：“……判处死刑，本人非常满意。”接着他在法庭上大讲满意的理由。褚民谊的这番话，急坏了他的妻子陈舜贞。当陈舜贞在法院听到初判后，急忙设法为褚民谊申请上诉。复审后，法院仍维持原判。眼看再也没有挽救的希望，不料，陈舜贞钻了美国军官柏特诺（曾任中国远征军参谋长）门路，转请蒋介石批准再次复审，蒋介石以“效忠国家，保存文献”为理由，发交江苏高等法院再审。原来，1925年孙中山在北平协和医院割治肝癌后，该院声称已将割除的肝脏火化，实则仍用酒精保存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院被日本人接收。1942年3月29日，褚民谊到北平将孙中山肝脏领回，送交南京中山陵园保管。不久，褚民谊又从日本人手中取回孙中山新著《孙文学说》原稿及《建国大纲》手迹。蒋介石将这两事作为发交法院重审的理由。蒋介石



一九四〇年四月，汪精卫政府成立典礼。汪精卫政府人员（左侧），日本方面之人员（右侧）。

的这一理由，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各报纷纷发表社论文章，反对这一做法。法院只得再次裁定维持原判。陈舜贞仍不罢休，设法取得了蒋介石的手令：“褚民谊附敌虽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军投降，即能够移心转志，准备移交，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手令由褚民谊家属收执。褚民谊的女儿持蒋介石签署的手令由上海乘火车专程赴苏州时，不料在车上被窃。既无手令，又迫于舆论压力，法院放弃了重审。

1946年8月23日，褚民谊正在狱中练太极拳，突然几个法警出现在他背后，他回过头来笑问道：“是不是提我执行？”遂向其他犯人说：“对不起，只能练到这里了。”

褚民谊还未被押到刑场草地中央时，法警乘他不备，突然在他脑后开了一枪，子弹贯穿脑壳而出。他只挣扎了两下，就仰倒不动了。

周佛海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

在汪精卫病死之后，周佛海是仅次于陈公博的第二号人物。他是控制外交、军事、特工，财政金融等实权的大汉奸。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随戴笠离沪飞往重庆。开始被软禁在嘉陵江畔的一幢小洋房里。名为关押，实则曲加保护。当时周佛海自认为他后期有功于重庆，且有戴笠保护，应无生死之忧。不料戴笠撞机身亡，周佛海被移禁到重庆的土桥监狱。他得悉戴笠死讯，哀叹：“惊悉旧友变新鬼，彻耳呼声变怨声。”他还说：“雨农死，我也完了。”

1946年秋，周佛海等被押解到南京。在狱中，周佛海备受优待。10月7日，高等法院在夫子庙大殿正式开庭，周当庭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道出抗战期间与蒋藕断丝连的关系。法官并不理会，于11月

7日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一再申请复判，并请来几个大名鼎鼎的律师为他辩护，最高法院认定维持原判。以后，有人给周佛海出点子，叫周不要再提抗战期间与重庆方面的来往之事，只着重提抗战胜利后奉命维持上海秩序，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的功劳。于是，周佛海就把有关蒋介石的事情隐瞒下来。与此同时，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致函蒋介石，竭力保救周佛海。陈布雷一生谨慎，只知道效忠蒋介石，很少应朋友的请托而向蒋介石进言，也缠不住周佛海夫人杨淑慧的一再恳求，破例为他昔日的朋友向蒋介石求情。

那天，杨淑慧由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陪同，去见蒋介石。杨淑慧一见蒋到，立刻跪在地上，眼泪簌簌地往下流，蒋介石当时面色阴沉，皱皱眉头，对杨淑慧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沉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杨淑慧听了蒋介石这几句话，爬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才随毛人凤退出蒋介石官邸。

于是，蒋介石召见行政司法部部长谢冠生，询问是否可以不判周佛海死刑。谢冠生感到很为难，称周佛海目标太大，恐处理不妥会引起舆论指责。蒋介石又欲托人问经办此案的推事私下交涉，谢答：“承办这一案件的是一位老先生，比较古板，旁人很难直言。除非由委员长召见并亲予指示，或许能够变通。”于是，蒋便要谢约那位推事同进午餐。席间，蒋介石向那位推事说：“从法律上看有何条文可以引用，免周佛海于死刑？”不料那位推事很率直地答道：“周佛海所犯罪行比陈公博大得多。倘使周佛海不处死刑，社会舆论一定哗然。”顿时，场面极为尴尬。谢冠生从旁打圆场道：“法律条文没有办法，可有其他法子可想？”那位

推事说：“只有在法院判决后，由国民政府主席运用特赦权，给予特赦或减刑。”于是，蒋介石亲自写信给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声言他曾经通过戴笠对周佛海表示过“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的意见，提出“该犯似可免于死，可否改判，即希由司法院核办可也。”经过反复磋商，几度文往来，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终于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出《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全文如下：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治安事迹，请求特赦前来。查该犯自民国30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34年6月19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办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在案，似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兹据呈复，该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检法第68条文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主席 蒋中正”

周佛闻讯，高兴得如痴如狂，当即在狱中吟诗曰：“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庆幸捡了一条命。

1948年，周佛海各种疾病的并发症发作，病得躺也不是，坐也不行，把被褥叠高，日夜俯伏在上面喘息，呻吟，最后周身痛楚，不停地惨叫呼号。

是年二月，周佛海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中。后葬在南京郊外的永安公墓。当年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一大时的总书记，后来成为汪伪的大汉奸周佛海，就这样结束了他可耻的生命。终年五十一岁。

梁鸿志

梁鸿志原是伪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汪伪政权成立，梁是汪伪政府的监察院长兼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死后，任伪立法院院长等职。

陈公博被处死的消息传到上海，关在提篮桥监狱内的梁鸿志惶惶不安，自知罪孽深重，结局决不会比陈公博好。不久，同梁鸿志关在一起的陈日平首先被判刑。陈是《新闻报》社副社长，在汪伪政权中地位不高，除搞宣传外，未参与重大政治活动，但被判无期徒刑。这一判决大出梁鸿志所料，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神情更为沮丧。

1946年6月5日，法庭开始对梁鸿志开庭审理。梁临死挣扎，答辩中主要是力图证明自己出任伪职曾获得国民党中央的默契，并提出人证和书证。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曾派薛大可持他的亲笔信为梁鸿志作证，说他在抗战期间曾通过地下人员向重庆提供过情报，章士钊大律师也为他出场辩护……所以他仍然抱有希望。

6月25日，法庭判决，梁鸿志神情紧张地站在被告席上，当他听到被判死刑后，脸色发白。7月初，梁鸿志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提出五大理由，表示不服一审判决。10月，国民党最高法院一一驳回了梁的上诉。最高法院最后认为：被告犯罪事实既已证据凿凿，而其辩解理由又一无可采，且其犯罪情节重大，亦绝无可以宥恕之余地。

11月9日一早，提篮桥监狱内气氛森然。一群法警直趋梁鸿志囚

室。梁知道这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了，整理了一下杂物，穿一件蓝色长大褂，布底的缎鞋，随法警下楼。他在给家属的遗书中说：“余生平读诗书，尚知大义，不料从‘政’，因而至今日就刑，此仍佛语所谓前生罪孽。死后速来收尸，并盼丧事不要铺张，附玉鱼一只，以为殉葬之用，物虽小而表不忘师之意也。”给蒋介石的信连续写了一个多小时。

法庭外就是刑场，那是一片大草地。梁看见草地当中放着一把椅子，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席位，便径自坐了上去。突然回过头来，欲向持枪行刑的法警说话，离梁背后不到2尺距离的法警开枪了。“咔嚓”一声，子弹被卡住了。梁鸿志听到枪机声，惊跳了一下。法警立刻又扳了一下枪机，子弹始从其脑后直贯而进，再从口腔穿出，把两枚门牙都击落了。法警在后再用脚把椅一踢，梁即随椅俯倒在地，鲜血从枪洞中流出。

梅思平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抗战前，他的地位不高，同汪精卫也无渊源。可是，1939年8月，汪伪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梅思平已任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地位仅次于周佛海。他被公认为是“有学问，有才能的干部”。

1946年5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指控梅思平犯有以下罪行：（一）1938年6月，奉特密令，与高崇武赴港，秘密与日本影佐祯昭议和后，并往返港渝，后赴沪，参加“和运”。（二）1939年6月，与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首相平沼等接洽组织伪政权，此后先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在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举行会谈，将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合并，改组为汪伪国民政府。（三）历任伪部长，省长等职。（四）兼任伪粮委会委

员长时，曾以粮食资敌。（五）在伪内政部长任内，接办宏济善堂，贩卖鸦片，毒化人民。（六）滥发伪币，扰乱金融等。

5月9日，即宣告判处死刑。宣判后，梅思平上诉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但被驳回。

梅思平在狱中的最后几天也挺有意思。

1946年9月初，狱吏唤梅思平，他神情紧张，以为是提他去执行了，于是与同室的李圣五、余晋和王谟诸人一一握手诀别，并将事前准备好的遗书一束，授李圣五，要求在他死后转给其家属，当时，李圣五对他说：“你是懂法律的人，今天绝不可能会是执行的，因为依照法律的程序，初审虽经判决，但既已依法申请复判，在终审的判决书未送达之前，程序并未终结，即无遽尔执行之理。即使终审的判决书已经送达，依法还可以提起非常上诉。况且案子一经确定，即需移送牢狱，法治国家，决无人犯犹羁押在看守所时，即执行死刑之理。”果然，梅思平去后不久，又安然而返，只是检察官问话而已。

一直到9月14日，梅思平方始被处决。不过他是从看守所直接走向刑场的。他留给同狱诸汉奸的最后一句话是：“来生相见，保重保重。”

在宁海路看守所，第一个被枪决的就是梅思平。

林柏生

林柏生毕业于岭南大学，曾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他精通俄文，曾率一批中国学生赴苏留学。他因才干和学问，为汪精卫所看重。汪伪政权成立后，林柏生任伪中央宣传部长达五年之久，抗战胜利前一年，调任伪安徽省长。江苏高等法院于1946年5月31日作出死刑的判决。据说，法院方面所以作出这样的

汪伪政权十大汉奸的下场

判决,是根据国民党政府关于“伪省长”判死刑的原则。

1946年10月8日执行枪决那天,检察官问他有何遗言。他要求写几个字,经准许后,他在所持的英文书的扉页上写道:“余妻徐莹及诸儿留念;春来春去定有时,花落花开无尽期,人生代谢亦如此,杀身成仁何所辞!”然后说:“我事先并没有接到确定的判决书,遽付执行,似乎法律手续太有些欠缺。现在我对家里没有话说,自己也并无财产,执行时希望不要用专制时代的捆绑,死后并希望能及时通知家属。”说完,取下所戴的眼镜交给检察官,然后走向刑场。执行的法警趁他没有注意时,从身后开了一枪,林柏生应声倒地。

丁默邨

抗战开始后,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处长的丁默邨,奉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后来丁默邨被李士群拉到汪精卫一边。汪伪政权初建时,本来内定由丁默邨任警政部部长,李士群为次长,但李士群不甘屈居于默邨之下,逼得周佛海自兼警政部长,让丁默邨任社会部部长。抗战胜利前夕,丁默邨与戴笠已暗通声气,周佛海又让他出任伪浙江省长,布置为策应国民党“大反攻”的一个前哨站。抗战胜利后,戴笠在上海几度与丁默邨接洽,丁默邨在戴的抚慰下,以为能保全性命。

但是江苏高等法院经审讯后确认,丁默邨罪行累累,曾杀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庭长郁华等人,在

伪社会部长任内,发表文章主张与敌并肩作战,消灭英美军;在伪浙江省长任内,印制大量媚敌宣传品,并组织物资运销管理处,剥削国民,供给敌伪。陈果夫、陈立夫也坚持认为:“丁默邨反复无常,不杀不足以绝后患。”

丁默邨被判死刑后,一直精神沮丧,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拖出去执行。1947年7月5日上午,法警来提他时,这个以杀人为职业的老特务吓得浑身发抖,站立不住,由两个法警左右夹持着拖出狱门。行至二门时,他已经神志不清,知觉尽失。法警见到这种状况,没等拉他到法场,便对他脑门打了一枪。立时毙命。

王揖唐

王揖唐早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国会议员、资政院资政、内务总长等职。芦沟桥事变后公开投敌,任华北临时政府赈济部总长、内政部部长等职。汪伪政府成立,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1940年6月,调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1941年2月,宣布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屠杀爱国人民,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搜括钱财物资,供给敌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表示要“完成华北的决战体制”,使华北成为日军后方的兵站基地。1943年2月改任汪伪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

降后被捕,并被判死刑,于南京执行。

陈璧君

在汪伪汉奸中,最有性格、最有特色,最有戏的要数陈璧君。

1945年10月底,陈璧君在广州被幽禁了半个月后,一个姓徐的军统代表告诉她,不日将送往南京解决。陈璧君当即说:“我有要死的勇气,但决无坐监的耐心。”陈璧君说这句话时,她没有想到她在监狱中要坐一辈子。

11月初,军统人员先把各人身边的贵重物品全部收交。再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把陈璧君等押往南京。这一群人被押上等候在这里的囚车,开往宁海路25号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看守所。入所第一天,陈璧君就有“精彩”的表演。

那一天,送至这里的汉奸有数十人之多。按规定,应唱名验收。当看守唱“陈璧君”时,无人答应。

“陈璧君!”看守瞪着眼又重复了一遍。

“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陈璧君瞋目怒斥:“你不过是个雇用的最下等之人,被人看不起的小牢子,配这样称呼老娘?当年国父孙先生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敢直呼老娘之名,胆大妄为透顶!”她边说,边逼向看守。

看守张皇不知所措。

“请夫人息怒。”看守所长徐文祺把那看守推到一边,向陈璧君满脸堆笑说:“他刚来,不认识汪夫人,夫人您多包涵。”

“原来是徐科长，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徐文祺十分尴尬：“蒋委员长格外开恩，让我戴罪立功，来看守所服务，充当所长。”他接着又客气地说：

“汪夫人，你一个人住3号房间，请上楼。”徐文祺边说伸出右手。他当年是汪伪政府行政院庶务科长，他觉得愧对往日的主子，低着头不敢仰视。

“啊呀，我既有心脏病，又患高血压，日夜要人陪伴看护，徐科长高抬贵手，能不能让我挑几个人，与我同住一处，好有个照应。”

经过请示同意，陈璧君选定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女、褚民谊、陈君慧，一同住在二楼。开始，待遇很优厚，一日三餐，都由外面的酒家负责供应，下午，还有茶点供应。他们住的房间也不上锁，行动很自由。

1946年2月的一个午夜，根据国民党政府关于被拘汉奸一律移送各地高等法院审判的决定，陈璧君等人从南京被移解到苏州看守所。

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起诉陈璧君：“……被告陈璧君，系已故汪逆兆铭之妻，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日战争发生后，随同汪逆前往重庆。民国27年秋间，汪逆勾结日首近卫文磨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12月，被告与汪逆潜离重庆……至29年一月间，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公然反抗中央，其中汪逆任主席，被告任伪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观于其用“明”（指汪逆兆铭）“崖”（指被告）密电字样，为与各方面通信暗号，是其与汪逆并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煊赫，至为明显。即至汪逆已死，陈逆公博继任伪主席时，被告以一未亡人之身，尤复往来

京、沪、粤、汉等地，谬倡全面和平之说，以欺骗民众，献媚敌人。更密布特工机工机构，惨害地下工作同志，使我数千年文化之古国，沦于倭夷而不知耻，卖国求荣，至死不悟，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无可宥恕。……”

4月16日，公开审讯陈璧君。那天庭内座无虚席。因为她平素傲岸，大家都想看看她在法庭上的狼狽相。出庭时，大家只见陈璧君身穿一件黑色旗袍，架着一副细边的眼镜，态度仍很骄蹇。在法庭上，陈璧君时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所作所为，时而讥嘲法官，甚至大闹法庭，有点类似几十年后江青在法庭上的表演。陈璧君骂起蒋介石来，说也奇怪，当她骂完这些话后，旁听席上竟发出一片笑声，响起一阵掌声。她不仅不承认自己的卖国行径，而且居然厚颜无耻地为汪精卫汉奸行径辩护：“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一寸之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日本攻粤，广州高级长官闻风先逃，几曾尽过守土之责，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试问我们收回后怎样能交还重庆，重庆又怎样能来接受？”

当法官打断她信口胡说时，她又接着说：“美其名曰要我答辩，还说是被告的权利，我才讲了几句，却又不许讲了，身为高等法院官吏，连基本的法律知识都不懂，还不是貽笑大方？君昏臣庸，战场上，蒋介石用的都是常败将军，后方，又都是些尸位素餐的瘟官，你们几位也在此列！”

旁听席上秩序越来越乱，只好草草休庭。

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告

判决书。判决书说：“……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别看陈璧君凶悍嘴硬，人们可以发现，当宣读判决书之初，她脸呈恐惧之色，下垂的双手微微颤抖。当待读及“处无期徒刑”一句时，才长舒了一口气。

陈璧君在法庭上表示：“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提上诉。所谓开庭审判，允许上诉，形同演戏，只能欺骗3岁小孩。判我无期徒刑，是当局早作决定了的。高等法院也好，最高法院也好，必须遵守。上诉的结果，必须还是与初审一样，绝无更改的可能。对于这一点，你们清楚，我比你们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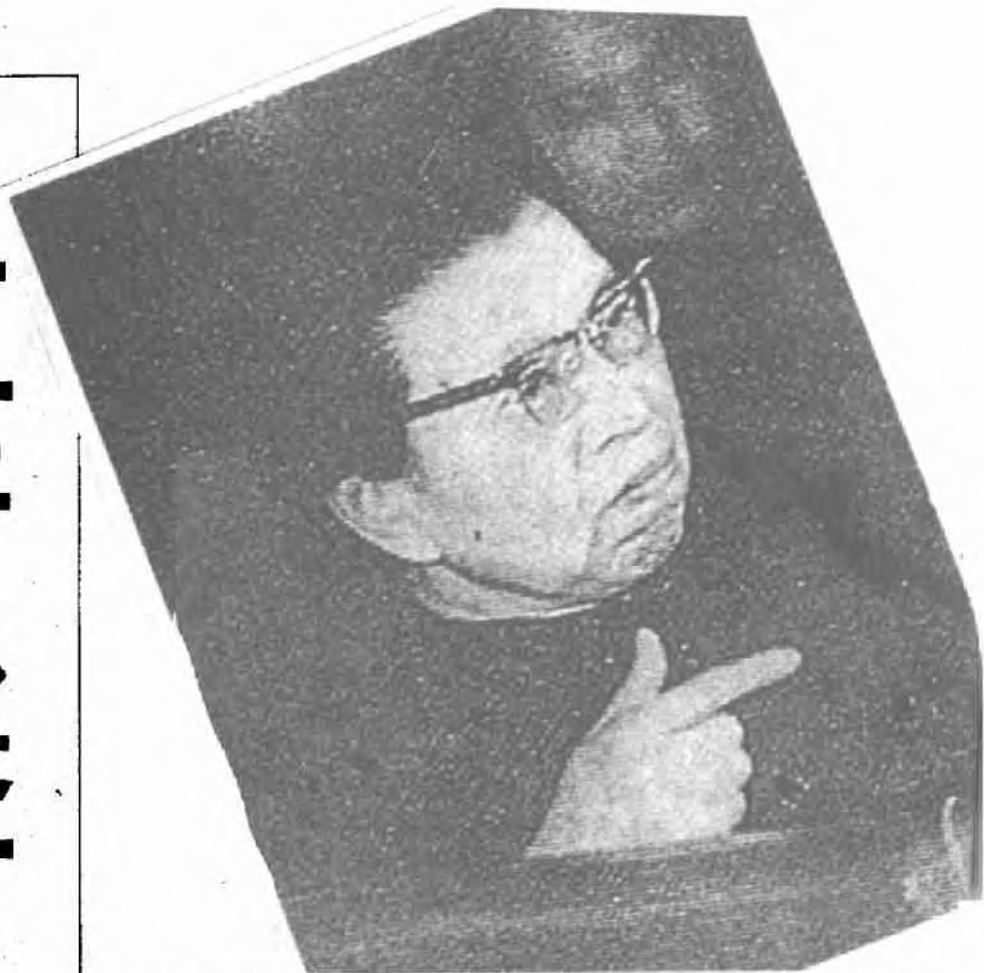
清楚也好，不清楚也好，陈璧君还得回监狱去。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陈璧君被从狮子口监狱移禁公安局看守所。上海解放后，陈璧君又从苏州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

陈璧君入提篮桥监狱后，身体很虚弱，心脏病、高血压严重，头痛、头晕、腰痛、失眠等症加剧，监狱及时对她进行医治，病重时送入监狱医院治疗。1959年3月，陈璧君病情十分严重，再次送入医院，但因病魔缠身多年，心力衰竭，1959年6月17日，抢救无效，不治身死。时年77岁。由于陈璧君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房亲戚收殮火化，骨灰送抵广州。1960年，由其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汪伪政权从开场到收场，历时五年四个月。当日本侵略者在华横行霸道，烧杀抢掠，不可一世时，汪伪政权大大小小的汉奸们，错误地估计形势，纷纷出笼，助纣为虐，最后落得个可耻又可悲的下场。历史证明，一切卖国、行不义，无恶不作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江青挨打」真相

○沈 默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 1968 年出了个“杨余傅事件”，当时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林彪、江青横加诬陷，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

有关“杨余傅事件”的真相已多有披露，大白于世了，但是，当年传达文件时，曾讲到傅崇碧领了一班人马，“全副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所在地），还有“一个坏人”竟然打了“伟大旗手”江青同志。是谁竟敢在当时“打”如日中天的江青？“全副武装冲击钓鱼台”又是怎么回事？最近，笔者听到当年几位当事人讲述了这一事件的详情，方解开这一谜底。

事起鲁迅手稿

1968 年春，周恩来总理接到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的一封告急信，说鲁迅先生的一部份手稿遗失了！许广平称，这部分手稿是鲁迅先生的“两地书”手迹，极为珍贵，属于永久性保护文物，原收藏在中国文联。

周总理对此当然十分重视，一面批转江青等人阅，一面交待杨成武、傅崇碧迅速查办此事。被捧为“文革旗手”的江青，对三十年代反封建文化的真正旗手鲁迅手稿遗失亦是非常敏感，以为又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除了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外，也急急火火的对一些造反派组织乱讲了一通对鲁迅崇敬、对许广平表示慰问的话。

杨成武、傅崇碧接到总理命令，自然不敢怠慢。但当时处于那种混乱局面，上哪儿去找？还好，许广平女士信中提及手稿曾在中国文联。大海捞针，那就从文联

找起！

通过文联支左部队，很快查到线索。原来，当时文联发生武斗，曾有人找到中央文革和支左部队，那位保管鲁迅手稿的同志觉得自身尚且难保，这鲁迅手稿让人抢去该如何交待？于是，他把装有鲁迅手稿的箱子交给了处理武斗的戚本禹。据云，当时戚本禹曾顺手交给了同去的一位解放军干部。

一周“破案”

线索到此，又不好办了。为什么？因为知道情况的戚本禹此时已被当作“小爬虫”关进秦城监狱里去了。

傅崇碧即将此事报告杨成武。此时秦城监狱由北京卫戍区军管，杨成武认为事不宜迟，决定亲自提审戚本禹。

几辆小汽车连夜驶往秦城监狱。

戚本禹几个月前还十分风光，到处讲话发指示，如今被中央文革小组抛出当“替罪羊”，与王力、关锋一道道枷锁扛。见到杨成武亲临秦城，戚本禹知道兹事体大，搜肠刮肚回忆当时情景。

“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我随手就交给同去的一位解放军同志了。”

“想想此人叫什么，哪怕有什么特征。”杨成武说。

戚本禹到底还算个“才子”，不仅记得那位解放军干部的名字叫韩书信而且知道他是成都部队的一名营教导员。

杨成武一听松了口气，只要有名有姓，又在部队就好办。他看戚本禹还要再谈其他，马上打住，告之其他免谈，今天只谈此事。

虽然当时全国大乱，党政瘫痪，但军队还是有纪律、讲雷厉风行的。杨成武、傅崇碧速派人乘飞机飞往成都，将那位支左军人找到，查明情况。

派去查人者不仅查到了这位教导员，还将他一同带回了北京。他说出的情况不仅使人大吃一惊，而且哭笑不得。

“其实你们一个电话就弄清楚了。鲁迅这部分手稿就在北京，在中央文革！”

原来，这位营教导员收到鲁迅手稿后，马上就按规定上交中央文革小组了。

“给的什么人？叫什么？”

“我只记得大家都叫他小何，是江青的秘书。”

真是穿着鞋找鞋，江青批示找的鲁迅手稿，就在她眼皮子底下！原来，当时韩将手稿交给了中央文革工作人员何先伦，何把他交给保密员卜信荣了。电话与卜信荣联系后，证实手稿现存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里。

杨成武、傅崇碧计算了一下，从接到周总理的命令

和江青等人的批示到现在，整整一周就“破案”了！按理说，此事到此应该是很圆满、很迅速地完成了，但是后面却出现了——

戏剧性场面

傅崇碧决定亲自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并当面验证鲁迅的手稿。

1968年3月8日，电话和中央文革办公室人员联系好后，傅崇碧和秘书一车、一位副司令和一位副政委另一车，直奔钓鱼台。

傅崇碧的车是到处都可以通行的，所以在钓鱼台门口直驶而入；后面的那辆车却被拦住，说是没有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不能进！于是又费周折再和里面联系。

傅崇碧的车到了17号楼前停住，看见姚文元正在那里踱四方步，傅便下车告之要向江青汇报鲁迅手稿之事。

“江青同志在后边，您去吧！”姚文元笑笑说。

傅崇碧和秘书冯正午直接走进17号楼会客室。

这里要说说给傅崇碧拎着大皮包的秘书冯正午。这位秘书是刚刚和傅司令原来的秘书交接上任的，没经见过大场面，当然更没见过江青。此时此刻，他来到钓鱼台这神秘的地方，而且马上要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夫人——中国政治舞台最活跃的人物江青，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就在后一车人也来到会客室时，江青怒气冲冲从里面走出来：

“傅崇碧，你来干什么？你带这么多人要来抓我怎么？”

“这是那里话？”傅崇碧也觉得奇怪，“我们是来向你汇报鲁迅手稿的事。”

再说拎着傅崇碧手提包的秘书冯正午本来就紧张，一看江青大发雷霆，一口气没上来，癫痫病（羊角风）猛然发作，一跤扑跌，手中的大皮包直甩向江青。

江青吓了一大跳，看着四肢痉挛、口吐白沫的这么一条汉子倒在面前，尤其是差点打着她的那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连声惊叫：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个什么人……”

随来的一位副司令说：“这是发羊角疯，没有事，没有事……”一边就和人搀扶着把那位病倒的秘书弄出屋去。

江青惊魂甫定，也觉失态，连忙说：“赶快给他弄点水，他



是不是没吃饭，是饿昏了吧？”

一阵忙乱，江青总算听明白了傅崇碧的来意。

“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抓我呢？”江青笑说：“不过你傅司令来也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呀！”

傅崇碧心中好奇奇怪，明明是先联系过才来的，怎么说“不打招呼”呢？更不解的是江青怎么会想到来抓她呢？她这个人就是疑神疑鬼、神经质！

傅崇碧连忙说明鲁迅手稿已查到下落，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员小卜那里。

“这可能吗？不会吧！”江青没想到自己下令让人找的东西就在自己这里，感到下不来台。同去的卫成区前政委周树青把收管手稿签名的条子拿给江青看。江青一看上面果然有卜信荣的签字，立刻喊道：

“去问问管档案的小卜有没有鲁迅手稿，叫他来！”

不一会儿，卜信荣拿着装有鲁迅手稿的箱子赶到。

“我问你，鲁迅的手稿是不是在你那儿？”

打开小箱子一看，里面果然全是鲁迅手稿。“是呀，这不，我都带来了。”小卜回答。

“把他抓起来！他是个坏人，是个特务！”江青又突然神经质地大叫起来。立刻有两个警卫人员当着傅崇碧一行的面，一人架一条胳膊，反架着就把小卜往外推。小卜一边挣扎一边喊：“我不是坏人，我冤枉呀……”

“你是个大坏旦！是特务！”江青象小孩子吵嘴似的叉着腰跳着脚向着被推出去的小卜大喊大叫……

傅崇碧一行觉得眼前这一幕简直就象一出闹剧一样，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匆匆忙忙核对了鲁迅手稿没有遗失，赶快打道回府了……

几天以后，中国政坛又爆新闻：“杨余傅事件”！

林彪在人大大会堂召集军队团以上干部讲话，叶群亲自带领呼喊口号，其中就有“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又过了一段时间，传达杨余傅“罪行”，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傅崇碧带领人马全副武装冲击钓鱼台”、“傅崇碧重用打了江青的坏人冯正午！”江青在一次会议上活灵活现地说：“他（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我，要砸断我的脊梁骨。”一边说，一边把腰躬下用手摸着腰，“我的腰一直在痛。”江青无中生有而耸人听闻地讲：“他秘书的皮包里有手枪，他的车子后边，最低限度还藏有一挺机关枪……”

杨、余、傅坐牢受监禁自不用说，那位在江青面前病倒的秘书竟然也被当成“反革命”关押了好几年。现在讲起这些事的真相像天方夜谭似的，但在那种病态的社会中，发生那样的事就不奇怪了。

宋仁宗 怕谏官

●石林

宋仁宗在历史上不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治天下、御外侮，比不上他的先辈太祖、太宗。他行新政、搞改革比不上他的后人神宗。但是，无论是正史、野史，说他坏话的不多，至少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昏庸之辈，这与他怕谏官有很大的关系。

自古文武百官怕皇帝，也有皇帝怕谏官。那些一心要当活尧舜的开明皇帝就怕谏官。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得到一只特别俊异的鹞鸟，把它放在手臂上玩。他兴趣正浓时，被魏征撞见了。李世民见到这位以直谏著称的老臣，就象顽皮的学生见到老师一样，马上把鹞鸟藏在怀里。这位谏官不给皇帝下台阶，唠唠叨叨地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老一套，没完没了。一直到鹞鸟窒息在李世民的怀里才罢。

宋仁宗也是怕谏官的一个。有一天，宫里正在做道场，他跑去看热闹，看得高兴了，吩咐左右：“赐予名僧紫罗一匹。”和尚们喜出望外，连忙谢恩。他又对僧众们说：“明天从东华门出宫，把紫罗揣在怀里，不能让人看见。”那其中的原因，他也如实讲了，只是“恐台谏有文字论列”。

堂堂大宋王朝的九五之尊，不要说赏给和尚们每人一匹紫罗，即使赏赐给他们更贵重的东西，则人也无可奈何。然而宋仁宗何以这样怕谏官呢？因为他想当个被人看作尧舜式的好皇帝，不想损害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从谏如流的好名声。

为了这个好名声，他付出了许多代价。王德用进献女得以在他左右，深得荣幸。王素的进谏，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但又说：“朕虽为帝王，然人情同耳。”所以他接受王素批评，遣宫女出宫，这是很不容易的。有个专门给仁宗梳头的太监不服气，给仁宗梳头时说：“两府两制，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二，则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宋仁宗听他这样发牢骚，一声不响地把他裁减了。皇后问他：“这个梳头的太监，是你平日心爱之人，怎么把他裁减了？”仁宗回答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红火的炎帝节 欢腾的古陈仓

——'93 中国宝鸡炎帝节·炎帝 与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纪盛

本刊记者 卢弘

炎帝和黄帝是全球炎黄子孙的人文始祖。人们认为,轩辕黄帝主要以其政治和军事业绩,促成了中华民族最初的统一,被称为神化的炎帝,则着重以其远古时代的经济生产及文化科技贡献,保证了华夏儿女的生生繁衍和发展兴盛。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时期,隆重纪念并认真研究炎帝的历史与创造,对于我们正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位居我国正中,地处各省通途,古称陈仓的西北名城宝鸡市,据史籍记载和文物古迹考证,是炎帝及姜炎文化的发祥地。以炎帝为代表的姜姓部族,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并与以黄帝等为代表的各大部族汇为一体,共同组成了以后的中华民族。因此,在宝鸡市举行纪念并研究炎帝及姜炎文化的活动,自有其内在根据和实际内容。

1993年初秋时节,宝鸡全市一片节日景象和欢腾气氛,到处悬挂和张贴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不久前的题词:开发古陈仓,建设新宝鸡。各种有关炎帝节的标语、横幅、彩旗、华灯、各色巨大汽球和缤纷花丛,使人沐浴在炎帝始祖的廷辉光泽和改革开放的辉煌热潮之中。

8月22日,炎帝及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先行召开。专程来到宝鸡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亲临会议并高兴地讲话,热情支持对炎帝及姜炎文化的研究,由衷称赞古陈仓和新宝鸡的悠久历史与美好未来。研讨会由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主持,由宝鸡领导机关及市社科联主办,应邀参加的有来自北京、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及陕西、宝鸡当地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共120余名,他们中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国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省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尹盛平、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平安等,还有来自台湾的李子弋教授和台北姜氏宗亲会代表与姜太公后代姜竹先生,日籍华裔黄水清教授也赶来赴会。与会者提交了80余篇学术论文,并就炎帝的发祥地、姜炎部族的迁徙、中国史前时代的农耕及文化、姜炎文化的内涵及研究炎帝及姜炎文化的意义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发言、讨论和交谈。大家认为,现在来纪念并研究炎帝,应该是为了探索总结和继承发扬炎帝兴农耕、创市场



等开拓精神,一心为民造福以致因尝百草而中毒献身的奉献精神,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尤其需要这种可贵的开拓和奉献精神。

8月23日晚,来自北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和萧克、汪锋等与陕西省、宝鸡市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在一起,主持并参加了炎帝节的开幕式及其文艺晚会。24日又在新建的炎帝祠,举行了隆重庄严的公祭仪式,随后又观看了宝鸡市工农各界的彩车游行。前导的是摩托车大队,当年出门除了步行只能骑骑毛驴的姜炎后代,如今竟大批大批的跨上了新型的“电驴子”,并且全是本地自产的“渭阳”摩托车。彩车上分别展现了炎帝神农氏的故事业绩,又显示了新一代姜炎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当时适逢秋雨飘洒,人们竟都若无其事,衣衫虽湿却雅兴不减,有不少人撑开了各色彩伞,更使欢乐的人海中出现了锦上添花的乐趣。25日数万民众和中外来宾一起云集市郊常羊山,按照民族民间传统方式,向宏伟壮观的炎帝陵拜祭先祖。这一活动主要是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既显得古朴虔诚,又显得生动活泼。这里自古以来早有这类拜祭活动,但是只有在改革开放时期,政治环境相对安定了,人民生活开始富裕了,才能搞得如此规模宏大和有声有色。

炎帝节期间,还举行了有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副主席爱泼斯坦及美、英、日和埃及、保加利亚等国代表参加的93中国宝鸡工合国际研讨会。我国第一个工合组织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宝鸡诞生的。代表们共商了工合事业如何推动国际和区域间的合作与发展,让世界了解宝鸡,让宝鸡走向世界,使宝鸡的改革开放事业获得更大成果。以爱泼斯坦为顾问并由著名国际友人斯诺夫人海伦的亲属参加和扮演角色的电视剧《毛泽东与斯诺》,也于节日期间在宝鸡举行了开机仪式。更引人关注的是来自全国以至世界各地的经济贸易界人士和企业界,也与宝鸡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果有经贸洽谈,第一天的成交总额就达到了几亿元。人们说,先祖炎帝早在5000多年以前就提出“日中为市”,开创了最早的市场经济,后辈们将以更广阔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和根本改变我国特别是西北地区仍然显得落后以至贫困的面貌,作为无愧于先祖的炎黄子孙屹立于世界东方。

从公主到平民



右起：韋和、溥儀、溥杰、韋穎

帝王之家 神秘童年

溥和的祖父爱新觉罗·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受封为醇亲王。奕譞的第二个儿子叫载湫，在短命的同治皇帝驾崩之后，被慈禧太后立为皇帝，这就是光绪。溥和的父亲载洵即奕譞的第五个儿子。他的长子溥仪就是末代皇帝宣统，他自己即受命监国摄政王。

载洵曾娶一妻一妾，按清代皇族的俗习，妻子叫福晋，妾即称为侧福晋。福晋共生有两男三女，即溥仪、溥杰与榘嫔、榘和、榘颖。在这个帝王之家，福晋生下的男儿都称为阿哥，女儿即叫做格格，如果按汉人的习惯，就是公主的意思，所以榘和在王府里排是二格格，或说二公主。她是光绪的侄女，宣统的妹妹。

1911年10月4日，二公主榘和降生了。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载洵摘下了顶戴花翎，回到他的王府赋闲。他的醇亲王府地处后海北岸，从东到西，依次为家庙、神殿、佛堂、宫殿、正宅，戏台和花园。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共有数百间大小房子和殿堂。就以当中的宫殿和正宅来说，院落重重，厢房相接，前后五进院落都有机地连在一起，朱门大柱，画栋雕梁，斗拱飞檐，回廊曲折，俨然是一个小皇宫。

榘和从小就受到极其优厚的照顾。至少有三个女佣人，专门抚育她成长：一是乳母，只给她喂奶；二是看妈，就是看管他保护她的女仆，白天陪伴，夜里同睡，一刻也不离开，不能让她磕碰着，要确保她的安全和健康；三是叫水妈，在专为她设的小厨房里负责给小格格做饭、洗衣。此外，王府里还雇有一批缝工，专门为金枝玉叶们缝制一年四季的衣服、鞋袜和身上的装饰物。

王府虽然非常富有，但许多做

法小格格榘和并不感到舒畅。按王府的规矩，每次在祠堂里上过供的点心，半月或一月后撤下再换上新的，这撤下来的点心，不管是变质硬如石块，也不管是沾上了多少尘土，都由太监分发到各房里给小主人吃了。这是祖先所赐之神食，岂有不吃之理？还必须以敬仰感激的心情吃进肚里。比这更难咽的是生病时必须吃一种“万能粥”。不论病的大小轻重，王爷载洵都一律说是“吃多了”（只有特别严重时才请医生治疗），于是便采用传统的“饥饿疗法”，停止正常的吃饭，改吃“老米”稀粥。这所谓“老米”老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它是王府里贮藏了几十年、经过虫蛀鼠咬，早已变了质的糟粮，是一种与药一样苦涩难吃的食物。榘和以及妹妹们都把吃这“老

米”看成是一种处罚，她们尽量不让自己生病，病了也力图隐瞒。倘若惩罚临头了，她们也总是尽早说自己病好了，力求免除这苦食。这样载洵更加相信这老米的万能功用，说它不光能去火化食，还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王府的宗法礼教更加严格。榘和刚会下地走路，就要学习叩头请安。每天早晚，都要在看妈的带领下，到长辈那里请安。逢年过节或是列祖列宗的生辰和忌日，就到神殿里对着死人的牌位行三跪九叩的礼拜。

榘和的生活是呆板乏味的，她所接触的只有自己的父母、佣人和老师，整年整月都关闭在红墙深院里。

涉足宫廷 奇趣见闻



韞和丈夫郑广元在家中(近照)

1916年春天，皇宫里派“天使”到王府宣诏，让派人进宫觐见，也就是会亲。听到这个消息，王府上下都惊喜万分。因为自从1908年溥仪被抱进宫中当了皇帝后，除了父亲载沣作摄政王时在宫里见到他外，他的生母和祖母都没有见面的权利，韞和以及她的兄妹只听说紫禁城里有她一位皇上大阿哥，可从来还没见过面，还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

王府里经过几天的精心的准备，母亲瓜尔佳氏和祖母刘佳氏，带领韞和以及二阿哥溥杰、大格格韞、三格格韞颖等4人从王府里出发了。这天，她们都经过一番打扮，穿上了礼服。母亲和祖母梳着旗人的两把头发式，身着蟒袍，胸挂朝珠；溥杰头戴红顶官帽，身着青褂，脚上是小黑缎官靴；三位格格没有官服，都穿上了满身锦绣的旗袍和坎肩。

刘佳氏和瓜尔佳氏各乘一顶8抬大轿，溥杰和三位格格即各乘一辆骡拉的双轮大鞍车跟在后面。每辆大鞍车上都跟随着小主人的一位看妈。

这一行人在太监和王府官员的

前呼后拥之下，来到了神武门。这时，除了两顶大轿仍可继续前进外，乘大鞍车的便换乘两人抬的小轿，经御花园、太极殿，到长春殿的西配殿等候召见。

太监来请了，她们便跟着进入体元殿，只见南窗炕上端坐着一位满脸粉白的贵妇人，头戴昆邱帽，身穿古色古香的长袍，这就是已故同治皇帝的妃子——瑜妃。她的年纪很大，颇有些文化，慈禧生前对她颇为器重，她的言谈举止也处处仿效慈禧，面部表情严肃，说话总带着教训人的口气。祖母刘佳氏深知瑜妃重礼节，便赶紧带头向她磕了三个头请安，三位格格都跟着跪下来，接着，献上八盒点心和贡物，瑜妃说了声：“你们辛苦了。”这时，她身边的一个太监从一个小方盘中取出绿玉戒指递给刘佳氏和瓜尔佳氏，又将玉佩挂在溥杰和三位格格的襟前，她们又磕了三个头以示谢恩，瑜妃这时才说：“坐下吧。”

又等了十多分钟，体元殿的后宫门突然打开了，只见一大群顶翎官服的太监簇拥着一个10岁出头的男孩走了进来，这就是溥仪。刘佳

氏悲喜交集，声泪俱下，瓜尔佳氏神情茫然，像木头人似的；溥仪也显得拘束不安。格格们为有一个皇上大阿哥而高兴，但亲人一旦相见却又是相对无言！这会亲颇有点“探监”味道了。

第二天，她们照例坐上小轿往其他三位太妃——即同治的洵妃、璟妃和光绪的瑾妃住处，磕头请安，献上贡品，领到赐物。洵妃和瑾妃两人的言谈神态极为相似，而且都笃信佛教。她们在宫中虽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物质生活，但精神世界却是极其孤寂空虚的，两人都体弱多病，一副枯瘦而苍白的脸，说话的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颇像两个活佛。

进宫会亲，最使韞和吃惊而永生难忘的是“伺候用膳”，也就是轮番陪着四位太妃吃午饭。宫中御膳穷奢极欲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溥仪平时每餐的饭菜，总要摆大小七张膳桌，御膳房做出的各种菜肴有80多种，另外，还有四位太妃从各自的膳房送来精致可口的菜20几种，各种点心、米饭、粥十数种，咸菜小菜十几种。这太妃请客，有人“伺候陪膳”，那就更丰富了，那吃饭场面的排场复杂，犹如一次盛大的演出，十分有趣。

请客的太妃只要吩咐一声：“传膳！”这话像接力赛似的，从身边的小太监一直传到膳房里。不等回声消失，一个宛如公主出嫁送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膳房，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组成一支队伍，浩浩荡荡直奔吃饭的殿堂里走来。

首先进来的是一队太监抬着几张八仙桌，把桌子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大饭台子。紧随其后的一队太监，个个都捧着金龙添盆，有条不紊地把这大饭台围了一大圈。接着，揭开盒盖，把里面的银盘银碗拿出来放置台上，然后快速退下。菜都是盖着的，这时，一位太监发出了“打开碗盖！”的命令，一队太监一同围上

去取盖,拿走。这几十个太监,从进来退下,动作迅速,整齐划一,忙而不乱,没有任何磕碰的响声,如同在演出一场舞蹈。揭盖后,每个盘碗里都有一个鉴别饭菜是否有毒的银牌儿。这真是玉盘珍馐,钟鸣鼎食,各种香味儿,同时飘散开来。溥和在王府里逢年过节吃过的山珍海味,与这里的菜肴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了。

可是,由于拼成的饭台子过大,远处的菜连看也看不清,每人只能吃自己眼皮底下的几样菜。吃饭之前,祖母和母亲就认真地叮嘱溥和她们,不许乱挟菜,不能伸长手臂,更不能站起来去挟,那样是不礼貌的,被认为是贪吃的表现,这在主子面前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一来,满台佳肴,只能是“吃一看二眼观三”了。

太妃说是请客,但她们都“唯我独尊”,不讲什么陪客之道,她们的食量都像小猫儿似的,很快便吃完放下筷子。这样,客人即使没有吃饱,也得随主人作罢。这时一太监把刚才上菜的顺序倒过来再演一遍,溥和眼馋地看着将一台菜肴全搬了下去,而自己感到还没怎么吃饱呢。

不过,会亲所得到的赏赐却是丰厚的,溥和得到一百两白银,还有不少古玩玉器,大人们得到的更可观,即是她的两倍。

1922年12月1日,皇宫里举行溥仪迎娶皇后婉容的盛大典礼。这时母亲瓜尔佳氏已自杀死去,只有祖母刘佳氏带领溥和以及她的姐妹这7位格格去宫里庆贺。

第二天,皇后婉容从储秀宫乘小轿到永和宫来向瑾妃行叩头礼,溥和才有机会见到这位皇后的真容。婉容和溥仪同庚,芳龄17,身材匀称,肌肤细白如玉,瓜子脸儿,黑发如云,宽额头,细弯弯的眉毛浓淡相宜,一双明亮的杏眼,透露着秀气,配合着挺鼻子,樱桃小嘴,一切

都恰到好处,如同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姿色迷人,仪态万芳。这天,她盛妆打扮,凤冠霞帔,气度不凡,高贵而美丽,的确是一位标准的正宫娘娘。

到了看戏时,溥和有更多的时间和皇后婉容在一起了。溥仪大婚期间,一连演了三天戏,京、津、沪所有的京戏名伶如梅兰芳、杨小楼、王瑶卿、尚小云、余叔岩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马连良、李万春、侯喜瑞都来了,各种流派、各行当的名角,一时间全集中在紫禁城。戏台就设在宫中,白天上下午都演出。婉容不仅是一位天姿国色的美人,而且是一位才女,通晓书画琴棋,尤迷京戏,喜欢收藏梅兰芳的唱片,所以这演戏的三天,除了一些极重要的礼仪,她必须出头露面之外,她几乎场场不漏。溥和与她的姐妹们一直陪伴着婉容坐在漱芳斋的屋内看戏,婉容看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感动得洒下了眼泪。

溥仪和婉容结婚之后,为了消磨时间,打发闲愁,就常常请他的姐妹们来陪他俩玩,这样一来,溥和进宫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

逼宫风波 迁居天津

1924年11月上旬,溥和离开皇宫回到王府没几天,却突然发现溥仪也出现在这王府里,她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他回过这老家呢?不但溥仪来,而且皇后婉容也来了,溥和感到十分新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11月5日,冯玉祥将军逼宫,废除了民国政府和清室原先签订过的优待条件,派卫戍司令鹿钟麟把一直居住在紫禁城里的逊位溥仪和他的全班人马赶出了皇宫,他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悲哀地与这座龙楼凤阁永远告别了,暂时住在他父亲的王府里。

溥仪“蒙难”在王府时,他的英

文老师庄士敦以及几个中国老师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人仍视他为皇上,以为“奇货可居”,所以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他,希望日后有功而得到特殊封赏,这样一来,这几个心腹又勾心斗角。

在这场明争暗斗的较量中,郑孝胥占了上风,他捷足先登,11月29日,他让溥仪离开王府住进了日本使馆。

在日本人的安排和保护下,1925年2月24日,溥仪化装成日本侨民到了天津,先住在日租界的张园,后又搬到静园。

1928年初,载沣全家迁往天津。

溥和到天津,正是十七八的妙龄,这时,大格格毓嫔已嫁给婉容的哥哥润良,溥仪觉得二三格格这么呆着不是良策,便专门为她俩请了两个家庭教师,每天上午派小汽车来接这两个妹妹到他所住的张园学习日语和英语。

在张园,溥和与妹妹上午学一会儿英语和日语,中午这顿饭也在这里吃了。溥仪雇有中西两班厨师,他变着花样尝尽中国的四大菜系。西餐,他也经常调换各国的风味。这里已没有那么多繁琐的礼节了,溥和可以边吃边说话,自由自在地吃足喝饱,尽情地享受中外名菜的美味。

午饭之后,溥仪亲自驾驶他的高级轿车,带着溥和与毓颖在园子里兜圈子,或打打网球。有时,让这两个妹妹跟随他和婉容到英国人办的乡艺会俱乐部游玩,逛惠罗公司、立古和隆茂洋行,购买时髦商品。还给她俩买了骑马的制服,进跑马场骑马,到高尔夫球场打球。每次外出,都有一个日本警卫在后跟着。

皇帝指婚 订定终身

溥仪先是指定三格格毓颖和婉容的弟弟润麒订婚,然后才为二格

格和物色女婿。

1924年冬天郑孝胥帮助溥仪躲进日本大使馆后，他曾策划段祺瑞恢复原来订的优待条件，后因不能兑现，成了空头支票，所以溥仪对他的态度一度冷淡，他觉得脸上无光彩，便向溥仪请求回上海，以卖字为生。第二年春天，溥仪到了天津，郑孝胥带着长子郑垂再次从上海到张园来投靠他。

郑孝胥原是福建的头名举人，能诗善文，书法尤佳，早负盛名。1923年他被荐举到紫禁城任懋勤殿（这是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相当于一个老师的职务，专门为溥仪进讲。他讨得了溥仪的欢心，溥仪竟在一天之内接连下了三道“上谕”，破格任他为总理内务府大臣。这次郑孝胥到天津追随溥仪，仍为他进讲，并委任他管总务处。1928年，溥仪又派郑孝胥总管外务，派他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父子俩一同做了溥仪对外联络的全权代表。

这时郑孝胥已年近70，光秃秃的脑袋，一副遗老的打扮。他能言善辩，受到溥仪的信宠。他常在溥仪面前大讲他的“三共论”，什么“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说世界列强将来共管中国时，必然请溥仪出来复位，治理国家。他捶胸顿足，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一下子征服了溥仪，令他心驰神往。溥仪不但把郑孝胥捧为上宾，而且亲自到天津广东路公寓里看望他。郑孝胥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接待了他。郑孝胥还特意把溥仪在他家坐过的太师椅命各为“纪恩椅”，用红绳子围了起来，不再让别人坐了，以作永久性的纪念。

1930年冬天，溥仪又到了郑孝胥住地，老生常谈地聊了一会儿梦想复辟的话题之后，他突然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吗？”

“郑孝胥一时摸不着头脑，赶紧回答：“臣上海家里还有个二儿子，

叫郑禹，还有不少孙子孙女。”

“哦，都有照片吗？给我看看。”溥仪又说。

郑孝胥仍然感到惶惑，马上解释：“皇上，臣这里没有，容臣向家里索取。……”

溥仪点了点头：“好，好的。”

郑孝胥送走了溥仪后，便立刻给在上海的二儿子郑禹写信，让他快速寄来全家照片。

郑孝胥收到了这“全家福”后，立即就献给了溥仪御览。

溥仪十分认真地看着，对男人

广元作二格格和的夫婿。

和皇家结亲，这是郑孝胥也不敢想的事，但“皇上”仅仅在照片上这么一指，婚姻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他又遵照溥仪的旨意，向家里要了一张郑广元的单人照片送给了溥仪。

一天晚上，三格格颖带着溥仪的旨意，进入和的卧室，把郑广元的照片交给她，并转达了溥仪的意思。和看到照片上的青年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又听说颇有学问，她表示遵命了。



和(右三)与溥仪(中)、陈宝琛(右一)合影于北平日本公使馆

看得格外过细，然后用食指指着照片中一个穿西装的英俊青年说：“这个是谁？”

郑孝胥小心翼翼地靠近溥仪：“这是郑禹的儿子，叫郑广元，是臣的长孙。”这时溥仪抬起头来瞅着他，似乎还想了解些什么，于是他又向溥仪介绍说，郑广元23岁，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工程建筑系读书，天资聪颖，英文尤佳……

溥仪听着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直截了当地向郑孝胥提出，让郑

在上海，当郑广元从大学回到家里时，父母都高兴地对他说，宣统皇帝已给他指定了婚事，并向他恭贺道喜。开始，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既然如此，也只好听从“皇上”、祖父和父亲的安排了。

1931年，学校放暑假时，郑广元到天津看望祖父。在郑孝胥的引见下，郑广元见到溥仪。虽然他很想目睹二公主的丰彩，但是皇家的规矩极严，根本不允许他会见未来的妻子。

想不到，一场网球赛给他带来了意外的良机。郑广元在大学里曾担任过网球队长，经常代表圣约翰大学参加比赛。华侨林保华是网球名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网球预赛时，他从澳大利亚回国参加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在上海的体育活动中，郑广元结识了他。郑广元到天津时，正巧林保华也在这里，协助组织天津队对北京队的一场网球比赛。林保华知道郑广元身手不凡，竟让他以桃代李，作为天津队的队员参加了这场瞩目的比赛。

比赛开始之前，郑广元在体育馆里作适应性的活动。他举目环视四周的看台，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什么样的衣着打扮都有。当他扫描到主席台旁边的贵宾席时，目光在这里停住了。溥仪穿着十分讲究的燕尾服、戴着玳瑁眼镜坐在那里。他左边的女人浓妆艳抹，一副贵妇人的打扮，这无疑皇后婉容。他右边的是一位年轻女子，不施粉黛，穿着一身白色的旗袍，稍为烫了烫头发，俏丽而不做作，妩媚而不俗，庄端高雅。郑广元神情为之一振，立刻断定：她就是溥仪的二妹韞和！他和她虽然未曾相见，但在这之前，已按一定的礼仪互换过照片，从她这长相和装扮，郑广元完全确信，她一定是他的未婚妻。

就在郑广元注视他们的同时，溥仪侧过身来，对韞和耳语：“二妹，那就是郑广元——她顺着哥指示的方向，看到了比赛场地上的一位穿白色T恤衫，白色短裤，英姿勃勃、风度潇洒的青年。

漂亮的皇家公主，英俊的洋大学生，他俩的第一次意外相见，就是在这样的场合。

二格格韞和定下了终身大事，她和三格格照样每天上午被小车接到溥仪新迁的静园学习外文。但是，到了1931年11月中旬，情况反常，一连三天，她们干等在家里，却不见

静园派车来接，这是何故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溥仪失踪了！

东北陪驾 蜜月旅行

1931年11月10日夜，在日本人的一番精心策划下，溥仪偷偷地离开天津，到了旅顺。

日本关东军为了严密控制溥仪，封锁消息，就限制了他的活动，溥仪和婉容感到十分寂寞烦闷，需要有人陪他们玩，便派人到天津，向载洋“传旨”，要韞和与韞颖这两位格格到东北陪驾，这样，使者带领二格格和她的看妈德妈，三格格和她的看妈高妈，一行5人，从天津乘坐日轮到了溥仪那里。

3月8日，溥仪，婉容、韞和等人，到达长春。

日本关东军导演了一出政治丑剧，拼凑了一个所谓“满洲国”，让溥仪就任“执政”，郑孝胥当上了“内阁总理”。

1931年，韞和与郑广元结婚当天就离开了长春，但他们并没有马上就去英国，先在大连海滨的一个小别墅，度过了夏天。第二站到了东京，小住数天，又坐上大海轮经香港、仰光、新加坡、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饱览各地的海洋风光和世界名城，历时40多天才到达伦敦。

当轮船在伦敦码头靠岸时，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已站在码头上迎接。

庄士敦亲自驾驶汽车，带着韞和、郑广元穿过市区，到了西郊一个植物园旁边，在一幢小洋房面前停了下来。

这是庄士敦的住所，条件相当好，雇有几个佣人做饭、打扫卫生、管理小花园。他让郑广元夫妇住在他家里。

由于庄士敦是伦敦大学的教授，经他介绍，郑广元进入这所大学学习法律。韞和留在家里，请了一位

英国小姐专门教她学英文。到了1933年，这位公主在伦敦生下了一个小公主。

伦敦是座美丽的名城，每逢节假日，庄士敦都带他俩外出游玩。晚上，他们三人便围坐在壁炉旁边夜话，悠闲地喝着咖啡，重温皇宫的旧梦，谈论清朝的盛衰，为庄士敦正在撰写的《紫禁城的黄昏》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1934年3月，韞和一家回到了长春，每月由溥仪赐给每人生活费伪币300元，另外郑孝胥也经常给一些钱财，吃穿都不成问题，生活还十分优越。溥仪每次“出巡”以及两次到日本访问，他俩便临时给溥仪看家。

到了1937年，他俩带着三个女儿和佣人，一大家子都到了日本东京。郑广元在那里学习法律，韞和在家里闲呆着。两年之后，他俩又回到了长春。郑广元到伪满外交部担任欧美科科长，成为了一名外交官。

韞和与郑广元刚春风得意，可谁想到，一场历史的风暴，将他们从云端里栽倒了下来！

穷途末路 仓皇逃亡

1945年8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大势已去，节节败退；“满洲国”风声鹤唳，岌岌可危。

8月10日，韞和接到溥仪的通知，让她作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一同出逃。她只好急急忙忙将一些珠宝、首饰和细软都收拾好，听候出发。

11日晚，韞和、郑广元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一个看妈，一家6口人，慌慌张张地上了溥仪和婉容逃亡的专列。

溥仪的专用车厢上本来有一个小厨房，但“御厨子”在长春便遗散了，没有跟着逃跑，随侍临时给他做饭，可是连擀面杖也没有，就用啤酒瓶代替，只能做最简单的擀面片。这



韞和(右二)与皇后婉容(右四)、淑妃文绣(右五)合影

么做好了,又没有筷子,溥仪和婉容端着面片汤就用嘴吸吮,也呼噜噜地吃下去了,十分狼狈。溥仪有生以来也没有吃过这样简单的饭。

这样跑了两天两夜,十三日早晨,到了这条铁路的尽头——临江县大栗子沟,列车再也没有路可逃了。这是山沟里的小火车站,冷冷清清的,附近有一座日本人经营的铁矿。

韞和一家随大家下了火车,她往北走了两百米,看见排列着一排排日本式住房,这是大栗子沟铁矿株式会社的机关所在地。最北边的一所平房,是日本矿长的住宅,共有十来间房子,如今房主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成了溥仪临时的“行宫”,他和婉容就住在这些房间里。

龙走兽散 流离他乡

8月15日清晨,韞和从带来的收音机里听到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安插在溥仪身边的人物吉冈通知他明天动身

乘飞机去日本。在沈阳他们成了苏军的俘虏。

溥仪被俘后,留在大栗子沟的人们失去了依靠,没有了主心骨,不知如何是好。一家子从那里到了临江城。

1945年底,临江县被八路军解放了。她交出带来的所有的金银财宝,再也没有追查她了。这时,婉容以及溥杰的日本老婆嵯峨浩被八路军带走了,其他人的真正身份一直不敢暴露,有意隐瞒着,各自悄悄地寻找出路。

韞和一家从临江到了通化,住了一些日子后又向关内移动。

韞和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和凄苦。每天早上,她就到市场上购买一些生白薯回来,她用丈夫和大女儿打回来的柴煮熟,然后再和孩子们拿出来卖,从这买卖中挣得少许的辛苦钱,用来维持生活。

另外,郑广元从长春逃出来时带有一些药物,尤其是一种德国制造的拜尔眼药,帮助这一家解决了

不少实际问题。这眼药原来是粉状的,郑广元弄来了些蒸馏水,冲化后分装进一个个小玻璃瓶里,摆摊出售。在这穷乡僻壤,正缺医少药,这眼药水成了稀奇宝贵的药物,很受老乡们的欢迎。这眼药水十分有效,人们无形中进行了义务宣传,竟给郑广元一个美号,称他为“灵仙”。需用老乡就拿高粱米、玉米糝等实物来换他的眼药。

他们住和穿都是极其简陋和寒酸的。为了节省一些烧炕的柴火,一家7口人都挤在一个土炕上。因为没有什么衣服经常更换,更谈不上洗澡了,时间一长,每人头发和衣服里都长了虱子,尤其是冬天,可以随便抓出一把来。夜里把脱下的棉袄脱下来,扔到院了里干冻,用这方法能冻死一些虱子,第二天穿着才舒服些。

他们经常吃一种所谓的“炒面”,就是用玉米皮、黄豆皮和谷糠,渗进一点玉米面和豆面,成了一种混合面,用这种“面”蒸饅饅,很难咽下肚。有时,连这种食物也没有,夏天只好到地里挖野菜充饥。

艰难险阻 辗转返京

韞和一家在新滨实在无法再生活下去了。她决定回北京,投靠父亲载沣。

1948年夏天,韞和与郑广元决定,趁着到了热天,卖掉了被子和家里的所有破旧,凑钱买了一辆小木车,装上了日常必要的一些生活用品,炒了两袋混合面,一家人便这样告别新滨而上路了。

韞和背着在临江生下的小男孩,坐在这小木车上,郑广元在前面用肩拉,三个女孩在车后一起推,沿着大道慢慢地前进。每天早上出发,晚上找地方投宿,烧点开水,冲些混合面作晚餐。

一天,他们进入了一个混乱地区,白天,国民党的还乡团回来掠

夺,到了晚上,解放军又反攻过来,你来我往,反复拉锯,傍晚,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韞和一家进入了一个叫古楼的小村镇,在镇边找了一间空无一人的房子随便歇息了。第二天黎明时分,解放军早已撤退得无踪无影了,韞和与郑广元起床烧水,准备弄点东西吃再上路。不料,还乡团回来了,看到了炊烟和有人走动的身影,以为解放军还住在这里。几个兵痞子端着枪,举着手榴弹,气汹汹地冲了过来。韞和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孩子们更是吓得哇哇

抚顺坐火车到沈阳。韞和身上仅有的三千元法币,一路上都会不得花,但这钱给刚满两周岁的小儿子买了个馒头就用去一千元。其他人只好仍吃带来的“炒面”。适逢两个女儿拉肚子,病中的孩子哪能吃这难进口的东西呢?急得韞和团团转,几乎想上街乞讨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们遇上了一位善良的女人,见他们一家这样流离失所,又饿又病,实在可怜,便送给他们一锅大米粥和一点咸菜。



韞和(左二)与载洋(右四)、溥仪(右五)等人合影

地哭了起来。

还乡团像几只野狗一样,到处乱搜查一阵,只发现行李上有郑广元一双新鞋,顺手抢走,便扬长而去了。

韞和一家日行夜宿,餐风宿露,他们这样整整步行了十五天,千辛万苦,总算从新滨走到了抚顺,再也走不动了。

他们只得卖掉了那木头车,从

韞和与郑广元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大米了,现在看到这锅大米粥,都馋得真流口水,比以前看到山珍海味还要诱人。但他俩一碗也舍不得吃,仅喝了两口米汤,其余的全让几个孩子吃下去了。

他们山穷水尽,写信和北京的亲人联系,总算在沈阳找到一个借路费的地方。借到了路费,韞和才舒了一口气,终于回到了渴望已久的

北京城。

脱胎换骨 平民生活

韞和又住进了她阔别 20 多年的醇亲王府。可是,这王府今非昔比。父亲载洋是抗战胜利后才从天津回到北京的。1939 年天津一场大洪水把他公寓里的所有珍贵的字画都泡汤了,断绝了财源。另外,自从溥仪当了俘虏后,再也不能拿钱孝敬这王爷了,同时,载洋又不会经营管理,仍然保留着大量的佣人,各方面都还摆出王府的阔气,大量挥霍过去的家底,坐吃山空,钱财日减。韞和还以为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因为几个妹妹都像她一样先后回到了王府,一下子又增加了几十口人,有时供应的饭菜已是窝窝头和熬白菜。

北京解放了,王府已彻底败落。1950 年下半年,中央人民政府拨款征收了醇亲王府的全部院落,包括它的花园。载洋搬出了王府,自己在东城买了住宅。他因为糖尿病导致尿毒症,1951 年 2 月,这位王爷寿终正寝了。他生前对各位格格则是采用“分钱包干”的办法,不再大包大揽了,给每人一份钱,让她们各自买房子。她们各立门户,自谋生路。二格格韞和买了三间平房,告别了过去,开始了新的生活。

韞和的丈夫郑广元很快就业了,他投身于北京邮电局基建处的设计工作,他从技术员升到了工程师。

韞和便在街道上参加扫盲活动,教妇女认字,给大家读报。别人称她为“老师”,她既高兴又是不好意思。其后,街道办起了各种工厂,许多家庭妇女都走出家门,参加了工作,她又主动承担给妇女们照看孩子的任务。

起初,她帮别人看三个小孩,完全是尽义务的,分文不取。三个月后,她每月得到了 10 元的报酬,心

里激动得不得了。这是她的真正劳动所得，她的劳动贡献第一次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随着幼教事业的不断发展，韞和正式办起了一个幼儿园，入园的小孩逐渐增加到六七十人，阿姨也增加了，她当上了幼儿园的负责人。工资20多元，她经常受到街道领导的表扬，也博了家长们的一片称赞声。

后来，几个幼儿园大合并了，韞和改行到窗纱厂当了一名正式工人。

1959年12月4日，作为战争罪犯而被关押的溥仪，特赦回到了北京。从此，这位清朝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成了新中国的普通公民。为此，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和宴请溥仪和他的弟妹们。

一走进政协礼堂，周总理迎了过来，和蔼有礼地与韞和握手，韞和有点慌乱，赶紧伸出双手，握着总理的手，久久不放。

总理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韞和，

问：“你是老二吧？”

韞和点头回答：“是的。”

总理又说：“你在幼儿园工作，为新中国培养下一代，这是崇高的事业。”

她非常惊奇，总理什么都一清二楚，太了不起了！此时，她怀着对总理敬佩的心情，不安地说：“我没有经验，干得不好。”

总理马上又说：“不，我听说你工作很有成绩嘛。”

听到总理这样评价她微不足道的工作，她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感动的眼泪。

1961年2月12日和1961年6月10日，周总理又两次宴请溥仪及其弟妹们，韞和也幸运地参加了，再次聆听了他的亲切教诲，她一直牢记在心底，愉快地工作和生活。

周总理一直关心爱护爱新觉罗这一家，即使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里，爱新觉罗家族，仍是总理特别保护的四十六个家庭之一。

太平盛世 安度晚年

一场暴风雨过后，太平盛世，河清海晏，韞和这位昔日皇家的公主今如何了？

韞和与她的丈夫郑广元都早已退休了。郑广元现在任北京西城区的政协委员，也是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委员，他精神矍铄正筹划撰写《伪满宫廷十年纪事》及他祖父郑孝胥的传记。

韞和今年已81岁了，身体尚硬朗。她家的住地几经变迁，在原来王府大墙外面，曾住过很长的一个时期。那仅是两小间平房，每间只有七八平米，而且两间相连不相通，既不宽敞也很不方便。一切家务都得自己操劳。家里没有煤气罐，多少年都是用煤炉生火做饭，有时煤铺送煤不及时，自己就动手去买煤。房子里没有自来水管和下水道，一年四季，都得到院子里提水和倒水。

去年她告别了那两间小屋，搬迁进一套宽敞明亮的新单元楼房里，生活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步。

梁武帝离朝当和尚

●石林

梁武帝萧衍，曾为南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南齐内乱，起兵夺得王位。他设谱局、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提倡佛学和儒学。他工于诗词和书法，善于韵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他手不释卷，下笔成章，辞采华丽，婉转含蓄，富有神韵，在文学艺术上颇有成就，当朝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书法集现已佚传，明朝时有《梁武帝御制集》流传。

由于梁武帝过分迷恋宫廷糜烂的文艺生活，朝政松弛。晚年又迷信佛教，定佛教为国教，大建寺院，不理朝政。他在建康（今南京）兴修了同泰寺、光宅寺、大敬爱寺、智度寺、长干寺等大小寺院。他本人生活也跟僧人一样，五更起床，粗茶淡饭。遇有人被判刑，他还要哭一番。他常脱下皇帝的龙袍，穿上和尚的法衣，到佛寺升堂讲经。

公元547年的一天，同泰寺内热闹非凡。八十多岁的梁武帝身穿法衣，在大殿里讲经说法。大殿里庄严肃穆，一万多僧众在虔诚地听他讲经。讲完后，他便要求净身削发为僧。文武官员再三相劝，他就是不听。梁武帝曾三次离朝到同泰寺舍身当和尚，每次都是由文武大臣集资把他赎回。由于他迷信佛教，不理朝政造成政务废弛，政局动荡。

公元549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叛乱，攻占建康，梁武帝当了俘虏，不久被活活饿死。梁武帝迷信佛教，不仅造成他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南梁王朝的灭亡。梁武帝活了八十五岁，在位47年，但南梁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人一帝的短命王朝。

在北京西边的美丽郊外，新近落成了一座四层小楼。比起附近纷纷崛起的豪华楼群来，这小楼实在不显眼。但是，因为这楼是分给一个连队的，是分给一个除炊事班有几名男兵外全是女兵的连队的，所以，这座被女兵们戏称为“女兵楼”就有了格外的色彩。

推开女兵楼永远关闭的大门，每一个人都会由衷地感叹够档次。这不是吹牛，女兵楼在整个人民解放军的连队宿舍里无疑是第一流的。

老百姓都这样认为，男兵嘛，没什么稀奇，当女兵可不是削尖脑袋都能办到的事了。实话说，女兵连的女兵，是靠这样那样的关系进来的。但是，女兵连中的平民子弟也不在少数，现任连队指导员蔡明月就是。1982年的接兵时节，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遇到接女兵的女军官来正常家访，父母吓了一跳，什么时候在家温习功课准备再一次报考大学的小女儿被验上了兵？等到从北京寄来一张英姿勃勃的女兵照片，父母才完全相信了他们活泼的小女儿真成了一个兵。

蔡明月当兵是很偶然的。本

来，她高中毕业差几分没考上大学，准备补习一年再考。在学校她是班干部，喜欢文艺，经常在学校活动中讲故事朗诵，所以，蔡明月希望自己能考上广播学院，或者成为医科大学的学生，她惟独没想到去当一名女兵。一天，她从报纸上偶然读到一则招兵消息，到学校一问，果然。蔡明月顿时把所有其他的理想全抛弃了，一心想当女兵，学校只有一个女兵名额，报名的女孩子很多，一路刷下来，只剩蔡明月和另外一个军人家庭出身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关系过硬，蔡明月没有关系，但接兵的庞技师力主要她。庞技师每次家访，都发现蔡明月在看书，聊一聊，又很有头脑，再加上她有文艺特长，庞技师非要她不可。只有一个女兵名额，那个女孩子也不放弃，就僵住了。最后又从别处调整拨了一个女兵名额，才算都如愿以偿。

一号台新提干的少尉军官商树秋，当兵也是很偶然的。她的父母也是普通人，没有一点关系。偏偏那些有关系的女孩身体总有某一地方不合格。这样，体检合格的商树秋就入伍了。

如花朵一般的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正是怎么打扮也不过分的年纪，突然被一身绿军装束缚住，总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应，于是，纠察就有了事情干。某天，几

女兵楼的故事

• 舒云



女兵楼的故事

个被纠察住的女兵一口同声地说她们是女兵连的。纠察说,不对,你们绝不是女兵连的,女兵连的军容风纪从来无懈可击。果然,这几个女兵是冒充女兵连的。

女兵连的军容风纪,走进女兵楼就一目了然了。在这女兵的天下,一切都是井井有条,洗脸间里的脸盆都是整齐划一的,脸盆里的缸子梳子全在一样的位置上。宿舍里更没得说,无论放两张高低床的小房间,还是放四张高低床的大房间,被子都叠得一样地齐整,看来只能拿豆腐块来形容了。这被子已经被她们叠出了标准,老兵一两分钟就叠好了。新兵呢,叠被子是一道难关,又拍又打上十分钟,那臃肿的新被子也不一定驯服。女兵连最小的女战士邢笑飞是今年从唐山入伍的,人家问她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她一下子说漏了嘴,说她还没有出生呢。人们才知道这位稚气未脱的小女兵是唐山大地震之后的1977年底出生的,穿上军装时才刚满15周岁。邢笑飞在新兵连,别的都好说,就是叠被子让她大大地发愁。她说,被子老叠不好,班长一生气把被子从窗户扔了下去。几个月过去,邢笑飞的被子已经叠得与老兵不相上下了,一般人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老兵的床哪个是新兵的床。

如果说被子是一景的话,那么女兵楼的配套设施就是另一景了。

窗明几净的阅览室,有整整一面墙的大书橱,里面的书都是挑选过的适合战士们阅读的好书,大约有几千本吧。图书阅览室没有人专门管理,开放式的,什么时候进去选择图书都可以。取了书后在图书登记本上登记一下就行了,但是,女兵连的战士们借书并不是那么踊跃。并不是她们不爱学习,实在是工作太忙了,除了一天三班倒外,余下的时间还要业务训练,每个月都要例行一次严格的考核。老兵当然无所谓啦,那业务知识已经翻来覆去在她们的脑海里折腾好几个年头了,新兵就不行了,就是睡觉前也抱着业务本看个不停,恨不得吃下去。

女兵楼的四层,有一个很大的被称作为俱乐部的房间,全连百多号女兵可以在这里跳集体迪斯科,那真是一种壮观。音乐骤起,那么多青春的身躯,密密麻麻沸腾了一间大房子,仿佛空间拥挤起来,仿佛时间也拥挤了起来,时空都交织在这青春的旋律里。女兵们全都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不会跳在这种时候也上场了。

军营是很严肃很寂寞很单调的封闭社会,女兵连也并不例外。而外面的世界却在千奇百怪地变化着,五彩缤纷的信息熙熙攘攘地涌进来,谁能抗拒呢?女兵们大多出身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又大多是高中毕业生,本来就见多识广,爱好万千,偏偏又在封闭的军营里干着接转电话的工作,自然信息更广泛了。不要说歌厅舞

厅,就是一件花衣服也令人艳羡不已。有一名女兵悄悄在自己的下铺床顶上贴了一张漫画,画上那个穿着肥大军衣的女兵,当然就是她自己啦。她望着窗外绿荫小路上的一位时髦少女,眼睛中流露出茫然失落。但是谁又能说这双燃烧的眸子里没有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呢?女兵连抓住姑娘们爱着时装节目和时装杂志的心理,发动她们拿出藏得极秘密的美丽衣服,组织了一次时装表演赛。当尽情的表演结束后,女兵连以团支部的名义召开了“怎样看待时装与军装”的讨论,还特邀了地方上的几名男女青年参加。地方青年谈到女兵不仅拥有女性的温柔和妩媚,更有一般女孩不具备的刚健与威武,特别是当地方青年谈到如果让我们穿上军装,我们情愿扔掉价值千元的时装时,女兵们激动了,她们感到了这身并不时髦的军装的价值,增加了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之情。

女孩子们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军营,这在和平时期就是很大的牺牲了,应该在军规许可的情况下让她们尽情地浪漫一下。这就需要连队领导充分考虑女兵们对新事物的强烈向往和追求,搞一些多层次高品位的文娱活动,寓教于乐。三年来,女兵连共引进并设计了适合本连特点又具有时代感的各种活动将近200次。

比如,“成功的路就在你脚下”主题会;

再比如,“改革春风荡,家乡面貌新”演讲会;

噢,还有模拟旅游。

女兵连指导员蔡明月有一天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地方某大学在进行党史教育时开展了“模拟长征”的做法,觉得很不错。于是,她设计了从北京到广州等方向的“模拟旅游”,指定家在沿线的20多名战士担任导游。这新鲜的一着,使战士们积极性高涨起来。她们查资料,翻字典,找熟悉风土人情的人询问,甚至打电话问亲朋好友。全体女兵看着祖国的地图,乘上假想的列车去旅游全国。导游员们声情并茂地介绍改革开放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地理地貌、名胜古迹、名人轶事等等。女兵们对这种新颖别致的活动特别感兴趣,高兴地说,不出连队门,就到全国各地旅游了一圈,大

开了眼界。

女兵连还根据勤俭节约的教育,设计过一次讽刺漫画比赛。每个战士针对连队的不良现象每人画一张讽刺漫画,不管会画不会画,反正都得“赤膊上阵”。画完之后,要登台解说,使每人既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

还值得一提的是女兵们去香山植物园开展的“赏花寄情”活动。活动中穿插以花名为谜底的游戏。提问这种花叫什么?你为什么喜欢它?它有什么高贵的品格?你能背出与这种花有关的诗句吗?这种赏花寄情,实在是适合女孩子特点又具有现代风格的活动形式。这点子是女兵们自己想出来的。

女兵连在设计和开展活动中,紧紧抓住女孩子喜新厌旧这个显著特点,力求不断变换活动形式,搞新搞活。这100多个女孩子,在家个个是宝贝,哪一个的父母也不会忘记给自己的宝贝过一年一度的生日。来到部队,男孩子对生日也许并不看重,而女孩子却十分在意。同样是从新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女指导员蔡明月看见女兵们常常以班或几个好朋友为单位,买来大蛋糕,自己给自己过生日,她想,如果把过生日也组织起来,不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方法吗?蔡明月向党支部建议每月举办一次集体生日晚会。每到这天,全连官兵都欢聚在俱乐部里,在朦胧的烛光中,为当月过生日的小寿星们献歌献舞。从那以后,这样的生日晚会已经举办了四五十次,每次都使女兵们激动不已,偶而来队赶上集体生日的家长更是感动。本来抱着给孩子办理调动手续的何荣的家长参加生日晚会后,她的调动不办了。

女兵连在寓教于乐中,并不回避那些敏感的话题。女孩子刚到部队,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知识,自理能力差,有的甚至连衣服也不会洗,往洗衣粉水里一泡,拎出来就晾在晒衣竿上了。还有的心理脆弱,遇到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不知所措。指导员蔡明月针对这种情况,举办了生活指导讲座,给她们讲青春期的生理卫生,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等。不仅讲大课,还注意对青春躁动期的女战士进行具体指导。

女兵楼的伙食那是没得说,连队专门搞了营养配餐,逢年过节,还搞上一次自助餐。这自助餐可不简单,炊事班要忙上好几天呢,光菜的品种就有30多样,八一建军节前夕,女兵们吃高兴了,纷纷举起杯中的饮料和低度香槟酒向炊事班的男同胞敬酒。

在女兵楼,也还有一个刚刚建成的健身房,十件大大小小的健身器材供女兵们锻炼。听说她们已经请来了健美老师,准备在业余时间大干一场呢。

哦,祝女兵楼走出来的女兵们更美丽。

王致和,安徽省仙源县举子,在清康熙八年进京考试名落孙山,欲归故里,又苦于路费无着,只好留京等下科再考。幼时曾做过豆腐的王致和,为维持生计,便在所住的前门外延寿寺街羊肉胡同的“安徽会馆”内,用手推的小拐磨,每日磨十几升豆子做成豆腐沿街叫卖。

有一次,做好的豆腐没卖出去,剩下许多,又时值仲夏,怎么办?他猛然想起家乡有时用豆腐制成酱豆腐,但不晓得具体做法。于是,他试着将豆腐切成小块,加盐及花椒封在坛里,一直没有管它。秋凉之后,他才想起这些豆腐块来,刚打开坛盖,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再仔细一看,豆腐块已呈灰绿色。他好奇地入口品尝,味道却很美,送给邻里们品尝,也一致称赞。从此,王致和的臭豆腐开始扬名了。

王致和 屡试不中 发明臭豆腐

●翟惠军

王致和官运不通,屡试不中。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索性在延寿寺街路西建立作坊,树起“王致和南酱园”的招牌,雇师招徒,专门做起臭豆腐的买卖来了。

到了清末,王致和的臭豆腐竟成了慈禧太后的御膳珍品。那时,御膳房每天要为慈禧准备一碟用炸好的花椒油浇过的臭豆腐,而且必须是当天新从“王致和南酱园”买来的。但有时去晚了或赶上“王致和”停业盘底,买不到新的,太监们就只好用剩下的顶替。为人狡诈的慈禧,为考验侍奉她的大监,有一次在进膳时,把一粒花椒暗藏在臭豆腐中。到了第二天,慈禧进膳时,她拨开碟中的臭豆腐一看,那粒花椒果然还在,于是她重重处罚了主管大监。从此,太监们只好到“王致和南酱园”去求方便,以保证不误“上用”。

臭豆腐一经“上用”,身价更高了。“王致和”门前的三块立匾,均彩绘龙头,以示“大内上用”。“王致和南酱园”六字,分做两块匾,分别由状元孙家鼐、鲁琪光书写。孙家鼐还为其写了两幅门对,一幅:“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另一幅:“酱配龙蹏调芍药,园开鸡趾钟芙蓉”。两幅门联四句的头一个字合起来是:“致和酱园”。



丁素兰和她的“一贴灵”

● 孙洪涛

周总理生前曾指示： 北方要解决老年人 气管炎病

她叫丁素兰。在北京新外大街23号解放军总参管理局医院挂牌：“丁氏膏药一贴灵”。

丁素兰出生在河南临颖的一个小村里，她从小就受祖父和哥哥的熏陶，上小学三年级时，她已能行医治病了。18岁高中毕业后，经过中级中医学习班培训二年就分到医院工作。周总理生前指示过的：“北方要解决老年人气管炎病”，她发誓十年苦学不笃，用全部精力坚持自学。朴素而又内涵丰富的国医精旨增强了她的悟性，她认为：生命的根本，来源于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凡人体中的九窍、五脏、十二关节，都是与自然界阴阳之气贯通的，如果人们不善于调养，违反自然界五行和阴阳气变化的规律，必然会损害身体。为探讨人们在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患气管炎、肺心病的原因，丁素兰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她凭着天赐一个女人善良的心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仔细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不同地理环境患者所患疾病有了不同区别的认识，她记下了东西南北中这样的大联想。

东方地区，气候温和，地处海岸，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大多是水网稻田，民众把鱼做为主要食品，并且喜欢咸味，但是，鱼类吃得多了可

以使人产生内热；咸味吃多了，容易损伤血液；

西方地区，多系沙漠地带，类似季天，气候干燥清凉。那里的地热高，风沙多，水土的性质刚强。饮食多是酥酪以及肉类脂肪含量较高的东西，因而人们形体较肥胖；

北方地区，地热高而多丘陵，气候严寒，类似冬季。当地人以游牧为主，喜欢住帐篷，吃的多是牛马羊等动物的乳汁。因此，内脏就易受寒；

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阳气最旺盛，类似夏季。那里的地热低洼，雾露之气常年弥漫不散。当地的人喜欢吃经过发酵制作的发酵曲酱等食品，他们的皮肤以及肌肉纹理疏松，而面色较红；

中央地区，地势平坦而气候湿润，那里的物产丰富，人们的食物种类繁多，生活比较安逸，但是，由于人们体力活动较少，因而气血运行不够流畅……

这些细致的观察、细致的记录，使丁素兰在实践这样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医生，就应该把这些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理所导致的疾病全部掌握起来，并且能机变，应用。为了采到野生的珍品药材，她几乎踏遍了名山大川的岭岭坡坡，沟沟壑壑，采集华山参，丁素兰在那个炎夏里，冒着酷暑，顶灿灿烈日，汗流浹背地爬上险峰悬崖，她深知，华山参在没有开花之前生命力最旺盛。她接着便是加工，筛选，泡制，提炼，十

年间丁素兰生命的时钟就这样不停地前进着，艰辛地培育出国内外著名的“丁氏膏药一贴灵”。

如今，她桌上每天上百封各地患者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是她用自己生命的赤诚谱写了一首首对华夏子孙的热爱长诗——

干警周华良，45岁，因多年搞刑侦工作，风雨出击，受寒积深，一到冬天他就咳嗽得嗓子红肿疼痛，吃什么药也不管用，抱着一线希望求救于丁素兰。丁大夫对准了他的前胸、后背几个穴位，只贴了一贴膏药，他就觉得轻多了；第二贴膏药，老周嗓子肿疼消失；第三贴膏药，他高兴地说：“我已经成为一个‘正常人’了！”

全国政协委员郑浙兰，年已花甲，苦于多年喘息性气管炎、冠心病而经常住院、卧床，敷用丁素兰外敷膏3次，已能平睡，背部感到轻松舒展，咳嗽次数明显减少，她“多年陈疾一朝除”。感谢丁大夫“广洒爱心祛疾情深”。

一位患多年肺气肿的新闻记者，贴药之后登上自行车，只五六分钟便觉憋气的情况明显好转，由过去的艰于呼吸能一口气吸到底。他感叹不已：真是神医神药！

这种新开创的外用穴位治疗气管炎病法，已被许多患者所熟悉，引来台湾、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患者前来接受治疗，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健康报》、《人民政协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均给予了热情的报道。

最近慕名而来的某外商欲出资100万购买“丁氏膏药一贴灵”秘方。对此，丁素兰诚恳又动情地说，这处方不是我个人的，而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宝贵的遗产的结晶，它是属于古老华夏的。我愿用毕生的精力为龙的传人健康生活服务。

刘淑华出身于中医世家，祖辈均为外科病著名专家。她已行医、任教三十余年，现任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 57323 部队门诊部中医科主任医师。

刘大夫专治老、中、青前列腺、前列腺肿瘤、男子性功能障碍及男性不育症。她多年的医学实践和继承祖传秘方研制成功了前列消①②③号、阳萎灵①②号、癫痫灵①②号等方剂，经临床治疗 1 万余例，其有效率达 95% 以上，治愈率达 85% 以上。在中医男性专科治疗上独树一帜。

她医术精湛，被誉为“传播幸福的天使”。如农民王金木，结婚近十年，因患无精症。爱人要求离婚，刘大夫根据其病情施用了“前列消”，服药一月，奇迹出现了。精子数量每毫升达 67000 个，活动率达 75%，

恢复了生育能力，夫妻和睦了。

一华侨慕名越洋来京求治，一年后喜得贵子，起名“念华”以示对祖国和刘大夫的感激之情。青年贾长洪，19 岁，不长胡须，嗓音尖细、生殖机能异常，无男子汉气概。经刘大夫施用“阳萎灵”治疗，贾长洪恢复了男性特征，后来得以结婚。

治疗癫痫症是刘淑华大夫发挥中草药神力的又一绝招。王聚财两岁时患癫痫病，一天发作数次，四处求医，花钱不少。在绝望中找到了刘大夫，经服用“癫痫灵”三个月后即获痊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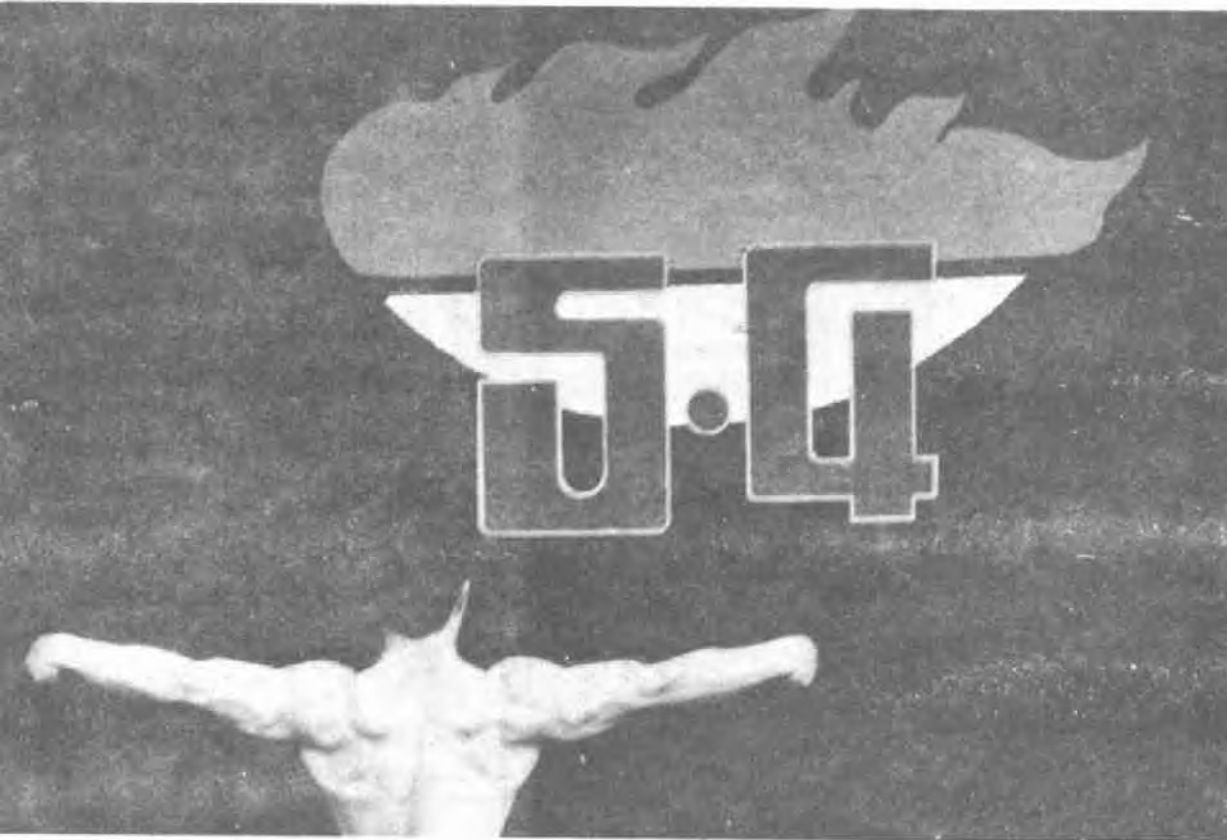
北京中央九家报刊相继报道了她的事迹。

57323 部队医院门诊部中医科特邀开设专家门诊。设有两个诊点。其一：北京蒲黄榆 1 号院。电话：6770325 转 383 或 384。其二：北京

●吉文

她为男性 追回青春

市阜成门北大街西二环路甲一号
(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门诊部)。
电话：8318887 转 3294。





从零开始的 中国潜艇部队

王健娃

别无选择

1950年11月。上海黄浦江边24层的百老汇大楼前，走来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他叫傅继泽，30出头，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参谋长，30多年后的海军副司令。几天前，他曾在这豪华大厦里受到海军肖劲光司令的召见，但除了兄长般的询问外没得到任何指示和任务。今天，他再次奉命前来，心中不免揣测。

傅继泽走进房间，身材高大的肖劲光已起身相迎，那红润的面色流露着掩不住的兴奋。

“告诉你有一个好消息，”肖司令放开嗓音笑着说，“中国马上要筹建潜艇学习队！”

“学潜艇？”傅继泽似乎没有听清，“我们也要搞潜艇？”

肖司令一边请他落坐，一边沉稳地讲起这不寻常的决策。不久前，肖劲光奉中央和军委之命到苏联考察访问。其间，他在苏联海军部拜访了潜艇部队负责人巴尔图诺夫海军少将，向他请教建设潜艇部队需要解决的问题。自信的苏联海军少将首先谈到潜艇在现代海战中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二战中，英国被德国击沉的军舰中，有20%是被潜艇打的，而商船高达70%，日本被美国击沉的舰船中，有60%毁于潜艇；苏联击沉德国军舰大多也是用潜艇打的。一席话，启发了中国海军司令：中国海军几度兴衰，潜艇一直是空白；新中国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应付现代战争，建设潜艇部队势在必行。肖劲光即时向苏联海军部提出帮助培训中国潜艇艇员，得到了应允。他回国后马上报经中央、军委，以政府的名义向苏方正式提出为我国提供潜艇，并由苏方为我国培训4艘潜艇人员的要求。

“到苏联去学习？”一直屏息静听的傅继泽禁不住问。



傅继泽（左一）陪同朱总司令视察潜艇学习队

“对，初步定在海参崴。”

潜艇技术复杂，西方人为它经历了千百年的探索，数次战争的实践，终于使这条“海底蛟龙”傲立于现代新武器群雄之中。中国光绪年间，有人想走“自力更生”之路，他自费在天津海岸围起一片海域，用木料进行潜艇试验，但没多久就神鬼不知地销声匿迹了。此后，再没第二人。

1946年，国民党曾下决心搞潜艇部队，组织了近百人的赴英潜艇士兵训练队。结果，写在协议书上的希望也成了泡影。与此同时，派往美国、德国学习考察的人员也终未如愿。

新中国诞生，海军建设进入春天。可是，一方面东南沿海硝烟未散，北部朝鲜战火又起，战争创伤要医治，台湾要解放，美英等国的敌视政策企图将新中国扼死在“摇篮”中；另一方面，潜艇技术本身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技术、战术已相当复杂，时间、精力以及经济实力都不允

许我们一步步从头做起，必须选择最佳途径。

“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要把苏联建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肖劲光注视着傅继泽，目光中充满信心，“经海军党委研究决定，由你担任潜艇学习队的领队。”

傅继泽参加革命十几年来，他屡受重任，屡建战功；但海军军龄只有一年，而潜艇学习队毕竟预示着一项崭新事业的开始。一年前，傅继泽在“当大使”还是“干海军”二者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今天，已别无选择。他沉稳而坚定地说：“我干。”

“留学”到旅顺，神秘变神圣

1951年3月上旬的一天，海军司令部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正式通知：“友方已决定帮我们训练四艘潜艇艇长（包括舰队、艇上、基地及随去的翻译），并要我方人员于4月20日全部到达旅顺。”



●1951年11月7日，中苏军官在旅顺军官俱乐部院内合影

选调潜艇学员条件很高，要求政治素质好，年龄轻，有文化、体质强。为此，海军上下严挑精选，从华东海司、各海校、航校、炮校和海直机关抽调出275人组成了潜艇学习队。

不知从那天起，北京前门大街“玉升店”、“永华义”等老字号店堂，住满了一批批年轻的海军官兵。他们南腔北调，严整而有朝气，在京都人眼中显得陌生而又神秘。

其实，他们自己也感到神秘。都知道自己是百里挑一选来的，却弄不清到底是学潜艇还是学飞行；有人说去列宁格勒，也有人说是去海参崴，但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旅行。生活待遇的优厚，即使初出家门的人也会忘记离家之苦：住的是旅店，四、五人睡一间；吃饭在饭馆，常常是大菜大肉十几盘；每天发给每人十几只“恒大”牌香烟；还请人专门给讲吃西餐，什么餐巾要别在领口，什么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吃饭时不要把碟盘碰得叮当响。最后发

给每人旧币20万元钱，要求买镜子、刮胡刀、洗漱用具以及小箱子，说是苏联人很讲究，不要搞得太土给中国丢人。一连几天，这些16至25岁的年轻人真的陷入了一种出国留学前的愉悦和新奇中了。

一天晚上，中山公园一间大餐厅，灯火辉煌。几十张铺着白布的大圆桌上，刀叉交错，杯光碟影。海军为庆贺中国潜艇学习队成立举办盛大的晚宴，吃的是西餐：面包、黄油、果酱、蕃茄汤、炒饭、牛肉饼、猪排、沙拉、果汁等，先后十几道菜，丰盛而鲜美。年轻的学员们尝到了地道的“俄罗斯大菜”，也仿佛看到了“美好的苏联”。

接受“洗理”人苏营

一列火车从北京发出，甩龙般驶出山海关，北上沈阳，南下大连。

旅顺东港，苏联驻旅顺基地司令部所在地。下了卡车，坐得晕头转向的学员们还没辨认出东南西北，

就被带到一个大院子里的一座房前。

这是一个大澡堂。空旷的外间站着几位苏军官兵。中方翻译交涉完走过来对大家说：“脱掉衣服。”还没入营先洗澡？中国学员有些莫名其妙，却不敢发问。

“快，全部脱光。”苏军士催促翻译再次传话。

学员们顺从地把外衣内裤脱了个干净，可是，谁都没想到，脱下的衣裤还没落地，就被苏联士兵连拉带扯地扔到了窗外。有的学员看到自己新买的衣裤被当作废品扔掉，心中一阵怜惜。

好像被杀了个下马威。

房子中间摆着三个又笨又大的方凳，三个神情冷漠的苏军士兵拿着理发推子站在旁边。学员们顺着他们的手势走到凳边，不由分说地被一只大手按下，三下五除二，满头黑发丝毫不见。

领取新军装，给中国学员带来了意外的欣慰。与苏联军人待遇相同，从头到脚外衣内裤全发，光各式毛料军装就七八套：全白、上白下蓝、土蓝下黑、礼服、大衣、厚呢大衣、值更绒布衣，以及防水布和蓝棉布工作服。还发给每人一个绿背袋，把暂不穿的衣服全都装进去。分发军装的苏军准尉十分认真地检查试装，谁的军装大一点都得更换。从此，中国军人不能不改变爱穿宽大衣的农民式习惯。

中国兵，穿苏联军装。

接受了“洗理”的中国学员们相视无言，心情异样。莫非真要不走样地“全面学习”？

中方与苏方签定协议：中国潜艇学习队在学习期间，接受苏军的条令条例管理，但要坚持两条：一不戴苏联军衔；二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搞一长制，为此，学习队培训了苏军不设的政治委员。

放下筷子拿叉勺

“洗理”后的中国潜艇学习队被送到旅顺老虎尾——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旅顺基地潜艇支队。

早已饥肠辘辘的中国学员，走进宽大的餐厅，依次站到一张张能坐十几人的长餐桌前，不由地想起临行前那顿丰美的西餐，而且新异更甚：旁边一排长桌坐的是蓝眼睛，高鼻梁的苏联水兵；餐桌上十个锃亮的铝杯、铝碟反扣着，整齐地摆成金字塔型；每人面前只有勺和叉；土豆中间黄油碟上摆两把公用刀；干部们坐在间隔的小房间吃饭……

第一道菜是土豆洋白菜汤，里面有几片牛肉，这正为铁勺派用场，大家一口接一口地吃起来；第二道是炒米饭，其中放着肉丁鸡蛋；第三道是一杯浓果汁，另外，每人两片白面包，不够吃黑面包。初见这烤得香喷喷又黑又大的面包，中国水兵不免新奇，可是一放到嘴里，又酸又粘，有人咽不下又不敢吐，做出满脸苦像，有的干脆不吃等着下一道菜。

这时，苏军值日官下达口令“起立”，晚餐结束。中国水兵们目瞪口呆，对这第一顿饭，大为扫兴。

“这也叫西餐？”

“什么鬼黑面包，还不如我家的糠窝窝好吃。”

七嘴八舌，怨言怪话，一下子把大家对苏联生活的美好想象冲得淡淡的。当然，不少人还把希望寄托于明天。

明天的食谱仍是这样简单：

早餐：黑面包，一小片黄油，红茶一杯，砂糖三块；

中餐：洋白菜洋葱胡萝卜汤，土豆泥肉饼，炒米饭，果汁；

晚餐：洋白菜胡萝卜汤，土豆泥肉饼，炒米饭，时有生青鱼。

天天如此，一成不变。只有到年

节时，才加牛肉排、米糕或空心粉等菜，比当时中国舰艇部队的伙食差得多。中国学员中有的吃黄油腻歪，有的吃土豆反胃酸，有的说宁可吃窝头咸菜也不愿吃西餐了。

这天，苏联太平洋舰队一位将军视察工作来到面包房，看到一个中国水兵正在端饭，问道：“怎么样，你们生活得好吗？”小水兵会说几句俄语，不加思索地说：“荷列巴（黑面包）不好！”说着把盘子里的面包端给将军看。将军尝了一口，果然又酸又生，当即批评了支队领导。可是，中国水兵也因擅自反映问题而受批评。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几个水兵悄悄溜到海边。他们挖野韭菜，捡海蛎子、海螺等放进罐头盒，在岸边支火起炊。不知是炊烟还是欢笑引来了苏军值日官。他是个航海长，身材矮壮，满脸络腮胡子显出凶相。因为语言不通，他用手指着地上的餐食，诧异而恼火地瞪着中国水兵，嘴里狠狠嘟囔着走开了。

他急匆匆地找到队长傅继泽，大惊小怪地说：“傅将军，您的水兵吃野草和海里的虫子。这样会影响健康！”

傅继泽当然理解自己的水兵，但又不能表现出袒护，嘴里不由地说：“乱弹琴！”

晚上，学习队集合，全场鸦雀无声。

傅继泽站在队前，面色阴沉，半天不作声，当那雷霆般的声音迸发出后，在场的人终生难忘：

“我们是来学习的，连吃饭这关都过不了，还能学潜艇？潜艇里仓室狭窄，不可能做中国式的米饭馒头几菜几汤。西餐讲究营养和热量，如果不会吃，身体素质削弱，又怎么上艇出海？……今天，我重申，为了学习，为了祖国荣誉，吃不惯也要吃。一定要把吃西餐当作任务来完成。”

“洋罪”难受，条令必行

苏联海军有这样信条：不管装备多么精良，人，这个所有战争武器的支配者，始终是海军的根本，而条令则是高悬军中规范调整军人行为的达摩克利斯剑。

苏军在老虎尾为中国潜艇学习队建造了两栋二层楼，楼里有四间可住50多人的大宿舍，从士兵到艇长待遇与苏军一样：每人一张钢丝床，一个床头柜，床上铺两个又短又薄的棉垫，盖一条绒毯，枕套里装粗硬的鸭毛。行装简朴，战时便于携带。平时，则要求整齐划一，棱角成线。

难过的是春夏两季。旅顺的冬天气候寒冷，虽然室内保持在18℃左右，但是，体质单薄的中国学员只盖一条绒毯睡觉实在难熬，常常是一觉醒来冻得头冰脚凉。夏天小咬成群，没有蚊帐遮盖，搅得人彻夜难眠。不知是饮食习惯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体质，还是生长在西伯利亚打下了抵御寒冷的功底，苏联水兵在零下20多度的清晨竟敢光背做操跑步冲冷水澡；对蚊叮虫咬也无动于衷。为此，中国水兵惊羨之余，不无感慨地说：“这‘洋罪’可真不好受啊！”学习队领导体谅中国学员的苦衷，向苏方反映意见，近乎机械的苏方破例同意：中方可以给每个学员增加一条小被和一个蚊帐。

中国学员们感受更多的是条令的冷峻不可违犯。

这天，中国学员放长假进城，走后凌乱的宿舍还落满灰尘。刚巧，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来到中国学员宿舍。他一进门便蹙起眉头，厉声问中国值日军官：“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学员们放假了。”值日军官答道。

“放假就可以违反内务条令?”司令官反问。

“是,应该打扫干净再走。”值日官笔直地站着。

“你为什么还不动手?”司令官有些火了。

“您走后我就打扫。”值日官解释。

“不行,马上干!”苏军强调有令即行。

值日官立即拿起扫帚毛掸从上到下地打扫起来。令他惊异的是,室内尘土飞扬,头发花白的司令官居然面无愧色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直到他把房间打扫干净才满意地离开。

久而久之,条令无声地缩短着两个国家、两支军队、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诸如:到公共场所不喧闹,进电影院先脱帽,吸烟自觉到室外等等。军容则要求更高:按时理发、刮胡子,穿军装要熨烫,裤线要直,皮鞋要亮,出营门前,连军装扣子、皮带卡子、军衔帽徽都要用铜油擦得锃亮。一次队列集合,有一位航海长找不到穿大衣必围的白绸围巾,急忙把白枕套围在了脖子上,以避免违反军容风纪。

“一二、一二,”烈日下,严厉的苏联教官在训练中国学员。

“立定,”他毫不客气地说,“重来!”

这种枯燥乏味的队列动作已重复数十遍了,大家走得满头大汗,还有人走不好。苏军队列要求与中国军队不同,走步时,人与人间距很小,不能出错,否则不是踩了别人就是被别人踩;向后转从左边转,稍一走神就会与人转个对脸。为此,不少中国学员“享受”单个教练。

“队列都走不好,还能开潜艇?”教官厉声责问。

二艇艇长刘蕴苍不服气。他是《林海雪原》中战斗英雄刘勋苍的原

型,曾立过七次大功,说话口直气壮。他对苏军教官说:“光走步算啥本事?咱们一人带一个连,看谁能打过谁!”尽管如此,他的军容和队列动作从来都令苛刻的苏军教官无可挑剔。因为,他太明白了,潜艇操作要求高度协调一致。

中国潜艇学习队最先接受了苏联海军《舰艇条令》的规范和训练。它完整而具体,不仅规定了组织部署、人员职责、训练值勤、安全装备及生活等条例,而且对艇员出艇要报告,上艇不许乱摸乱动、艇员就餐的位置,工具的放置等都做具体规定。一个中国学员初次上舰因好奇,打开消氢器的阀门忘记关闭,幸亏被苏水兵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次事故。

军官穿上水兵服

苏军官兵界线分明。他们在强调职责的同时,也拉开了官兵的距离。除了工作,官兵很少接触;军官的任务是指挥,士兵只有执行;没有同吃同住,更没有思想政治工作;潜艇靠岸后艇上留一名值日军官,水兵们则抱团消遣。中国潜艇学习队不理解却要执行。比如:训练学习军官与士兵分开;吃饭军官做四人方桌,不吃黑面包,汤菜可添加;士兵给军官端饭。礼节繁重,见面词诸多。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被召见时要先报告:“我可以进来吗?”得到同意才能进门,并敬礼说:“某某来到,请首长指示。”走时还要报告敬礼问:“我可以走吗?”允许才能退出。经过军官跟前得先问:“我可以通过吗?”与首长共餐得先报告:“我能吃饭吗?”吃完再报告:“我可以走吗?”有个别从大学调来学部门长业务的中国军官不知不觉地真摆起了架子,引起参加过革命战争却来学水兵专业的老兵不满:“娘的,老子打

蒋介石那会儿,他还不知躲在哪儿呢!”

星期六下午是劳动日。苏军条令规定,军官不参加劳动。这天,水兵们照例扫地、擦玻璃、拖地板,忙得不亦乐乎。一位机电长坐不住了,拿起一把铁锹去和水兵清理水沟。不料,从他身边走过的苏军士兵非但不敬佩反而嘲笑,一个军官干脆上来制止:“你的职责不是做这种事情。”中国军官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铁锹。

次日,傅继泽找到苏联潜艇支队长,非常恳切地说:“我们尊重贵军的条令规定。可是,我们中国有官兵一致的传统,军官要处处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现在军官们看水兵干活,心里很不安,水兵们看军官袖手旁观也有情绪。”

“您的意思是,让指挥潜艇的军官去拿扫帚拖把?”支队长反问道。

“不,我们不想改变贵军的规定。我想,可以采取两全其美的办法嘛!”傅继泽说,“让部门长以下的学员一律穿水兵服。”

“军官穿水兵服?”支队长不可思议地问,“您向他们怎样解释呢?”

“学习期间全是学员。有人可能学不成,不能先任命。等他们经过毕业考试,正式任命后,再穿军官服。你看怎样?”

苏方又一次做了“让步”。

从此,中国潜艇学习队除艇长、副长、政委外,一律穿水兵服。

不同深度的“下潜”

世界潜艇学习没见过这样的课堂。

中国潜艇学习队员披着战争的硝烟,踏着黄土地的征尘,聚集在渤海湾宁静的教室里,开始了前无古人涉足的潜艇知识大海里的“下潜”。

这是一次不同深度的“下潜”。中国学员们的年龄不等，有十几岁的水兵，有30岁的军官；学历不同，从初小文化的到大学毕业生；专业繁多，有艇长、航海、机电、通信、声纳、鱼雷、枪炮等大小近20个专业；学习条件简陋，每人一枝铅笔、一个笔记本和一篇下课就回收的讲义；没有专职中国教员，由苏军教官讲课，中国翻译翻，一些刚刚放下步枪拿起笔杆不知三角几何为何物的学员，听完一堂课就象坐了半天飞机，头昏脑胀。

这天，苏军教官讲完一道高等数学方程式的题解后，用轻蔑冷峻的目光扫视着课堂，语中带刺地说：“我敢说，我刚才讲的课，在坐的没有一个人能听懂。”

教室里一片寂静。教官面无表情。

“报告。”一位面色清秀穿水兵服的学员站立起来。他就是后来以《甲午风云》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叶楠。

从大连海校抽调来学习潜艇机电长专业的叶楠天赋聪慧，又年轻气盛。他听懂了苏军教官讲的课，也听懂了外国先生对中国学生的不满。他不服气，面对傲然的苏军教官从容地说：“我听懂了。……”

当叶楠准确流畅地将方程式的解法叙述完毕后，苏军教官喜不自胜地连声称道：“Хорош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好，非常好!)”

一天，苏军艇长普雷孔阔夫中校站在“秀克”型潜艇上，指导中国艇长学员爬到仓底摸管道阀门的位置和形状：“下一个。”

“到。”傅继泽应道。

“傅将军？”中校教官犹豫了：“您也要爬仓底？”

傅继泽笔直地站在教官面前，说：“要当指挥员，必须先当好战士。”

苏联教官钦佩地点着头，他没见过这样的指挥官，却看到了由于他的表率，这支参差不齐的学习队伍间距日渐缩短，在潜艇知识的大海里越潜越深。

“旱鸭子”要作“海底蛟龙”

作为中国第一代潜艇兵，他们从第一次生活在数十米深海底的潜艇里，首先感到的是光靠勇气已不够了。狭窄的空间，不仅不能随便走动，连睡觉都不能侧身；仓室闷热，有的高达50℃，坐着都呼吸困难；有的人晕船呕吐，直至苦胆水吐出。开始真有人熬不住了：“给个少将也不干了。”可是，后来学员们都闯过了水下生活关，不少人没当少将也干了一辈子潜艇。

一天，潜艇游鲸般地驶出渤海湾，训练海上救护。不多时，海上风浪骤起，潜艇在波峰浪谷中颠簸前进。中国学员出海第一次遇到这样大的风浪，有一半人呕吐不已。指挥仓里的中国学员边吐边坚守战位，站在指挥仪前的傅继泽也显然在吃力地坚持着。

苏军艇长走到傅继泽身旁，轻声问道：“傅将军，大家吐得厉害，是不是先下潜，等风浪小了再练救护？”

傅继泽看着周围面色惨白的中国学员，心中掠过一丝隐痛，却没有接受苏军艇长的好意，他说：“打起仗来，风浪再大也要完成救护任务。”

说完，傅继泽转向扬声器深情而坚定地说：“同志们，要挺住，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海上风浪越来越大，中国潜艇学员驾驶着潜艇穿风破浪。

“旱鸭子”们咬紧了牙关，纵有千难万险，也要做“海底蛟龙”。

骄傲的老大哥

与谦虚的小老弟

苏军官兵的优点鲜明。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敢于蔑视美英帝国，自信有与之抗衡的军事实力；对潜艇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不论哪个专业兵都认为自己的工作重要，炊事员也不例外。有的准尉一干就是30年，艇长放心，“给个少校都不换”。指挥仓失事排水站的大阀轮上刻着每一任舱段军士长的名字，以示忠于职守，并鼓励来者；士兵义务明确，服役期间吃苦毫无怨言。

但是，苏军沙俄遣风严重，军官狂傲，官兵界线分明；条令严格却体罚严重，对中国学员也不例外。倘若哪个学员行为不妥，马上罚他帮厨削土豆；还搞政治上纲，一个中国学员见苏联水兵用刀片削指甲，就说：“还是用指甲刀好。”那水兵见指甲刀是美国货，马上告状：“你们中国学员说苏联不好，夸美国好。”学习队纪律严明，在中苏关系发生问题时，只许服从，不许反抗，“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为此，中国学员只能委屈求全。

一天傍晚，中国学员黄德功悠闲地散步走进一片树林。突然一声呵斥，吓得他不敢前进。一个苏军陆军士兵走来时，他才知道自己误入陆军炮兵阵地，违犯了禁令，心中慌乱不已。这时，苏士兵看到他手上戴的瑞士“英那格”表，眼睛一亮，露出了笑容。黄德功不明用意地望着他，他指着自已手上又大又笨的苏联“胜利牌”机械表，用双手做了个对换的手势。

“这不行。”黄德功连连摇头。这是他爱人刚从上海捎来的。

苏士兵伸出双手的拇指说：“斯大林——毛泽东，”然后，双手一抱，表示友好不分彼此。

黄德功怕他告状，只好忍痛割

爱。

最令“小老弟”哭笑不得的是“老大哥”愚狂。他们自称苏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和民族，甚至把无线电、鱼雷、汽车、飞机等人类文明成果，全都按到自己头上。一天午餐，有位苏联军官用轻蔑的口气对翻译组长黄克健说：“还是我们苏联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发达。你看，我们吃饭用的刀叉多么精美实用，而你们中国人却用筷子。这是远古人类简单地取食物的两根木条，这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

听到这话，北京俄专毕业的黄克健就象挨了一记耳光，顿时热血沸腾。他毫不示弱地反驳道：“你们苏联历史最久的俄罗斯民族也不过600多年，而我们中华民族已有2000多年文明史了。我们用筷子吃东西时，你们俄罗斯公国还没形成呢！”接着他如数家珍地例举了中国地大物博、文明悠久的事实。他要让这个狂傲的苏联人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占地96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民族。

无私友谊中的有偿帮助

尽管中苏关系经历过历史性的悲剧，但是，西伯利亚的寒风却吹不散当年友谊的主旋律给中国学习队员留下的美好记忆。

——张兴富大校记得，那个带他学轮机的苏军班长，憨厚豪爽。每值夜班都拿出俄语书，恨不能一晚上把他教会。一天，他正在用铜片刻铁锚。查更的机电长来了，他顾不上收好就陪同前去，回来时，他见张兴富早已把刀和铜片收到抽屉里，没让机电长看到，激动得把张兴富紧紧拥抱。随后又拿出偷藏的酒给张兴富喝。他们语言不通，他没有说一

句感谢的话，留下了一对感激的目光。

——张家瑞少将忘不了，一次潜艇出海训练，由于水平舵误操，潜艇发生特大“纵倾”。艇员们在突如其来的险情中滑离了战位，有的摔倒起不来；厨房的汤全部倒翻；水面上只见螺旋桨在打空转。千钧一发之际，带张家瑞的机电长法捷耶夫镇定不慌。看着他准确判断，下达口令，直到险情排除，全艇检查完毕进入正常行驶后，法捷耶夫才轻声对他说：“这样的事情不经历不好，不过，以后千万别再发生了。”

——不少学员都没忘，那天艇长普雷孔阔夫中校提问艇长刘蕴苍：“如果敌人的舰艇袭击你时，你的潜艇既没了炮弹鱼雷，也没有电了怎么办？”刘蕴苍是立过七个大功的战斗英雄，枪林弹雨都不眨眼，马上大声回答道：“我浮上水面，跟敌舰艇撞了！”中校严肃地纠正了他：“你考虑过没有，你的艇上还有40几个人，你将损失一艘价值几千万无的潜艇！记住，你应该下沉隐蔽。”

可是，友谊的主旋律中也夹着不和谐的杂音。

李豫任傅继泽的翻译，年龄虽小，俄语及潜艇专业学得都很好。他负责潜艇部署和指挥的翻译工作，常和艇长普雷孔阔夫打交道。这天下午，李豫照例向艇长要讲义翻译，发现他言称整理笔记，其实是在抄书。“怎么，他们宁可每天抄，也不肯教材给中国人看？”李豫热诚的心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次，他见苏艇长忙得没时间抄书，就用商量的口吻向他借，艇长犹豫了片刻说：“可以，但千万不要给别人看到。”李豫拿到教材马上交给学习队领导，当晚几个翻译通宵达旦地翻了出来。

后期实操训练，苏军考虑到耗油和机器磨损，安排的出海次数不能满足学习队的要求。为此，队长傅

继泽很伤脑筋。这天，他让李豫把负责制定训练计划的小个子少校鸠巴请来喝酒。

“您请他？”李豫不解地问。

“不行吗？”傅继泽笑着说，“搞好关系，争取多学点嘛！”

鸠巴来了。傅继泽拿来酒和花生米，像招待老熟人一样边吃边聊。看鸠巴喝得高兴，傅继泽婉转地把增加出海训练次数的想法说了出来。鸠巴酒兴正盛，痛快地道：“请放心，我一定把将军的意思反映上去。”

傅继泽曾在中美蒋三方谈判中显示过极大胆略和气概，在与“老大哥”打交道的几年中，又表现了高度的全局观念和智慧的严谨。中国学习队完成“秀克”型潜艇学习任务前夕，苏联潜艇支队长戈罗瓦乔上校来到学习队。傅继泽迅速整队，向上校敬礼报告，戈罗瓦乔满意地笑了。因为，他为中国学习队尽了职，中国学习队以优异成绩给他争了气。傅继泽多次向基地司令为他请功，后来他的确在支队长位置上破例被晋升为少将。这天，他轻声对傅继泽说：“你可以向基地提出学习‘斯大林’型啊！”

“斯大林”型是苏式新型潜艇，吨位大航速快，老虎尾码头就停着两艘。中国学习队学习600吨的“秀克”型，新奇羡慕地往复两年，一直可望不可即。倘若能学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我们的学期已经到了。”傅继泽有些为难。

“可以延长嘛！”戈罗瓦乔提醒道。

傅继泽顿开茅塞。1953年初，周恩来总理到学习队视察，写下“遵照毛主席指示，学会潜艇作战”的题词。傅继泽即时反映了学习“斯大林”型潜艇的意见。经过交涉，苏方终于同意中国学习队延长学期一

年,学习“斯大林”型潜艇。

这一年,中国学习队开足马力在潜艇学习的航道上冲刺,驶到终点却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结业前的一个晚上,学习队队部里气氛沉闷,傅继泽面色难看,第一次忿然说:“娘的,这就是‘老大哥’的无私友谊?”

中国学习队学习结束,苏方给中方开了一个物价清单,其中包括两艘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斯大林”型潜艇,不仅价格昂贵,连艇上的破被褥,旧碟子也算钱,加上三年的学员生活费,学习培训费,出海训练损耗费等等,远远超出了原订的标准。

“我们并不是希望他们无偿援助,但也不能这样出价不公啊!”傅继泽断然说道,“我不签字!”

为此,中国学习队反复向苏军基地申明观点,同时又向北京请示。但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不管多少钱也要签。”

中国政府花了两亿多卢布,买

回苏联四条已服役十年的“斯大林”型潜艇。

中国潜艇部队突破“零”

1954年6月24日。这个日子已经载入史册。

这天,中国潜艇学习队结业;

这天,苏联两艘潜艇正式移交中国;

这天,中国潜艇部队突破了“零”。

旅顺口晴空万里,碧浪拍岸。老虎尾码头停靠着两艘“斯大林”型潜艇,码头上中苏水兵整齐列队。

10点时分,新任海军潜艇独立大队队长的傅继泽身穿上白下蓝的中国毛料军服,神采奕奕地陪同中方周希汉参谋长和苏方关东军最高指挥官史维佐夫中将走到码头的临时主席台上。

中苏交接潜艇签字和升降旗仪

式开始。傅继泽和新晋升的苏军驻旅顺潜艇总司令戈罗瓦乔少将,分别代表本国在交接议定书上签字,并将已接收和计划接的四艘苏联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新中国12号”、“国防21号”、“国防22号”。傅继泽郑重宣布:辛福元为新中国11号艇艇长,张继业为12号艇艇长,刘蕴苍为国防21号艇艇长,胡介山为22号艇艇长。

乐队奏起中苏两国国歌。在庄严的乐曲声中,潜艇上的苏联国旗和军旗降下,中国的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冉冉升起。中国潜艇学习队员们热泪盈眶,无限的自豪与光荣在胸间升腾。

6月28日,“新中国”11号、12号两艘潜艇在苏联驱逐舰的护卫下,从旅顺老虎尾起航,驶向青岛。

中国潜艇部队驰骋在18000里海域,划下了一条从小到大,从近海走向远海的蓝色航迹。



勢所必然的悲劇

禹作敏

1993年8月27日，被告人禹作敏在法庭上。

新华社

勢所必然的悲劇

罗先明

1993年4月16日，当人们从新华社播发的电讯中得知，“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4月15日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时，无不为之震惊：禹作敏怎么啦？

一个似乎难解的谜。

只有少数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认为禹作敏早晚有这么一天。这些人大多是悉知内情者，其中包括大邱庄周围其他乡、村的群众。他们关心的是：把禹作敏抓是抓了，以后会怎么处理呢？还有的甚至猜测：很可能抓他是为了打击他的气焰，等他老实了，再把他放出来。

多少人在拭目以待！

1993年8月27日，新华社又播发一篇通讯，题目是《五罪并犯 国法不容 禹作敏被判处徒刑二十年》。

在1993年8月27日晚上的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上，人们有幸一睹禹作敏今日的“丰采”：低头耷脑，两眼无光，神情沮丧。虽说他的身体还算健康，精神世界却完全暗淡了，和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没有两样。

一些过去见过禹作敏的人，骤然记起禹作敏往昔那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威风凛凛、俨然“大邱庄主”

的神态。

1993年4月15日以前，每当有贵客求见时，不可一世的禹作敏，迈着欲行又止的八字步，扬起傲气横流的瘦长脸，慢腾腾地在黑色太师椅上落座，迟迟缓缓地接过侍者奉上的烟卷，悠悠然喷出一抹浓雾，头颅后仰，长腿高翘，良久，才极不情愿似的递过一张精致的名片：

全国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 天津市大邱庄企业集团董事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

然而，一夜之间，他又铛铛入狱，成了可悲的罪犯。

禹作敏受审的前前后后

不是命运之神拿错了码子，也不是他突然之间走火入魔。看看禹作敏蜕变的轨迹，人们一定能解开“禹作敏现象”之谜。

一、大邱庄怪事频生土围子命案迭起

大邱庄无疑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农村致富的先进典型。这个位于天津市西南郊的村子，原本是一片多少年前海潮后退时留下的盐碱地。它既不占交通之便，也不取物饶之利，和祖国东南沿海开放地区相隔数千里的遥。1977年以前，该村和周围其他村子一样，同处在贫困线上，以至于有两句民谣流传：宁吃三年糠，养女不嫁大邱庄。

就是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大邱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自1978年以来出现了世所罕见的奇迹。大邱庄的村民们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沐浴着党的富民政策的东风，于这一片盐碱地上绘出了绚丽夺目的蓝图。

据有关资料称，到1990年，本村人口仅4000余众的大邱庄，总产值达六亿六千三百万元，比1978年增长483倍；该村固定资产达二亿五千零三十二万元，流动资金为一亿二千零一十八万元，比1978年增长280倍。放眼华夏村镇，“一览众山小”。

大邱庄声名鹊起。

1973年以来，禹作敏一直处于大邱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位子，随着组织名称的变化，先被称之为村支书，后改叫总支书记，再更名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党委书记和总经理。至于大邱庄企业集团董事长的称谓，那是1992年的事。

就在这光环晃眼、鲜花映日的鼎盛时刻，一股凶险的暗流在这片由穷变富的土地上悄悄流淌。1990年4月11日上午9时许，该村64岁的村民刘玉田，其子被怀疑有猥亵女性行为被认定“教子无方”，经禹作敏亲自批准，被拉到大街上示众，美其名曰“啐啐唾沫，寒碜寒碜他”。

且不表禹作敏做出这一决定是何用心，单说身体衰弱、老实巴交的刘玉田被禹作相、禹作立等7人押着，解到村中众人汇集处之后，“啪！”“啪啪……”苍老的两颊立刻挨了几十个巴掌，浑臭的唾沫如夏夜的饿蚊般落在脸上。他接着被人一脚



罪有应得

被判刑20年

等7名同案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猛踹，“咚”的一声倒在地上。“打，往死里打！”随着阵阵狼嚎般的吼叫，皮鞋、皮带、带铁头的胶管急雨般落下。如此残酷的连踹带打，使得这64岁的老人滚筒般在歹徒们的脚掌间滚来滚去，一边用沙哑的声音乞哀告怜……

是一个风清日朗的好日子，大邱庄100余个各式企业都在运作着。围观者虽众，却谁也不敢劝阻，人们已被告知，此举是奉了禹书记的旨意。可怜刘玉田老人遍体伤痕上面涂着浑身泥土，开始还能像被捉弄的小虫那样可悲地蠕动，后来却身子渐渐伸直了……“真不顶用，这老东西！”毒打只进行了10多分钟，歹徒们还不曾尽兴呢。眼看老人已奄奄一息，7个歹徒才扬长而去。

当闻讯赶到的刘玉田的女儿见此惨景，央求出车送生命垂危的父亲上医院抢救时，大小车辆成龙的大邱庄，竟无人敢应允。她几经周折，才借得一辆手推平板车，将父亲送进了村办卫生院。老人入院后却被推入停尸房，医生也不肯极力抢救。结果到了下午1时，这个64岁的白发老人终于满含悲愤，睁着双眼饮恨离世。尸检结论是：12处大面积皮下出血；8根肋骨完全性骨

折；右胸腔有约400毫升积血，腹腔积血约200毫升，内有凝结血块；肝、肾3处破裂……系被钝器打击，致伤性、出血性休克死亡。

禹作敏在打死刘玉田一案中虽然算不上直接责任者，可是事情毕竟是因为禹作敏批准“寒碜”刘而起。为了捂住这个盖子，这个总揽大邱庄大权的“现代庄主”的第一步骤，是将刘玉田的老伴在卫生院监护起来，13日下午才被送回家；同时对刘的子女分别派人监管，以免他们“乱说乱动”，“歪曲事实真相”，然后，他指使凶手禹作相等人编造“路上偶遇，愤而动手”的假情节，为他们减轻罪责。再往下，便是独具特色、堪称“禹作敏式”的迫害：

台上一字儿端坐着禹作相等打人凶犯，台下一字儿垂立着刘玉田的4个孩子；台上的话筒里争相送出“刘家横行霸道”、“刘玉田死有余辜”的切齿痛骂之声，台下群众则稀稀拉拉振臂附和。这就是由禹作敏亲自主持的“坦白自首大会”，时为4月13日上午，死者冤魂犹在，尸骨未寒。

一幕才谢，禹作敏拉长瘦脸又生一计：“这几个人（指打手）怕是要坐法院，大伙给他们几个人捐些款，

咱们党委成员每人捐1千元。”

禹作敏此言既出，大邱庄便开始热闹了。党委成员们当即闻风而动，除当场找会计如数支取现款、送给打人凶手外，又赶紧回到各单位组织募捐。名为捐款，实属摊派，准少了也不行。然后，村干部们将数万元钱分作几份，各自登门送到凶犯的手里。

禹作敏暗自得意之余，又下了一道“圣谕”：把全村的人（包括外来职工）都组织起来，上街游行示威，将刘家搞垮搞臭。什么游行得经过公安部门批准，在大邱庄，不过是禹作敏一句话的事。

“还有，”禹作敏充血的眼睛瞪得溜圆，对村有关单位负责人厉声吩咐：派人把刘家所有人都看管起来，不准外出，不准工作，不准供电，不准……否则唯你们是问。

黑白就这样被彻底颠倒，几名主要打人凶手竟被捧为“除暴安良”的“正义斗士”，收受的捐款达10万余元，而无辜惨死的刘玉田不仅“活该”，而且还要遭受“九族株连”之祸。于是在禹作敏治下的弹丸之地，被威逼上街游行的人数上万，其间还有停课的教师，花花绿绿的标语贴得满墙，写着“打死刘玉田不冤，打人的无罪！”待惩治打人凶犯的判决书下达，禹作敏又发动村民上书2000余份，为罪犯鸣冤叫屈。

刘玉田一家可给整惨了。一个儿子不仅屡遭毒打，还被人往头上撒尿。全家大小都被分别看管，对他们断水断电，上街买菜也有“尾巴”跟着，一天24小时别想自由。无奈，其3个儿子只好趁月黑风高之际，翻墙取道邻居小院逃亡他乡。另一个女儿因实在看守太严，无隙可乘，到1992年12月还处于非法管制之中。

禹作敏手段之狠毒，还不止于此。遭到他迫害的刘玉田的亲属

中,除了儿子、女儿、女婿,还有年幼无知的孩子。看那个年仅12岁的刘家的小孙女,居然也被胁迫着参加游行。可怜的小姑娘一边流泪,一边举起颤抖的小手高呼:“打死刘玉田活该!”“刘玉田死有余辜!”还有刘玉田那15岁的小孙子也不知表示了点什么,竟被勒令停课,同时不准回家,不得不流着眼泪写“检讨”,一连4天被扣在学校,非得表明“和爷爷彻底划清界限”不可。

大邱庄的天是谁人的天?法是何人的法?

人们还没来得及认真思索。1992年11月27日,又一桩令人咋舌的惨剧在这儿发生。北京国家安全局所属学校技侦班27名师生前往大邱庄作社会调查,因说了句售货员“态度太差劲了”引起纠纷,其中21人竟遭疯狂殴打,5人受伤住院,并全体被非法扣押7小时。尽管学员们出示了证件,打手们仍有恃无恐:“打的就是你们公安干警!”“你们公安人员又怎么着?这是大邱庄。”

心怀叵测的禹作敏戴着金边眼镜,西装革履坐镇现场,亲自讯问被扣押师生,指挥若定。当着禹作敏的面,他的小女婿兼私人秘书杨××“啪”的一声,就给了带队的程老师一巴掌。禹的秘书长石××揪住程老师的头发,一边“啪啪啪”左右开弓,一边辱骂:“你们这些流氓,应该好好地打一顿。”打骂过程老师后,禹又亲自下令:把另一个学员“揪上来”。又当着禹作敏的面,众多凶手对该学员拳打脚踢,逼着他承认“骂街”。这个曾荣立个人三等功、连续5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坚决不肯承认“骂街”的诬词。为此,禹作敏别有用心地挑逗说:“小伙子你现在不承认,我一走,你就不好受了。”说完立刻起身走出房门,任凭手下的人施

暴。这场野蛮的毒打,使该学员左耳膜穿孔,左眼底震动性出血,头右侧肿疱,后住院数日才愈。而当他父亲的面对该学员大打出手的禹作敏的小儿子、大邱庄党委副书记兼总经理的禹绍政,竟不许被打者说“打人”两字,只能说是“教育”。带队的程老师一边忍受着毒打,一边对禹作敏央求:“禹书记,咱们不能再让事态发展了,叫你们的人别动手。”禹偏不吭声。

当校方来电话要求放人,禹还不甘心,硬逼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带队老师出具无中生有的“悔过书”,以此倒打一耙。

为此,他一次又一次让人领着带队老师去看所谓“学员闹事现场”。

“你看到什么了?”

“我只看见地上有血。”

“没看见砸碎的玻璃?”

“没有。”

带队老师的坚决态度,使禹作敏大为恼火,怒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太不老实!”

禹作敏这话就是暗示打手们行凶的信号,故话音刚落,立刻又有几记重拳落在带队老师的脸上身上。看着打手们打得够了,禹作敏才拉长脸子又发布命令:“再拉他去看。”带队老师再一次被带到“闹事现场”时,果然看见歪倒的衣架、破裂的热水瓶和砸碎的玻璃了。原来“嫁祸于人”的阴谋已经就绪,据村治保主任周克文后来供认:大邱庄的保安人员自己将玻璃砸碎,制造了这么个“现场”。

于是,带队老师的“悔过书”就有“内容”了。在禹作敏的威逼下,带队老师为了让学员赶紧脱险,尽快返校,不得不违心写下:

学员喝酒闹事;寻衅侮辱妇女;打伤3名治保人员;砸碎商店玻璃等。

晚上9点多钟,备受侮辱的师生们才含着眼泪带着伤痕离开大邱庄。

如此恶劣行径,禹作敏如何看待?用他事后对审讯人员的话说,根本“没拿这当回事”,照样在“领地”内高视阔步,精心筹划“治世大略”。

事隔半月,1992年12月13日,被禹作敏治理得铁桶般的大邱庄里,又发生一桩活活打死人命的大案。这回,禹作敏得到了最充分施展其“现代庄主”疯狂才能的机会,从而一步步走向势所必然的穷途。

二、排干扰坚定不移 辨疑窦狠查到底

1992年12月13日深夜,天津市静海县公安机关突然接到禹作敏的电话报案:13日下午,万全公司审查危福合贪污问题。晚8点半,突然闯进二三十人,对危福合拳打脚踢,危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人命关天,公安干警紧急出动。他们顶着午夜的风寒,划破浓重的夜色,很快来到案发现场。眼前的惨景令人落泪。生前体格健壮、年仅27岁的死者,全身伤痕380余处,的确是体无完肤。经法医检验,不仅仅是拳打脚踢,还有明显的钝器打击痕迹。再查,打人现场只有4人(同类特征)脚印。值勤门卫且证实:昨晚并无众人进入(现场楼),外人未经允许根本不得入内。

巨大的疑团如同午夜浓雾,立时在干警们心里弥漫开来。

危福合系河北省枣强县人,原来在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养猪厂担任材料员。华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李凤政不久前病故,禹作敏在煞有介事地为李凤政大肆操办一番丧事之后,宣布将该集团解散,由其他集团公司分别对其所属各单位大举清查,口号是“清理经济,整顿思想”。一时大邱庄皮鞭声声,阴风惨惨,私



设的公堂一个又一个，遭严刑拷打者一批又一批。危福合只是其中受害最烈的一人。望着危福合不肯闭拢的嘴唇，干警们强烈地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打人凶犯必须查清，缉拿归案。

已经有“四条好汉”蹦出来了，把“事实真相”说得“天衣无缝”。他们是万全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刘云章，办公室干部李振彪，保卫科长陈相歧，副总经理刘绍升。四人众口一辞，信誓旦旦地陈述道：

当天下午两点多种，危福合被负责审查的万全集团公司派人叫来后，刘云章、刘绍升问了问，危便承认贪污 22700 多元，李振彪对此记录在案。但危没有签字，只捺了指印。二刘问完后，将危福合交保卫科长陈相歧和李振彪看管，他二人回家吃饭。后来陈相歧下楼布置保卫工作去了，屋里只剩下李、危二人。这时，呼啦啦闯进二十多人，对危一顿毒打，打得他奄奄待毙。李孤身拦阻不住，且初来乍到，对打人凶手们一个也不认识，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待陈相歧返回来，发现危有点不对劲，忙通知二刘，共同将危急送医院抢救，终因救治无效而死亡。

真遇上一场无头案了。李振彪来万全公司报到的时间是同年 10 月 25 日，其人事档案至今还留在县

教育局。说他不认识突然拥进来的“身份不明者”，似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干警们有火眼金睛。经反复勘查现场，比照足迹，初步认定：这 4 个人全在打人凶犯嫌疑之列。

为了进一步查证，干警们又两下现场，其中第二次因没找到本村的治保干部而暂罢。当 12 月 15 日晚由县、市公安局共同组成的技侦小组由人领着，准备三勘现场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咔嚓！”一楼出口的铁栅门突然下锁，干警们被困在冰冷的楼道里出不去了。

这 6 名干警乘着一辆警车进村时，首先遇到了村里的一名保卫人员，再由这名保卫人员带着，来到万全公司的办公楼下。正好，该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还没下班，便由刘领着到了三楼的打人现场。干警中有 1 人是静海县公安局刑侦队的副队长，名叫刘洪春，和村治保主任周克文、巡逻队长孙岳文打过交道，称得上熟人熟路。

现在，除开车司机乘隙出村外，6 名干警全给扣押了。

保安人员共 20 余众，因为奉了“上头”的指令，一个个变得凶狠横蛮，正像毒打北京国家安全局所属学校师生时的表现一样。干警们有的身着便装，有的穿了警服，尽管没戴帽徽警衔，但身份明明白白。

此刻，干警们却不得不备受侮辱。

保安人员分成 6 个小组，每组负责看管干警 1 名，干警走到哪儿，保安人员就跟到哪儿。楼道两端的出口已经堵死，并另有保安人员把守。干警们不想同这些人发生冲突，只有耐心解释：

“开门，我们在执行公务！都带了证件。”

“那管不着，我们按领导的指示办。”

“我是县局的老刘，认识你们的治保会主任。请你们把他叫来！”

“少废话，老实呆着吧，这是大邱庄。”

……

正是寒冬季节，户外滴水成冰。正在装修的楼道里满是泥灰，暖气管道还不曾试水。楼道长约 40 米，宽约 1.2 米，这就是 6 名公务在身的公安干警的活动天地。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床位，没有被褥，也没有通讯联络工具，有的还没穿大衣。干警们就这样在冷嗖嗖的楼道地板上或蹲或坐，苦熬着长长的寒夜。

第二天上午，一纸由禹作敏亲笔书写的传真件飞到天津市市长办公室，云：

“昨天晚上十点天津市来了七人，身穿便衣进到万全公司工厂任意活动，被我公司保卫人员围住。今早县公安局来人说是天津公安人，我今天早 8 点才知……”

市长聂壁初已经接到公安干警被扣的报告，正想方设法营救，当即电告禹作敏：“公安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也无权阻止。被扣公安人员必须立即放出。必须保证公安人员顺利执行公务……立即执行，不得有误。”

禹作敏对市长的电传指令大为不满，接二连三地发出电传，对自己

的犯罪进行狡辩,说是干警执行公务为什么要在夜间?为什么不通过党委(也就是没通过禹作敏)?叫他们怎么分得清好人坏人?

旭日已高高升起,暖和的冬日的阳光照着祖国的山山水水,也照耀着机器轰鸣的大邱庄。被扣的公安干警们仍在狭窄的楼道里呆着,没做任何过激的表示。也许真是一场误会,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他们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困难局面,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饥肠辘辘,冷风嗖嗖,他们仍旧坚持着,坚持着,直到长长的13个小时过去,才被允许归队。

看来真是误会了,要不,禹作敏何以提出为他们设宴饯行?

禹作敏的表演,真是到了家。

“我不知道你们来了。对不起,让你们受累了,真不应该。”禹作敏太精于算计了,和6名干警见面时就如此这般表白一番。

干警们没理他的茬儿。

禹作敏马上凶相毕露:你们来大邱庄办案,为什么事先不通过党委?偷偷行动,还穿着便衣。

“辛苦了,喝杯酒,洗洗尘。我亲自陪同。”当市长急电紧催,禹作敏推三阻四地又耽误了两个小时,最后不得不放人时,禹作敏又换了一副尊容。

这就是禹作敏式的掩耳盗铃。在他眼里,干警们都是可尽其愚弄的“傻大个”,万事万物皆备于我。

但是禹作敏彻底为自己的“聪明”所误了。

“非法拘禁”事件无法阻挠办案工作继续进行。干警们经过现场的再一次仔细勘查,提取足迹和指纹,又征得危福合家属同意,对危福合进行了认真的尸体检验,还把李振彪等人提供的“笔录”做了技术鉴定,反复研究后确认:刘云章等4人有重大犯罪嫌疑,决定依法拘传。

那4人却突然不知去向。

“找不到,都被公安局的人给吓跑了。你们自己找自己要人吧!”诡计多端的禹作敏昂着尖瘦的下巴,音调不高不低,语速不紧不慢,但却振振有词。他还装模作样地成立了一个破案小组,“全力以赴协助政法机关破案,抓获4名嫌疑分子。”

三、掩真相说尽谎言 藏疑犯煞费苦心

禹作敏哪有诚意协助破案?

危福合究竟是怎样死的?他于当天下午2时30分被叫到万全公司所属股份公司财务室,进门就挨了刘云章两记耳光,并被一脚踢倒,强迫他承认有贪污行为。随后,李振彪,罗德元、许瑞才、李炳升、陈相歧、刘绍升等18人轮番对其毒打,先是拳打脚踢,继而使用电警棍和三角带皮鞭,打得危福合满地爬滚,痛苦哀叫。尤其残忍的是,李炳升还拿来手铐,伙同李振彪将危福合的双手反铐背后,继续用皮鞭抽打……长达7小时的摧残,终于使危福合当场休克,抢救无效死亡。

禹作敏于当晚10时50分左右得知危福合致死的详情后,竟然联想到了刘玉田一案的打人凶手最终未能逃脱法律惩罚一事。之所以禹作敏对此耿耿于怀,因为它对于一心想营造“土围子”的“现代庄主”来说,不啻是重重的一击。这回,他要吸取“教训”,行使“治外法权”。于是他当即定下调子:打死危福合的二十来人面太宽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

万全公司的代总经理刘永华,是禹作敏的亲侄女婿,平时对禹“唯马首是瞻”,现在领得禹作敏的旨意,返回公司后便如此这般执行起来,结果便有了“四条好汉”向公安干警报假案一说。为了让李振彪制作的“笔录”象那么回事,他们还跑

回停尸房,拿起危福合早已僵硬的右手,在“笔录”上擦了三下。好算计,18变4(只4人知情),4变1(打人时只1人在场),一变0(李振彪对打人者一个也不认识),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只为了哄骗干警”,看你破案抓凶手去。

殊料,公安干警们却不是吃干饭的,认定4人都有嫌疑。禹作敏一看势头不对,恼羞成怒,决定教训教训这班纠缠不休的干警,别看错了地方,这是大邱庄!

正好,15日晚上,干警们又来勘查现场了。禹作敏得知后,毫不犹豫地下令:“扣他们!”

“不行,市局勘查现场肯定有手续。”

“先扣下再说。”

“县局带路的刘洪春我认识。”治保主任周克文在一边说。

“你不会回避?”

“孙××(巡逻队长)也认识刘洪春。”

“你这么死心眼,孙××不会也回避?”

上面这段对话,引自当时的村治保主任周克文的口供,而禹作敏不予承认,故法庭没最后认定。但是,另一个事实却在法庭调查时认定,禹作敏也承认了,则当禹作敏下令扣押公安干警时,另有下属加以劝阻。

劝阻者说:公安干警来勘查现场是执行公务,扣押他们是要犯法的。

禹作敏粗暴地一摆手,对手下人好心的劝阻不予理会。

一桩被禹作敏谎称为“我今早8点才知”的非法拘禁案,在大邱庄这块土地上就这样发生了。而禹作敏事后却正颜厉色左一份电传右一份电告陈述“正当理由”,联想到他在刘玉田一案中的丑恶表演,在殴打、扣押北京国家安全局所属学校

师生一事中的拙劣行径，能说他是一时冲动？

禹作敏施展伎俩行使“治外法权”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达到，庄严的法律岂容任意亵渎？在严峻的、对抗性的矛盾面前，自恃资本相当雄厚的禹作敏，选择的是一条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同法律抗衡的绝路。

当得知刘云章等4人被列为嫌疑对象，政法机关将依法拘传时，刘永华，这个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当过小学校长的大邱庄党委委员，首先考虑的是禹作敏将要怎么办，禹作敏怎么办他才怎么办。于是12月14日上午，在禹作敏的办公室里，两人有了一段绝妙的对话：

刘：他们4人怎么办？

禹：你让他们4个人跑了完了。

刘：这4个人走的时候，是不是给他们点钱？

禹：你怎么这么笨呢！

刘永华顿时喏喏，再不显得“笨”了。当天，刘永华一手操办，从公款中发给每人2万元，派人派车送他们分别出村。当12月15日晚执法干警被拘禁在现场楼道挨冻受饿时，4个凶犯却躺在各个窝藏点温暖舒适的被子里，做着他们的富贵梦。

12月14日晚9点多钟，自认为在与干警的较量中又胜了一筹的禹作敏，浓眉微蹙，若有所思地问：“那4个人怎么样？”

“我都安排送出去了。”

“他们4个人跑了，跟你还有联系吗？”

“他们都跟我来了电话。”

“你让他们都回村吧。”

刘永华得令后不假思索，赶紧安排人员车辆，将4人分别从外地接回，藏匿在本村九0小区十八门四楼西单元，对外则严格保密。

禹作敏此举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在他眼里，以国土之广，唯大邱庄才是他为所欲为的封建领地，在这里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法律也奈何不得。大凡他认为有必要制裁的人们，就可以像对待刘玉田一家那样肆意妄为，反之，他觉得某某是个忠贞的党羽，就该像对待罪犯禹作相等那样，即令犯法也备受优厚。你有国法，我有“庄法”，你的国法不许干扰我的“庄法”，“庄法”大于国法，“庄法”就是一切。正是大邱庄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才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连出两件人命案，并有包括禹作敏本人在内的33人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其中1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不少人之所以坠入深渊，就是因为惧怕禹作敏的淫威。

不应忘记刘云章等18名打死危福合的凶犯在法庭接受审判时的情形。18人无例外，都在承认自己所犯罪行的同时，愤怒控诉禹作敏平时的专横霸道。他们在“审讯”危福合时，都把它看作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丝毫不敢违抗。“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是大邱庄的“庄风”，属于禹作敏所标榜的“大邱庄精神”重要组成部分，谁敢越雷池一步就会倒霉。禹作敏在大邱庄推行的是“愚民政策，提倡的是“愚忠”精神。如果有人还不愿相信，看看禹作敏立在大邱庄小花园里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雕塑像，就会进一步明白。

同样，跟着禹作敏犯妨害公务罪和窝藏罪的其他几名犯罪分子，对禹作敏的淫威交加也深有体会。

先看看周克文的供词，他在12月15日夜间接押公安干警的犯罪活动中，充当的是干将角色。禹作敏的命令，通过他传达，禹作敏的旨意，通过他实现。

审讯人员：勘查现场的人是不

是公安局的？

周克文：是公安局的没错。但禹作敏说让扣我们不敢不扣。因为禹作敏整人特别厉害，在大邱庄全得听禹作敏的。禹作敏说什么就是什么，任何人也不敢不听禹作敏的话。

同样，犯有窝藏罪的原万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马德水，当法庭问他为什么把公安局通缉的嫌疑犯转移到家中窝藏时，他带着哭腔回答：

我违背了不好办，在大邱庄我就站不住脚了。我不干不好。……

禹作敏一方面对所有部属施行高压政策，把大邱庄治理得铁桶一般，同时对犯罪分子则备加关照，唯恐有失。1992年农历年底将至，禹作敏摆出一副“庄主”体恤下情的架式，明明知道政法机关的《拘传令》已经下发，仍旧对刘永华挥手道：“都让他们回家过年。”

刘永华执行禹作敏的指示，还真有点创造性发挥。为了不让刘云章的老邻居们看出真相，还特地为刘云章搬了一次家。对其他3人，也都做了妥善安排。4个犯罪分子在肉香酒气中怡然自乐，同时不忘感谢禹书记的大恩大德。

这边，禹作敏装模作样地把《拘传证》往治保会一塞，得意扬扬地环顾四周，坐着“奔驰600”的专用小卧车绕村一遭，自有一番“大丈夫当如斯也”的滋味在心头。

然而，神圣的法律不允许禹作敏得意过甚。由于对刘云章等4人拘传不到，政法机关在《法制日报》、《天津日报》刊登了关于4人的《通缉令》，全文如下：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万全公司发生一起非法拘禁殴打致人死亡案。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认为刘绍升、刘云章、陈相歧、李振彪等四人应予逮捕。侦查期间四犯逃匿，现予以通缉。



刘绍升,男,44岁,住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身高1.66米左右,体态魁梧,操天津市静海县口音,嗓音有些沙哑。居民身份证号码:120223490516441。

刘云章,男,29岁,住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身高1.66米左右,体态中等,大嘴,厚嘴唇,操天津市静海县口音。居民身份证号码:120103640610641。

陈相歧,男,58岁,住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身高1.78米左右,体态中等,前额皱纹较多,右眼皮下垂,肤色较黑,操天津市静海县口音。身份证号码:120223350218441。

李振彪,男,29岁,住天津市静海镇报华胡同14号,身高1.75米左右,体态中等,操天津市静海县口音。居民身份证号码:120223640920017

请社会各界协助查缉,发现线索后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公安局

这是政法机关的一个重要举措。它意味着4名嫌疑凶犯已不再仅仅是“嫌疑”的问题,而是应予以逮捕的犯罪分子。谁对他们4人窝藏或转移,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项的下列规定:

窝藏或者作假证明包庇其他犯

罪分子的,处二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刑法的意义不在于多抓人,诱导人们犯罪,而是相反,为了保护人,防止人们犯罪。为了广泛宣传教育大邱庄村民,政法机关决定:2月17日进村张贴《通缉令》。

当头棒喝!心怀鬼胎的禹作敏立时慌了手脚,却不甘失败,于是表现出最后的疯狂。

四、迎风暴忍辱负重 挽狂澜大义凛然

当2月17日政法干警决定进村时,充分估计到可能遇到的阻力,因而严格规定:任务必须完成,但不能同群众发生冲突。

这是一支由天津市公安局、检察院领导带队、有地方党委、政府负责人参加的精干的队伍。已经有“12·15”6名干警被拘禁13个小时的严重事实在先,他们都做好了忍辱负重、应付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果然2月17日上午9时许,市公安局负责人刚把来意说明,由禹作敏主持的大邱庄党委会议的会场里,立刻炸开了锅。各种谩骂之声蜂起,有的大吵大闹。禹作敏端坐在黑色的太师椅上,目光阴沉,不失时机地带头发难。他先是指桑骂槐地踢了大儿子(也是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一

脚,还把打火机往地下狠狠一掷,以示“镇邪”。然后咬着牙对在领导说:

你们派这么多人进村,大邱庄人员复杂,你们这么多人进来,我不能保证不发生问题,这局面我控制不了。所以我决定,辞职!

“辞职!辞职!辞职!”满屋子是其他党委成员的嚷嚷声。

按事先商定的意见,政法干警进村有四大任务:一、收缴大邱庄企业派出所建立时发下、撤销派出所后未曾上交的枪支;二、张贴通缉令;三、对犯罪嫌疑人家属进行传唤;四、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地和公共场所进行搜查。考虑到大邱庄人多地广,为防止发生意外,才决定派出400名警力。

“禹作敏同志,请你冷静点……”

“你们只是想搜捕4名嫌疑犯吗?你们是冲着大邱庄的改革来的!”

禹作敏已冲出房门,进入办公室写他的“辞职报告”去了,这儿忽啦啦闯进一大帮老人和妇女,原来是应禹作敏的安排,大邱庄“道德委员会”和“贤妻良母委员会”声援来了。禹作敏要通过他们的嘴,说一说自己想说而不便说的话。

两个“委员会”不辱使命,进屋就对政法领导们大肆围攻,除了对

干警们辱骂之外，还不遗余力地对禹作敏吹棒，甚至冒出如此肉麻的话儿：“爹亲娘亲不如禹书记亲！没有爹能行，没有娘能行，没有禹书记不行！”

无疑，这些就是禹作敏想说而不便说出口的话。他的狂妄心理，据此略见一斑。

市、县政法部门的领导明白：绝大部分群众肯定不明真相。面对无端的谩骂，他们只有统统忍受，并适当做出解释。禹作敏是想把事态尽量扩大啊！从17日上午、下午到18日早晨，他们就这样经受着围攻者的“轮番轰炸”，当晚都在沙发上过夜。

这天夜间是在骚动不安的气氛中度过的。大邱庄集团公司总部大楼前面的空地上，聚集的群众始终不曾散开。他们如阵阵汹涌的乌云，紧紧地包围着市、县领导的住地。村内的大小村道上，也有一队队奉命巡逻的保安人员诡秘地移动，给本已紧张的气氛增添了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

村口的道路上，则有耸人听闻的“告事牌”在昏暗的灯光下立着，上书：“因天津市向大邱庄派了公安武警防爆队员多达千名，我们不知原因何在，已造成停产。故谢绝参观，望谅解，请新闻单位的同志们也给予理解”云云。

更大的风暴袭来。2月18日上午，当禹作敏明知400名警力为避免误会和冲突，已全部撤回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召开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更具煽动性的讲话。他说：

市里在大邱庄周围布置了1000多警察，他们还带着小钢炮、警犬、催泪弹、长短武器，要进村搜捕刘云章等4人。他们是不是冲这4人来的，我很不理解。

接着，禹作敏声嘶力竭地宣布：全村停产一个月，工资照发。各

单位工资如果发不出来，从我的存款里发工资。

我的身体有病，也害怕控制不了局面，担不起责任，故决定暂停党委书记职务一个月。

最后他别有用心地号召：全村人要提高警惕，把守路口的要负起责任来，防止坏人进村捣乱。对进村“自由行动的”，要“寸土不让”。

禹的讲话如薪中添火，火上浇油，使受蒙蔽群众情绪更加沸腾。原来头一天下午，禹下令调集上万群众，他们中有的手持棍棒和锯短了的螺纹钢，被告知武装保卫总公司。进村的三个大路口不仅被卡车、拖车堵塞，连油罐车都出动了。

这些人根本不知4个嫌疑犯此刻就藏在村里，满以为真有什么人和大邱庄的改革开放事业过不去。现在听禹作敏亲口一说，人群便骚动起来。“找市里领导去！”“当官要为民做主！”大家一拥而上，围住了各位领导。推推搡搡中，一位领导同志的眼镜也被打掉。

“请大家镇静，请听我们解释……”在场的领导们既不退却，也不激动，继续向群众耐心解说。“任你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他们坚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一旦明白真相，就会幡然觉悟。

当进村的市县政法机关领导想和外界联系时，发现电话线路均受到监听，由于干扰连“大哥大”也打不出去。由禹作敏指令安装的摄像机的探头，严密地跟踪着他们，使他们连开小型碰头会的机会也没有。至于派警车出村，更不敢想像。

由于得不到村里的真实情况，市长聂璧初只好又往大邱庄发来电传：“大邱庄党委和禹作敏同志必须保证在大邱庄执行公务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等市、县几位同志的人身绝对安全，让他们返回静海县城。此事必须立即执行，不得有误。”

这是一场理性与疯狂的对峙，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禹作敏的用心已暴露无遗，就是要闹得不可收拾。这是争取群众的决定性时刻，政法机关的一举一动都在禹作敏秘密安装的摄像机镜头里。谁敢说他不制造一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大卫教派武装对峙的那类事件？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为达到某种目的，他不惜一切手段。他已数次扬言：流血冲突不可避免。

禹作敏彻底失算，进村的各位领导硬是战胜了种种困难，稳定了群众情绪。18号夜间，各位领导仍在沙发上打盹。聚集的人群慢慢散开，工厂的机器仍在轰鸣。没有谁肯认真执行禹作敏“停工一月”的“圣谕”，包括所属各公司、工厂的负责人在内。夜雾正在消散，田畴开始显露。没有禹作敏杜撰出来的小钢炮、催泪弹，也不见1000多名武装的干警，有的只是被事实戳穿的谣言。

但干警进村的任务还得完成，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2月19日下午，28名干警终于坦然乘车进村。进村前，干警们中间曾有过下面的对话：

“现在进去，有没有根啊？”

“管它，任务总得完成。”

当干警们在大邱庄外面集结待命，随时准备进村搜捕通缉在逃的犯罪分子时，周围群众都深受感动，同时切齿痛恨禹作敏的恶劣行为。令人振奋的场景出现了，村民们主动给干警送茶送水，有的还送来吃的。

大邱庄真成了攻不破的顽固堡垒？

干警们的汽车在缓缓行进，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禹作敏式的花枪又来了。“我们等了三天三夜，盼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公安干警给盼来了……”谁在喇叭里喊叫？“庄主”禹作敏是也。他还

坐着自以为可以标榜身份的“奔驰600”，率其他公司总经理们乘坐的“奔驰”等高级轿车20余辆，直奔村口“迎接”干警，将干警们乘坐的两辆普通汽车夹在中间，趾高气扬地开回村来。

干警们大义凛然，对禹作敏的表演不屑一顾。尽管拟搜查的两户嫌疑犯家门口都落了锁，其他公共场所也没能搜查，但这都在预料之中。最重要的是，禹作敏惨淡经营的“土围子”终于被炸开一大缺口，“现代庄主”的末日丧钟已经敲响。

五、拒教育执迷不悟 陷图罔咎由自取

禹作敏煽动上万群众停工停产，和政法机关大摆擂台之日，4名嫌疑犯正藏在村里。为了不让4人被干警逮住，刘永华一千人等真是煞费苦心，连村外泉汾热轧带钢厂高高的龙门吊机房，也成了他们的藏身之所。2月20日，刘永华通过马德水给刘绍升、陈相歧各二万元，送二人各自投靠亲友。3月14日，刘永华再给刘云章、李振彪4万元现款，指派黄乃奇送他俩去南方躲避风头。

禹作敏知悉其中每一细节，因为刘永华总是及时单独向他汇报。

看来4人是“安然无恙”了，抓不住刘云章等4人，就揭不开“危案”谜底，显不出庐山真面目。禹作敏“劈劈啪啪”拨拉着如意算盘，于2月19日后的3天，向全国发出传真电报一份，署名“中共大邱庄党委”。

该件的标题就骇人听闻：《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文内除继续重复危福合“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公司党委始终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市、县公安、检查(原文如此)机关工作”、“现仍组织力量查找疑犯”的谎

言外，还危言耸听地捏造出更多离奇妙闻，请看：

——据目击者说，围攻大邱庄的武警部队约有1700人，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大邱庄群众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警部队果然驻扎在村外时，顿时秩序大乱，企业全部停产，男女老少一片哭声。群众自发地与武警部队形成对峙，形势一触即发，一场严重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禹作敏同志出于爱乡爱民之心，仍号召广大干部尽力稳住局势，避免流血。经过长达数十小时艰苦耐心的工作，群众虽然情绪激动，但表示决不主动扩大事态。与此同时，为保证市、县公安人员履行公务，禹作敏等同志亲自到村口迎接市、县办案人员进村，公司保安人员协助他们执行公务，直到安全返回。

——武警部队虽然撤走了，但人心难平，民心难定。全村企业百分之百处于停产状态，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局势极为不稳。

——这一事件给大邱庄带来的经济损失难以计数，更严重的是，消息一传开，将在国际国内造成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笔锋一转，来了个画龙点睛：“这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我们不想说这是冲着改革事业来的，但是非自有公论，究竟为何而来，请所有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们自己去评判。”

好大一顶帽子！这就是禹作敏使的“障眼法”。沐浴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而一步步致富的大邱庄，已被禹作敏看作个人的一个筹码，一块利石，一根大棒。基于这种思想，他一次又一次拒绝教育挽救。

已经是4月上旬了。政法干警已巧妙地将刘永华拘捕，并通过在

全国各地的监控点侦查，先后将潜逃的刘绍升、陈相歧分别从河北、内蒙古抓获。在掌握了大量人证、物证的前提下，政法机关还想给禹作敏一次机会，希望他主动坦白交代罪行。

“要说就到村里来。”作贼心虚的“庄主”心惊肉跳，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土围子”。

为了挽救教育他，市政法部门有关领导来到了大邱庄。

“我有病，要谈上家里来。”禹作敏得寸进尺，自以为又占上风。

“找你谈话就是审查你。这样严肃的问题，在家谈怎么合适？”有关领导断然拒绝。

黔驴技穷。禹作敏使出最卑下的手段：重金获取有关机密，企图窥测上级部门对大邱庄问题的处理意见。

谁来完成这一重大使命？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小儿子禹绍政。父子俩于密室窃窃喁喁一番，最后禹作敏送小儿子迈上了罪恶的道路。

出手是够大方的，不是一千元二千元，而是数万元。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好几回。为了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机密，禹作敏简直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

值得指出的是，在法庭审理时，禹家父子极力否认他们是共同行贿，共同犯罪。被世人称为“老少庄主”的禹家父子不顾确凿的事实，极力掩盖他们的罪行。

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理解，因为禹作敏深知此项行贿情节之恶劣，非一般行贿犯罪所能类比。

他窃取到什么了？在自己的罪行录中添了个被从重判处10年的“行贿罪”，同时把小儿子一手推进了铁门。真个是害人又害己。在对他的儿子禹绍政的判决中，因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困兽犹斗，“大邱庄主”还想一



8月27日上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高绍政等案一审宣判结果。

展雄风。忽一日他又召集党委成员开会，拧紧恶眉，厉声指令所辖四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们：“马上停产，组织人员上静海县静坐示威去！”

但是这一回，禹作敏的指挥棒不灵了。四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们过去对他阳奉阴违（就在2月17日至19日的特殊时期，各公司也没有真正停产，只是采用倒班形式，派员执行“保卫任务”），现在却撕破面皮干起来了。众人齐声反对道：“生产绝不能停止，我们要对大邱庄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对事业负责！”

“你……”禹作敏龙颜大怒，歇斯底里发作起来，“我……”迅速制订着严惩叛逆的行动计划。

就在禹作敏绞尽脑汁，想把全村群众的情绪再一次煽动起来，实现停工停产，然后把“破坏改革”的大棒打向政法机关时，一纸刑事拘留证伸到他面前。他先是傻眼了，继而大叫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拘留我，我不签字。”

他还存着一丝幻想。这是4月15日下午3时。

六、禹作敏沉舟折戟 大邱庄生机依然

禹作敏直到4月21日上午10时被宣布依法将他逮捕后，才知道自己这回真的“栽”了。在这以前，每次讯问他，他的态度都极为恶劣，用傲慢掩盖空虚。有一份短短的审讯笔录中，竟有14处“记不清”、“我绝对想不起来”，他还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捺指印。

禹作敏懂不懂法？他给市委领导的电传称：“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我不知者，我不负责。”

他对法律ABC真的茫然无知？请看这一细节：

危福合被打死后的一天，禹作敏参加刘永华主持万全公司的骨干会议，研究下一步“清理”工作。其中王某某说到：“我们那弄了个猪场的吴××，通过审问，吴××承认贪污了1万多块钱。”禹作敏一听，立刻打断：“你看你说这词儿，怎么能说审问呢？应该说在清理过程中。咱们哪有审问的权力？”（着重点系笔者

所加）

事实却是，禹作敏在“清理经济，整顿思想”的名义下批准各处私设公堂，本人且亲自审问和用巴掌打过田某某等人。他还下令嘉奖打得最狠的打手，其中一名打手“获奖”金额高达8500元。另一打手因表现突出，5000元“奖金”当场兑现。使得该打手感恩涕零，不禁叩拜：“谢书记！”

当大邱庄原华大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侯某某提出，要对华大公司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做出正确评价，不能随便往大家身上泼污水，希望能“讨个公道”时，禹作敏当即把脸一沉，说：

你不是要讨个公道吗？好，给你个公道，马上把你副总经理的职务撤销。

当侯某某后来被非法关押，不少人当着禹作敏的面对侯进行毒打时，侯忍不住说了一句：“禹书记，咱们这儿还兴打人吗？”

这话算捅了马蜂窝了。禹作敏抡圆胳膊，朝侯某某一巴掌打了过

去，嘴里却说：“谁打你了？”

这一天是1992年12月13日，危福合被活活打死的惨剧，就发生在这天下午。

同是这个12月13日，禹作敏统治下的大邱庄，另有一帮人对原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进行拷打，还动用了狼牙棒。而对宋某的审讯关押，禹作敏不仅知道，还在前几天亲自审过一回，亲眼看着众多打手将宋某打得死去活来。

你能说禹作敏是个“法官”？

同样，他也不会不知道：窝藏犯罪分子、非法扣押干警、妨害执行公务、非法管制公民、行贿等都是犯法的行为。

是哪一路“魔子”在他头脑中作祟？

下面这段话也许能给人以启示：

“我今天跟以前不一样……现在我低下了。把大邱庄搞得再好也没用了……”

这是他在被宣布逮捕后，第一次提审时说的。自此他的态度的确有了一个大转弯，不但肯谈问题，也能按规定在笔录上签字、捺指印了。

不能忘记禹作敏在被宣布逮捕时的情景：浑身哆嗦，脸色灰白，手脚颤抖，签字时还把“1993年”写成“1933年”，经审批人员指出才改正。其诚惶诚恐之态，与往日睥睨一切之势相比，判若两人。

他也许真低下了，在法律面前低下了。而在这以前，他是否以为法律再神圣，在我禹作敏面前不过是一纸空文？

因为我特殊，我有资本，我把大邱庄搞得这么好，我是……！我等于大邱庄，大邱庄等于我——禹作敏在心中画着荒谬的等号。

“禹作敏的大邱庄”是什么？是钱。1993年2月18日，当他在全村广播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就此作过

绝妙的注解，把他的精神世界暴露无遗：

大邱庄有钱，我们有钱。各单位有钱。大邱庄可以说财大气粗，有钱。大邱庄一年不干活，也还有钱。如果没钱，可以取我的存款。

钱，钱，钱。钱就是一切，钱就是灵魂。难怪禹作敏当年能冒出那样的“格言”：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且不说致富后的农民（包括其他一切个体劳动者）都没资格享受超出法律范围的特权，单是这两个等式就不能成立。虽然禹作敏在大邱庄致富过程中起过不可否认的作用，但大邱庄永远属于所有为建设大邱庄出过力的人们。

▲1978年，大邱庄办起了第一家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30多人，7万余元资本。轧钢机是土法制造的，原料用的工厂的边角废料。头年下半年建成，这一年投产，当年创利润17万元。尽管禹作敏的决策功劳不可抹杀，但大邱庄人永远记得该轧钢厂创办人的姓名：刘万全兄弟。

▲大邱庄现有四大工业企业：津美、津海、尧舜、万全集团公司，其中尧舜公司是从刘万全创办的“万全公司”分出。创办人禹作尧，有过一番不平凡的奋斗历程。而津美公司起家时只是个26人的小小印刷厂，创业者叫赵树忠。津海公司的张延军，猪倌出身，和公司同仁一道苦干，同样有一部艰难的创业史。

▲鉴于禹作敏平时的淫威，四大集团公司负责人和党委其他成员对他唯唯诺诺。经历了危福合案的风波，11名党委成员立即分裂，形成所谓“四人帮”“七人伙”。四大集团的总经理们都在“七人伙”之列，坚决抵制禹作敏的停工停产阴谋，弄得禹作敏“茕茕而不立，形影相吊。”其中赵树忠和禹作尧以死相

谏，赵用烟灰缸砸破了自己的脑袋，禹作尧以头撞墙，旨在维护正义。

▲当禹作敏暗施诡计，准备对不肯就范的四大企业集团总经理进行迫害时，总经理们被逼先后暂避他乡。他们人在外地，心在家园，每天用长途电话指挥生产。赵树忠在外出的一个月里长途电话费就花了8000多元。张延军还在外地召开所属企业负责人电话会议。全仗这些老总们头脑清醒，态度鲜明，大邱庄自去年12月至今，一天也不曾停产，绝非禹作敏别有用心之谣言所述。

▲禹作敏被捕入狱后，在天津市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大邱庄党委经过改组，各企业集团总经理们兢兢业业，使全村工农业生产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头。夏收小麦总产达139万余斤，夏收夏种只用了6天就全部完成。工业形势更加可喜，总产值和纯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71%和50%。预计，今年总产值可达60亿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这话，才是对禹作敏和大邱庄关系的最好写照。1993年8月27日上午10时许，曾经风靡一时的禹作敏被押进法庭了。他头发灰白，情绪沮丧，在两名身穿制服的法警一左一右押护下，步履迟缓地走向被告席。他先是一张普通的钢木折椅上落坐，后又面带愁容地站起，惶恐的眼光不安地闪动着，认真捕捉审判长宣读的每一个关于自己的判决词：

“根据禹作敏等八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

宋仁宗和他的台谏官们

●朱秀海

北宋皇佑二年闰十一月，宋仁宗赵祯一连下了两道诏书，将自己宠爱的后宫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封为宣徽南院使、淮南节度使、景灵官使、同群牧制置使，恩赐其二子并进士出身。诏书中还附加了一句话：自今后妃之家，不得在中央三省（门下、中书、尚书）和枢密院（管全国军事）任职。两道诏命始下，立即在朝庭内处激起了轩然大波。

仁宗没想到此事首先就违背了“祖宗家法”。因有宋以来，外戚一直被禁止接近国家的最高统治中心。而且，这样做迫使他一直宠信和重用的台谏官们处在一种与自己激烈对抗的境地。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便在太庙里立下铁券：本朝誓不杀大臣和言事者。仁宗一生重用台谏官，广开言路，使朝廷中形成了较为民主的作风。台谏官们虽直犯龙颜，后亦必获纳用，即偶有误，也能多加优容。于是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包拯、底籍等相继由台谏官出将入相，王举正、唐介等还被史书称为“鲠直之士”、“铁面御史”。在这种风气下，士大夫不仅视谄媚求幸为耻，对期中大是大非循默不语也会受到抨击。有了这一种势力，执政大臣朝警夕惕，朝纲为之肃然几达30余年。

现在，仁宗宠幸张贵妃，还让一个既非大贤也非大恶的张尧佐坐火箭似地成了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臣，不能不再次引起他们的不安。在他们眼中，张尧佐的大红是一个危险信号，说明后宫和外戚开始干政，身为言事之臣，置身朝堂，他们不能不再次奋起同贵妃、外戚——实际是同皇帝本人——展开激烈斗争。

庆历十一年（1048年）张修媛因“扈辟功”进位贵

妃，当然没忘提携自己的叔父。仁宗明白，此时将张尧佐提拔成朝廷大员，一定会再次引起台谏官和执政大臣的激烈反对，就带一点试探的意见，不显山不露水地给张尧佐派了一个权三司使的差事。权三司使的“权”字兼有代理和试用两层意思，如果遭到大臣和台谏们反对，他也有理由搪塞，并没有正式任命嘛。如果没有人反对，或者天长日久大家习惯了张尧佐的新职，他再将那个“权”字去掉，就不用顾虑什么了。朝中果然一片平静。对于张尧佐的新差事，台谏官们虽然再次警觉起来，但既不是正式任命，也就无处置喙，只能睁大眼睛，看皇上下一步的动作。仁宗见天下无事，一年后便正式将张尧佐任命为户部侍郎、三司使。而且，宰相和枢密院详议时，那帮执政大臣竟顺利通过。

九月，对张尧佐的任用诏书刚下，监察御史陈旭就率先上言，以张尧佐是后宫亲属，不宜听掌国用为理由，请皇帝速行罢黜。次年元月，见仁宗对陈旭的上疏置之不理，谏官包拯、陈旭、吴奎再次联名上书。书入，如泥牛入海。

九月，新由常州知府入任侍御史的彭恩永一日随仁宗夜宿景灵宫，单独向皇上进言，尖锐指出仁宗如此对张尧佐滥施恩赏是不对的，且一针见血地提醒皇帝：“外戚乘政，宦官用事，皆非社稷之福也！”仁宗本来是有用张尧佐为参政知事的打算的，不过不想再闹得沸沸扬扬，没想到事情尚未开始，就被台谏官举论出来，自然十分尴尬和震怒，诘问彭恩永是从哪儿听到的消息？！不久下诏免去彭恩永的新职，重新出知宣州，而张尧佐任参政知事的事也暂时被搁置起来。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仁宗明白他再任用张尧佐当参政知事是不

十四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二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禹作敏犯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害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自然，禹作敏也不会漏听关于他的小儿子的判决：

“被告人禹绍政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九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

呜呼，禹家父子的遭遇，正合了那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齐来报。站在已经没有禹作敏的大邱庄热气腾腾的土地上，看到田垅绿

苗如茵，车间机器轰鸣公共场所秩序井然，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人们欢呼大邱庄获得了“又一次解放”。再想想禹作敏在位时的种种倒行逆施，人们在对这个“现代庄主”痛恨之余，也许还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某种惋惜。

什么是“禹作敏现象之谜”的谜底？读者自有独到的评判能力。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打死危福合的十

行了，碍于朝议，连三司使也不能让他再当下去，那样台谏官们还是不会罢休。但公开罢免张尧佐又难以向贵妃交代，也太在满朝文武面前跌份儿。他只得一口气封了张尧佐四个事简位高的官衔，并恩赐其子进士出身。为避免再起纷争，他明令：“后妃之家，无得除二府职位，”明白告诉朝中百官，自己虽加给张尧佐一大串官衔，却将他调离了国家的权力中心，外戚干政的担忧可以消除了。

仁宗对自己手下的台谏官们的愚忠程度又一次估计错了。对于皇帝的良苦用心，谏官们并不领情，他们认为不是仁宗将张尧佐任命为三司使错了，而是皇帝宠幸一外戚本身就是错的，何况仁宗加给张尧佐的四个新职，虽无执政之名，但对皇帝的影晌可能更大。于是知谏院包拯率先忿然上言：“陛下即位仅（近）三十年，未有失德，乃至五六年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于下。然而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了贵妃和大臣。新兼御史中丞王举正亦上言：历数汉元帝及宋太宗各朝故事，言不可使后戚盛以取倾覆的道理，请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新任命，给他一个地方官做，“以息中外之议”。五天后，见自己的章疏没有反应，王举正又在早朝退后留百官同皇帝“廷争”，率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谏官包拯、陈旭、吴奎，在仁宗面前极言任用张尧佐之误，又在殿外切责宰相，致使“朝廷大哗”，闹出一个政治事件。仁宗大怒，当场拂袖而去，次日降诏给宰相，责备台谏官“进对之际，失于喧哗，在法当黜”。一时满朝哑然，无人敢为台谏官们讲话。独枢密副使梁适为皇帝进言说：台谏官是有讲话的责任的，如其言论太过，皇帝应予矜察，但你这样宠幸张尧佐，恐怕也不是保全他的办法。仁宗默然。张尧佐也坐不住了，他见皇帝因自己的事差不多同满朝文武都闹翻了，再不主动下台阶对自己更为不利。于是匆忙向皇帝上书，请求辞去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仁宗同意了。

台谏官们虽然获得了基本胜利，却没促使皇帝全部罢免张尧佐的新职；贵妃和张尧佐自然切齿痛恨台谏官，力图仗势东山再起。

皇佑三年三月，张贵妃母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犯事系开封府大狱，供辞牵连到越国夫人。知开封府刘沆判彦方死刑，却不敢追究越国夫人的罪责。朝廷派比部（中书省掌管法制的部门）员外郎杜枢复审，杜枢扬言将追究越国夫人罪，执政大臣担心朝廷内再起风波，忙改用谏官陈旭代替杜枢。张贵妃一族恨杜枢入骨，不久便借故废杜枢为监衡州酒税，离开京城。台谏官们认为这是贵妃又一次“干政”，打击忠良，唇亡齿寒，他们当然不能坐视，便以“理彦方狱不问越国夫人及交游者”的罪名向皇上弹劾开封知府刘沆，仁宗不听；左正言贾黯复上言杜枢无恩，且圣旨自宫中出（即没有经过宰相和枢密院评议），恐怕此后开了先河，仁宗亦不纳。不仅如此，三月间，仁宗还任命刘沆做了张尧佐没做成的参政知事，谏官和御史们相继上言反对，仁宗皆不听。十一月，事态进一步恶化，仁宗再次降诏，任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这一下，对皇帝一年多来的作风大为不满的台谏官们再次群情激愤。御史中丞王举正迅即上书，称再授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有损圣德”，仁宗不理；王举正又言：“陛下滥赏尧佐，乞即黜臣”，仁宗仍不睬；知谏院包拯、陈旭、吴奎也陆续上言：“尧佐制命复下，物议沸腾，望检会臣等前后奏，必赐施行。”仁宗几天后竟然下诏：“自今张尧佐则有迁改，检会此子进呈执奏，”又诏：“除宣徽使自今不得过二员”。

朝廷上下一时一片沉寂。

可也就是这时，一个不怕死书生打破沉默站出来，抗旨独争，使这场斗争突然进入到一个戏剧化的高潮阶段。

此人便是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

殿中侍御史里行只是台谏官中的一个小官，相当于六品或从六品。十月，唐介上朝时再论张尧佐所授非

八名凶手，无一例外都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审判。他们中间有的曾经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先进工作者；有的拥有大学学历、大专文凭或其他专业特长；有的来大邱庄工作才二十多天；有的还没来得及建立小家庭……但是他们都“栽”了，栽进了犯罪的泥坑。其中主犯刘云章被判处死缓，主犯李振彪、罗德元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从犯韩文江等15人

则分别被处以15年至5年有期徒刑。听过他们在法庭上对禹作敏的控诉和悔恨不已的哭泣，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大声疾呼：

害人害己的“禹作敏现象”再不能出现了！

金钱不等于一切，而国法大于一切。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绝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殊公民！

（完）



当,仁宗十分恼怒地回答他说:这件事最初是由中书省提出的,你问他们吧。唐介复言:此事如果“初出中书”,皇上就应责罚执政。仁宗不理,唐介退,请御史台全体同僚上殿谏争,仁宗不许,唐介怒极,自动请贬,仁宗仍不理。所有这一切更是大大激怒了这位清廉正直的书生,次日,他一不做二不休,上章弹劾宰相文彦博、同时参奏谏官吴奎和包拯,称:“彦博奸谋登台,显用尧佐,阴结贵妃,外陷陛下有私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谏官吴奎与彦博相表里”,“乞斥罢彦博,以富弼代之”。仁宗大怒,将他的奏章扔到地下,声言要将他贬窜边远军州。唐介此时已置生死于度外,不为所动,拾起自己的奏章,徐徐读毕,才回答皇帝的威胁:臣忠义愤,死且不怕,还怕贬窜吗?!仁宗下不了台,急召宰相和枢密使,让他们看唐介的奏章,说:“这个人说别的事可以,至于说文彦博因贵妃而得执政,那是什么话!唐介并不给皇帝和宰相面子,当面质问文彦博:你要好好想想,我弹劾的事情如果属实,不可隐瞒!文彦博是一位识大体的宰相,没有面驳唐介,只是向唐“拜谢不已”,枢密副使梁适看局面不可收拾,忙叱斥唐介下殿,仁宗随即令人将其送御史台定罪。文彦博赶忙上前为唐介说情:“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仁宗不听,当即令值班的中书舍人在殿上草判责授唐介为春州别驾。一时“帝怒不测”,谁也不敢劝,独有右言蔡襄直言进谏:虽然唐介狂直,但容人把话说完,也是帝王盛德。两天后,御史中丞王举正也上言朝廷责罚唐介太重。仁宗火气已消了些,觉得自己当时处理问题有失朝廷风度,便重新降敕告谕百官,改唐介英州别驾,将其奏章收纳,并派遣一名亲信太监护送他去英州,无论如何不让他死在路上。仁宗本是好意,却把谏官出身的知制诰胡宿吓了一跳,他马上提醒皇帝:这样做不合适!一旦唐介因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将使朝廷负谤于天下,其伤不小!”殿中侍御史梁茜说得明白:如果唐介病死在路上,“天下后世能无以杀疑乎?”仁宗闻奏大惊,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忙追还太监,唐介的忠直之声则传遍了天下。

唐介出行的当天,谁也没有想到一件事发生了:仁宗皇帝自己后悔了。

他发觉自己已经失去了人心,满朝文武和他一向信任的台谏官们开始同他疏远。身为一个即位近30年的老皇帝,他不能不想到一旦朝中百僚不再向其进献忠言,将会多么危险。这时他再读唐介奏章,突然意识到事实上唐介比朝中任何一位臣僚对于他都更为忠诚,如果他不纠正在唐介问题上犯下的错误,群臣就会进一步与自己离心离德。仁宗当然不会把过失都揽到

自己身上,他在唐介被贬后终于接受了唐介的观点:他之所以犯了如此大的错误,责任在于宰相和台谏官们没有及时制止他。这本身就是不忠。

唐介出行的第二天,仁宗就开始收拾善后了。这一天,他又做了一件让满朝文武大吃一惊的事:宰相文彦博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许州,由谏官出身的枢密使庞籍知宰相事。次日,被唐介弹劾的谏官吴奎也受到贬谪,出知密州。仁宗本想留下包拯,不料包拯此时上章乞留吴奎,仁宗由此又得出结论:唐介言吴奎、包拯阴结文彦博,今天看来并非污蔑。次年三月,以包拯为龙图阁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对于刚刚贬出的唐介,他采取的是一步步将其官复原职和擢升的措施,而每一次这样的诏命,无疑都表达了他对唐介的褒奖之意。元佑三年十月唐介被贬,次年正月,即由英州别驾迁为全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三月又改任秘书丞,六月再改为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八月复职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知复州,13天后又提拔唐介为殿中侍御史,专职言事,亲派内侍带敕造去复州宣召。十月,唐介到京看见皇上,仁宗又当面嘉奖喻他:听说你谪迁之后,未尝有一封私信到京,可谓不易自己的操守,唐介顿首谢。有过这些遭遇,唐介自然明白,皇帝如此做是为了自己,同时也觉得脾气秉性不适合做言官,便从容对皇帝说:还是让我干别的吧,再让我做言官,遇事必然还要固争,争得太急,会再次受黜。我受黜固不足惜,到时却要连累皇上,仁宗答应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事到此时,仁宗的目的也达到了,他已在百官面前恢复了自己纳谏如流、容用直臣的美好形象,用不用一个唐介就无所谓了。

至和元年,张贵妃薨,生前仁宗没能将她立为皇后,死时总算给他追册了一个温成皇后的谥号,却又遭到了群臣和台谏官的反对,闹到最后,无人愿读册立之诏,宰相陈执中不得已自己读之。台谏官们从此视陈为仇,是年十二月,抓住陈执中捶挞女奴致死一事,上章弹劾,终使仁宗不得已罢免了他。张尧佐内宠既衰,不知所终。

宋仁宗不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惟纳谏如流一节,虽比之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为过。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北宋王朝在他执政期间有了长达40余年的稳定局面。

(责任编辑:刘家驹)

致

《炎黄春秋》

编者

(一)

纵观今日中国,报刊如林似海,只是真正耐读够格,能给人启迪和力量的毕竟有限。有的虽登了革命领袖或先辈题材作品,却过分热衷于披露奇闻秘事,其中不乏违背历史事实甚至丑化领袖人物的“伪劣产品”,我们选来选去,只选中了《炎黄春秋》、《中华儿女》和《中华英才》等十余种刊物。贵刊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史料翔实,可考可证,可信可用,又可读性强,能正确引导读者,尤其是引发青年读者积极向上的精神,承上启下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我们书社有位年近花甲的张健声老师,初见贵刊创刊号,竟连饭也不吃,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后来就从仅有的生活费中抠出几十元钱,东奔西跑到处查阅求索,好不容易地订购到贵刊,从此和我们一样,心甘情愿地作了贵刊的“俘虏”。我虽然才35岁,人生阅历有限,但每读贵刊,都被一股浓烈的爱国主义和奋斗精神所感染,读后常常难以掩卷,久久反侧深思。所以贵刊每一册,总要传阅十几甚至数十人,大家边读边议,深受启发鼓舞,十分感谢编辑老师们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一份精神食粮。

今年各期贵刊,更是丰富多采。《徐帅生前的肺腑之言》,澄清了历史,讲了真话,是学习党史、军史和国情、人品的难得教材。徐帅谈的虽是历史,却有很大现实意义,它教育人们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实事求是。记述邓小平同志南巡至珠海的报告文学,澄清了若干民间传说,公开了南巡实情,使人们对邓公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思想主张,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认识并接受了他的构思与蓝图。《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我因胡风蹲大狱》和《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等篇,都引起人揪心的反思,为人应该有他们那样“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和信仰。《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虽发生在几十年

前,但我们并不陌生,现在我们周围,仍然有人在搞不切实际的“假大空”一套,用以往盲目瞎干的蠢事,来提醒和敬告今天的人们,是很有必要的。萧克同志关于《中华文化通志》的讲话,也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我很想进一步了解这一鸿篇巨著的编纂情况,并且想早日看到这一辉煌巨著的问世。……好文章还多,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是越看越有味有劲,相信贵刊定能获得更多读者的信赖和喜爱。正由于喜爱,我们再向贵刊提点要求:

1. 发行工作要做好,订阅购买贵刊很难,面对报刊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拥有大批相对稳固的读者群,才能存在和发展。

2. 要狠抓编校质量,贵刊错别字,缺字、病句和标点符号使用不当太多,太令人遗憾了。

3. 密切编者与读者、作者的联系沟通,考虑聘请“读刊员”,鼓励为贵刊搜集反映、评议作品和提供信息、建议。

4. 建议组织若干活动,如“年度好稿评选”、“读刊学史知识竞赛”和“优秀读者评奖”等等,可以调动读者、作者积极性,扩大刊物影响。

……

江苏盐城顾吾书社 顾寿义

(二)

我是贵刊的老读者、老订户。自由化泛滥时有人把中华民族文化说得一文不值,所以贵刊责任重大,内容很好。我的一本《炎黄春秋》,子女都要看,还要介绍给朋友看。我把前几期订成合订本,女儿带出去,又拆开给大家分着看,结果都要不回来了。这说明人们都喜欢看贵刊。因为我们爱她,所以要向她提提意见和建议,我想你们会欢迎的。

5月号刊物,我5月31日才收到,看到封三竟是空白,看来你们工作运行不很正常。6月号虽及时收到,可是不知你们为什么在封面上也追随“歪风”,非要印了时髦女人照片不可呢?有些出版商或非法出版物,为了迎合一些人的不健康心理,搞花哨封面,印女人或明星照片,你们是正经刊物,没有必要这样做,刊物应讲内容好,决不在于封面花。你们还在有的封二和文章标题上下了功夫,但是我看有的是浪费版面和人力物力,同一标题连登几个,空白太大,有什么必要呢?何必如此花样呢?美化是必要的,但读者更需要的是“实惠”的内容和质量。而你们的文字和技术错误,简直举不胜举,应该下真功夫改进。

我做过铁路报纸的发行工作,看来你们的发行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我走了很多地方,都很少见到贵刊。靠书

商摊点发行，他们认为不好卖的不进，结果读者想买也找不到。我认为你们应该大力征求、扩大和巩固本刊的基本读者的队伍，要建立自己的发刊网点，对长期订户和固定网点订出优惠的办法。要扩大发行必须加强宣传，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贵刊。还要发展与别的报刊的交流合作，互相宣传互登广告，读者也可从中得到更多的文化出版的信息。

你们与读者、作者的联系也不经常。有的刊物在这方面值得学习。编者、读者、作者应该是鱼水关系，互相支持、合作和服务，才能把刊物办得更好。

.....

郑州铁路局 崔景元

(三)

我每次去人民医院看病，在候诊厅的书报点上，常见一位护士手不释卷地在看《炎黄春秋》，我问她此刊销路如何？她说：“很好销，每期能卖40多本，我们就爱看她。”我在别的医院，也见《炎黄春秋》吸引着不少读者，这说明你们的劳动已经创造了价值和效益。

不过，在报刊林立，鱼龙混杂的今天，如何能保持刊物本身的高洁又能满足读者的知识需求，还要看办刊人物的真功夫。在当今形势下，刊物能否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发行触角能否伸向社会需要的角落，但愿你们在这些方面下更大功夫。

有点意见，你们发表的图片，有的与文章内容无关，有的刚登过又登一次，而且没有说明，读者看了有“丈二和尚”之感……所以希望你们的工作做得更细致周到些。

北京 张彦

(四)

一收到《炎黄春秋》，当即详细拜读，你们在捕捉重大题材、内容引人入胜上，是全国同类杂志中没有几家及得上的。你们编发的一些作品，秉笔直书，胆大敢讲，对历史负责，能发人深省，但有的文章有一些“硬伤”，例如：

徐刚写的《1938：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情节跌宕，文字生动，只是说了些历史知识上的外行话，又将1937年以前的事都说成“1938”年，有关的番号、任职不准确，有人生还说是“全体牺牲”……

这可能是校对不严之故，因此建议你们以后再发历史纪实作品时，最好给专人审看一下，这对维护贵刊声誉大有好处。

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孙宅巍

本刊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各种意见、建议和鼓励，我们诚挚地感谢大家的关心支持。现从来信中选发几封，崔景元和顾寿义同志的来信是从他们多次连续来信中摘编综合成的。所有读者的意见建议，我们都将认真研究并改进落实，希望大家不断来信，本刊以后将经常选发，以加强读者、作者和编者之间的联系交流。7月号本刊封三上发的读者意见调查表，欢迎大家及早填好寄来。谢谢大家。

本刊编辑部





炎黃人鑄造春秋筆
春秋筆書寫炎黃人





汪僑政權
十大護奸的下場

張思德到底是怎麼死的

宋仁宗和他的臺諫官

“江青挨打”真相



女兵樓的

故事

